王鲁湘
凤凰书品
/著

华夏生死书

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尚书·周书·武成》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左传》

王鲁湘

王鲁湘和二十三位考古专家深入中国文化遗址考古发掘第一现场

集中披露150幅珍贵文物图片，
重温华夏文明遗落在历史深处的永恒魅力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王鲁湘
凤凰书品
/著

华夏生死书

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尚书·周书·武成》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左传》

王鲁湘

王鲁湘和二十三位考古专家深入中国文化遗址考古发掘第一现场

集中披露150幅珍贵文物图片，
重温华夏文明遗落在历史深处的永恒魅力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版权信息

华夏生死书

作者：王鲁湘　凤凰书品

出 版 人：黄隽青

策　　划：秦　青　郭　群

编　　辑：王加新

封面设计：武　兵

本书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目录

版权信息
寻找尧舜禹时代
一、中华民族探源
二、二里头遗址
三、王城岗遗址
四、陶寺发掘
五、夏文明的推想
良渚的神灵
一、发掘前奏
二、反山发掘
三、瑶山发掘
四、良渚美玉
五、良渚石器
六、良渚陶器
七、神秘的古良渚国
古蜀金沙
一、金沙的发掘
二、金沙的谜团与启迪
青铜时代
一、湖南出土大批青铜器
二、湖南青铜器的来源
三、湖南青铜器的特色与价值
探秘古滇国
一、发现滇王金印
二、李家山初次发掘
三、李家山二次发掘
四、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发掘
五、追溯滇族之源
发现阖闾古城
一、真山大墓
二、子胥建都
三、吴越争雄

四、废都之后
千年阅一城
一、故城兴衰
二、东汉洛阳城
三、魏晋风骨
四、北魏洛阳城
五、洛阳伽蓝
骊宫长恨歌
一、发现华清宫
二、唐太宗《温泉铭》
三、骊宫长恨歌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二、三教融合
三、朱张会讲
四、经世学风
五、毛泽东与岳麓书院
六、千年书院，薪火不绝
钓鱼城传奇
一、铁城肇建
二、固若金汤
三、上帝折鞭
故宫大修
一、故宫的格局
二、故宫的营建
三、故宫建筑理念
四、故宫的价值
五、故宫大修

寻找尧舜禹时代

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在河南安阳小镇的小屯村，农民李成意外地发现，一种刻着纹理的白骨片对于治疗他的疥疮有神奇的功效。于是，他激动地带着在当地收购的大量白骨片到药店去卖，以为遇到了上好的药材。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甲骨文。不久后，这些白色骨片被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并历经数十年，在千百次的寻觅和研究之后，牵扯出一个浩浩荡荡的殷商时代，以及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

一、中华民族探源

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后来殷墟遗址的挖掘，让商朝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国迄今为止有理有据有证的最早的朝代。此后，对于商之前的夏——这个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第一朝代，无数的问号紧随而来。于是，便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有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王鲁湘：您是中国考古所的第几任所长啊？

王巍[1]：我是第八任。

王鲁湘：考古所的工作对于外界的人，特别是对媒体来说非常神秘。而它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恐怕也是因为和两个大的工程有关系：一个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有一个就是中华民族探源工程。对于后者，我们知道的还不是太多，这个工程好像是您在负责。

王巍：是的。这个探源工程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由国家支持的第二个大型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当然，它跟断代工程有很多不同。

王鲁湘：二者应该也有交叉吧，它们研究的时间段差不多都是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1500年。

王巍：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是研究年代，这当然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基础。不过我们还要在此基础上研究其他的方方面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年代的问题。它要研究环境，研究生产的发展，还要研究社会的结构，以及文明社会是何时形成的。

王鲁湘：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定义。

王巍：这就要研究文明的标志是什么、达到什么程度才算进入文明社会。所以无论是搞历史的、搞考古的，甚至是搞文学的等方方面面的人都要介入进来。可以说，没有哪一个课题像古代文明起源、发展和衰落这个课题能吸引这么多学者，得到这么多领域专家的长时期关注。

此工程集中了多学科、多方面的专家学者，在地理位置上选择中原文化作为考察对象，时间确定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而这一时期正是历史上的尧舜禹时期。

王巍：我们先研究中原地区的想法受到了一些批判，有些人质疑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中原中心论”。实际上我们有自己的考虑。文明起源的研究是很复杂的，一下子全面展开很难掌控。而对于中原地区来说：首先，这里的考古工作积累的时间长，从1921年就进行发掘了；其次，这里的考古学线索比较清晰；再者，它毕竟还有很多传说，以及传世文献可以参考；另外，它毕竟还是夏、商、西周文明的中心，这样比较容易把握考古资料。基于这些原因，我们首先做的是中原地区。另外，当时对于年代范围也有争论。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从西周开始往上做商、夏，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所谓文明探源应该是探索文明形成及其之前的阶段，而更晚期的商、西周已经远远超过了起源的阶段。

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进入国家形态了。

王巍：而且它们已经有一个早期的发展过程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把年代范围锁定在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这一千年就相当于夏王朝，或者相当于从商代初年向上追溯到文献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

长久以来，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追溯如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无数专业、非专业的人为之动容。1899年甲骨文的出现，彻底结束了古人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1928年，为了找寻更多的甲骨而启动的殷墟探测工程，在历经十年艰苦卓绝之后，将一个鲜活、浩瀚的商王朝奇迹般地展现在世人眼前。

王巍：殷墟发掘表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世系与出土甲骨的记载基本上吻合，因此，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以此类推，既然《史记·夏本纪》同样详尽地记载了比殷商更早的夏王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史记·夏本纪》也是有相当的可信性的。但是夏代毕竟没有像商代那样发现文字，因而持怀疑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在国外，由于受到当年疑古派[2]的影响，许多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文时仍然不相信夏的存在，而认为夏只不过是个传说。所以建国以后，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夏这样一个王朝到底是否存在。

二、二里头遗址

20世纪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由于没有历史的考据，夏王朝究竟是否存在，学术界仍存有诸多质疑的声音。1959年，中国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南，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代遗迹，并将其定名为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似乎能为夏王朝的存在提供让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呢？



二里头遗址青铜爵



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王巍：二里头遗址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规模巨大，大概不少于400万平方米；第二，发现多座宫殿、高等级墓葬、青铜爵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等最早的青铜容器，甚至是最早的道路车辙，从而用车的痕迹证明了这个遗址不是一般的等级。

王鲁湘：不是一般聚落。

王巍：对，因为它规模大，人口多，而且它有一些高等级遗迹，比如建筑、精美的手工业制品等，由此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是一个都城。

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根据考证，这些精美的青铜器以及装饰品正是在这里制作完成的。从这些只有高级权贵阶层才可以使用的器物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分化非常明显。经分析，史学家们认为这座城池存在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那么，它会是夏朝的一个都城吗？

王巍：考古学界原来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的都城，因为它比商代最早的都城要早，但这次探源工程的年代学研究使这个认识受到了动摇。我们原来认为二里头遗址应该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500年或1600年，但由我们这次的年代测定看，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00年，而公元前1750年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夏朝的初年，所以它仅仅相当于夏代后半期的一个都城。

王鲁湘：跨夏到早商。

王巍：就是这样一个都城。现在二里头遗址因为缺乏文字资料，所以还不好确定，但是越来越多的遗迹证明，它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都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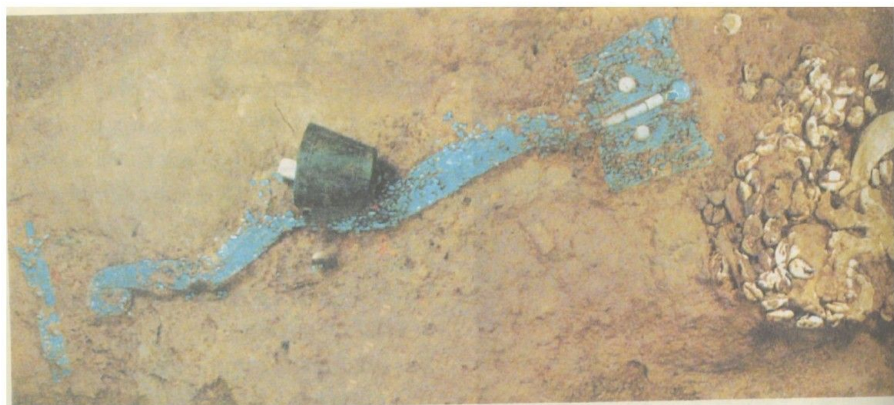
探源工程目前在二里头发现遗迹170多处，这一数量已是早年探测结果的三倍。更加令人激动的是，考古队员在这里确定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宫城。宫城总面积达十万平方米，周围有宽10米到20米的道路环绕着，城门处修有门楼，内部修建了众多四合院结构的宫殿建筑，东西厢房对称设计，院落前后相连，逐层递进。

王巍：二里头的这些发现让我很吃惊。我在1996年到1998年带队在二里头附近的偃师商城进行挖掘时，已经可以将宫城上溯到商代前期，但是没想到在夏王朝时期已经有了这样的宫城。这些中轴线的理念，包括左右对称、前前后后的递进院落，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宫殿制度的典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紫禁城，那就是一个有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宫殿。

王鲁湘：多进院落，然后是宫城、都城、皇城，多层围合。

王巍：对。夏代的后期已经有这种理念了。

王鲁湘：也就是说，这种关于都城的建筑理念和制度形式在夏王朝的后期已经确定下来了，而且一直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



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

王巍：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夏王朝，至少是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形态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形态。而这个国家又位于传说或文献记载中夏的中心区域，其年代又紧接着商之前，所以这个国家除了是夏朝还能是哪个别的国家或朝代呢？我们当时还发现了数座贵族墓葬，其中的一座墓葬出土了一件珍贵的绿松石龙。它的长度有64公分，大概由20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制作这个龙，先要用大大小小的绿松石块磨成小薄片，再进行镶嵌，这个工艺是很复杂的，我们估计它是在宫城南边的绿松石作坊里做的。

王鲁湘：绿松石的颜色很漂亮，所以在当时它比玉器还受人欢迎。

王巍：它的档次很高，起码在二里头这个时期，绿松石是最好的东西了。

龙的出现，再度证明了二里头的特殊地位，但是，能否将二里头遗址确定为夏王朝的所在地，到目前为止依旧是个难题。

王巍：考古学最重实证，只要没有出现关于夏的实证材料，比如说文字资料，就不能说二里头是夏王朝的所在地。所以，我们很希望什么时候能在某一个宫殿里面发现一些确证性的东西。像在陕西的周原，就是周人的老家，发现了甲骨文，因为有甲骨确定那是周，所以我们相信。

王鲁湘：夏朝的可能是没挖到。

王巍：我们相信夏这个时期肯定有文字。为什么呢？因为在河南舞阳有一个贾湖遗址[3]，它是一个距今八千年的史前村落。我们在这个村落的墓葬里面发现了很特别的龟壳——乌龟的腹甲上所刻划的符号非常令人吃惊，比如有“曰”字、有“目”字。这跟商代的甲骨文造型特别像，如果不告诉大家这是哪个遗址出土的，很多人可能一看就认为是殷墟的，实际上这些是八千年前的。





贾湖遗址墓葬龟壳

王鲁湘：这比殷墟的甲骨文字早了五千年。

王巍：所以我们现在隐隐感觉，殷墟的甲骨文一定有一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它到商代晚期已经相当发达了。现在不仅仅是夏有没有文字的问题，而是说文字的起源可能会更早，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记载更早文字的线索。应该说贾湖遗址给了我们一个提示：要到更早时期的遗存中去寻找。

浩浩荡荡的寻夏之旅在二里头遗址的逐步发掘中显露出来，夏王朝的存在已是毋庸置疑。司马迁的记录，再次与现实奇迹般地吻合在一起。于是，当历史无法回避地继续向前推进时，人们开始盯着《史记》里的上古传说，期盼着有一天尧舜禹时代也被认定是曾经的真实存在，禅让、治水的传说可以如夏商一样在考古研究的领域里找到有力的佐

证。

王巍：文献记载尧、舜、禹时期洪水滔天，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我们确实发现，尧、舜、禹这个时期，即距今4300年到4000年，黄河流域确实有这种气候异常的现象。举一个例子，河南新密有一个新砦遗址[4]，它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也是夏代的中期，比二里头早一点。现在该遗址附近有一条河叫双洎河，其河床高度距离遗址约25米。但是我们发现，在遗址的这个高度上曾经有洪水泛滥的迹象，这就说明洪水曾高达25米，把当时的遗址都淹没了。

王鲁湘：古书记载洪水到来的时候“怀山襄陵”[5]，刚才说的二十多米高的洪水差不多就是“怀山襄陵”了。

王巍：是的，这是考古学上的一个证据。

三、王城岗遗址

为进一步证实尧舜禹时期的真实性，考古人员对比新砦遗址时间更为久远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进行了进一步的测量，并在遗址一带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砖瓦，上面刻有“阳城”的铭文。种种迹象表明，这座遗址所在地区与传说中记载的“禹都阳城”极为相似。

王巍：王城岗遗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当时大家都很兴奋，但是城的面积才一万平方米（100×100），跟二里头遗址的一个宫殿差不多大，如果这是禹都阳城的话，那么禹的势力也太小了。

王鲁湘：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号令天下好像不太可能。

王巍：不可能。不过我们的探源工程进一步考察这个遗址时，有了重要的发现：原来这个一万米的小城只是城的一部分，这个遗址是一个有三十万平方米的大城，这在中原地区就很大了。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初步的工作，没有来得及深入发掘。不过从年代上来说，这个遗址起码比新砦遗址要早，我们称这个时段为河南文化晚期，即距今4000年前左右。这个遗址规模很大，位置又在阳城，因而有可能就是禹的都城——阳城。

王鲁湘：我们可以将它与古史传说中的禹都阳城做一些印证。

王巍：对，做一个比对吧。

四、陶寺发掘

考古证明，尧舜禹时期不是传说，那么哪里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呢？考古人员选择了距今4300年前的山西陶寺遗址进行重点发掘。

王巍：我们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两个城，一大一小，这个遗址的小城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即距今4300多年前。它有58万（1000*580）平方米，高等级的人住在城的东南角，周围是一般的贵族，其他的地方是一般的居民，墓地在城外。此后这里又建起一个大城，有280万平方米（1800*1500），高等级的人仍然在原区居住，但是因扩建而变成了城中。在它的右边是仓储区，也就是大型窖穴集中的区域。

王鲁湘：小城的早期墓地现在是不是变成生活区了。

王巍：没有，一般的人是在城的西南居住。可以看出，这个遗址的中期，城市已经严格划分成高级贵族居住区、一般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仓储区、墓地和祭祀区域，还有作坊。而且，这么一座280万平方米的大城确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修建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城需要动员相当多的人力，耗费相当长的时间。

王鲁湘：就是说社会组织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才可能搞这么大的工程。

王巍：是的，这恰恰是它权力强化的一个标志。

在深入挖掘中，考古人员对城墙的夯土层进行了分析和检测，很快，他们便得出了一个一致性的结论，这里应该是宫殿式建筑。

王巍：这座宫殿是很精美的。遗址中发现的墙都是用泥抹的，泥的表面专门做出各种纹饰，然后再抹上白墙皮，把纹饰变成白颜色。令我们吃惊的是，与刻花墙皮一起出土了一种陶做的建筑材料，一面很粗糙，一面很光滑而且有纹饰，这种东西跟战国秦汉之后一些宫殿上常用的瓦是相似的。

王鲁湘：我们常说“秦砖汉瓦”，现在看来“秦砖汉瓦”要往前提很多年了。

王巍：以前我们所谓的“秦砖汉瓦”，砖是从秦代开始的，瓦是从汉代开始的。后来考古发现证明，西周时期已有比较多的瓦，但也只是高规格的建筑才能使用。商代所发现的瓦极少。但是没想到在4100年前瓦就出现了，而且数量、种类都很多，这表明这个高等级建筑的上面是有瓦作为装饰的，所以这座建筑的主人应该就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



陶寺遗址陶器碎片

这样的结果带给考古人员的兴奋不言而喻。对如此大型的宫殿和精

美的瓦片，他们有了更高的期待。那么，在显然早于二里头的情况下，这里会不会就是尧舜的都城呢？于是，他们马上与之前发现的陶文联系了起来。

王巍：陶寺遗址出土的有些陶器上有陶文，而且是用类似毛笔的书写工具书写上去的，不是刻划的符号。

王鲁湘：其中一个陶片上有个“文”字，是用红色的颜料写的。

王巍：对，而且还有另外两个字。其中一个字上面一圈，中间一横，下面的有些残缺。有些学者认为可能是“尧”字，有的学者还有不同意见，但是陶片上的“文”字跟甲骨文的“文”字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王鲁湘：在各种器皿中发现图案的会多一点，发现文字或者符号的要少。

王巍：少得多。因为这些是在墓里随葬的，出土时一般比较破碎。我们从上百片上千片中挑选出来进行复原，这个工作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将陶寺与二里头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很多变化。比如陶寺有大的都城了，但是还没有发现宫城，宫殿虽然有一些，但是没有发现很成格局的、又有围城围绕的区域；二里头则出现了宫城，出现了中轴线对称的理念。我们在陶寺还没有发现官营的、为王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区，但是二里头宫城的旁边就有个区域专门做青铜器和绿松石制品。二者应该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陶寺中期大城代表了最早的、有点国家意思的时期，或者称为古国、邦国的阶段；二里头遗址时期则进入到一个新的王国阶段。

王鲁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陶寺中期大城的这个时代，我们的文明起源已经跨入了国家的门槛；到了二里头的时候，王国已经存在了。那么，王国是在什么时间存在的？

王巍：应该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

对墓葬的挖掘，一向是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旦墓主的身份被确定，一切的问题便都迎刃而解。2001年，为了揭开陶寺的谜团，还原尧舜禹时代的真相，考古队对富人区最大的墓葬进行了深入挖掘。不久后，一个巨大的扰坑[6]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惊，队长何驽的心一下子凉到了谷底。

何努[7]：这个墓基本上被一直从上挖到底，将墓室的90%都挖掉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墓已经空了。但是既然已经挖下去将近五六米深了，快到棺了，我们想看看究竟还能剩下什么。愈向下挖，情况就愈加不妙——被拖上来的棺板、被拉上来的用比较细腻的红色纺织品做的棺罩，还有许多绿松石片，都在盗洞的底部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片应该是原来墓主人身上戴着的某种饰品，或者是棺内所放的某种饰品，而现在居然出现在盗洞底部，墓穴破坏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了。

王鲁湘：当时你们应该很失望吧？

何努：不过这时候忽然峰回路转——我们在清理墓壁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它的头端出现了玉器，而且不止一件，竟然有六把玉钺[8]。当然这些不都是玉的，有些是美玉即大理岩的，也很精美。它以猪的下颌骨为对称轴，一边摆三把，倒立着靠在头端的东侧墓壁上，每一把玉钺都有很精美的漆木棒，木胎，彩漆绘，非常漂亮。从这个发现，我们得到启示：这个大墓的重要随葬品，可能都在四壁上。

随后，在大墓的四壁，考古人员发现了重要的随葬品：8件彩绘陶器，18件套的玉器和漆器，以及一对罕见的玉兽面。最令人兴奋的是，整个大墓挖出来，长1.7米，宽1.2米，墓棺本身已具有小墓的规模。整个墓棺好似一艘弧形的船，四壁嵌有随葬品。这些发现给考古人员的鼓励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多年的经验，队员们最终将目标锁定在最有可能标注和反映墓主身份的六把玉钺身上。



陶寺遗址玉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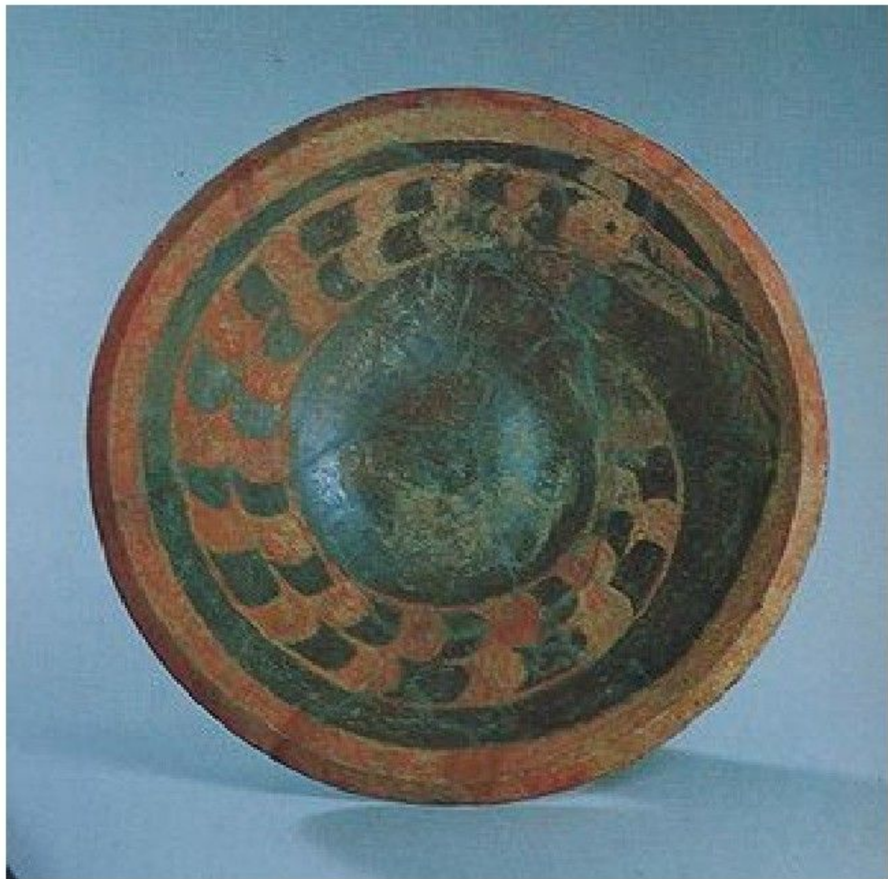
王巍：实际上这个“王”字，根据学者的研究，就是由“钺”的象形字演变而来的。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王”字就是一个“钺”的形象。

王鲁湘：下面的一横是钺的刃部。

王巍：上面是顶部，两边是风字形。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认为，起码是在陶寺这个时期，钺恐怕已经从实用的武器变为军事权力的象征了。

王鲁湘：就是一种军队指挥权。

王巍：我们发掘了一千多座墓葬，其中有九座大型墓，每个大墓中都有一个龙盘，直径约五六十公分，画着一个盘龙，好像正在吐出舌头信子一样。这个盘上的龙跟后来龙的形状实际上是不同的。



陶寺遗址龙盘

王鲁湘：它和蛇更接近一点，嘴里还吐出长信子，这个信子变成了很多分叉的样子，肯定已经夸张了。

王巍：对。我们注意到，这种盘只在大墓当中出，而且一个墓只出土一件，因此，我们觉得它可能有表明等级身份的意义。

王鲁湘：这一定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而且是一个相当高的身份的标志。这个身份好像在几代中间都是相同的吧。

王巍：这九个大墓不是同时期的，父辈、儿子辈、孙子辈都沿用这样一个传统。

王鲁湘：我大胆猜测一下，这是不是当时他们这个所谓龙族的族徽呢？



陶寺遗址陶鼓

王巍：有这种可能。出土的物品还有用陶土做的鼓[9]，很高，最高的有1.8米以上，每个墓里有一件。另外还有石头做的扁平的磬，可以悬挂着敲击。鼓和磬这些东西跟一些仪式有关，而这些东西只出现在大墓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大墓的墓主人不是一般的富人，他应该拥有军

事权力。

拥有最高的军事指挥权，就意味着墓主的身份非同小可。但墓主究竟是谁，考古人员依旧无法找到有据可循的答案。如果墓主的身份是尊贵的，那么之前发现的扰坑又该如何解释？

王巍：这个大墓墓棺的部分被捣毁了，我们发掘的时候尸骨是零乱的，但是随葬品并没有被拿走。按常理来说，盗墓肯定是为了拿东西，可盗墓者并没有拿这个墓葬的随葬品，而是有意识地把这个墓捣毁了。

王鲁湘：那是不是发生了一场革命啊？

王巍：这种现象在中型墓中也有，这就表明曾经发生过动荡。

王鲁湘：让人感到很惊骇的是，陶寺遗址出土了很多好像是被处置的尸骨，其中有一名女性青年，她的样子好像非常痛苦。她的神情让我想到宫刑，那个时期已经有这种刑法了吗？

王巍：文献记载，舜的时候制定了一些刑法，但我们还缺乏实际的证据。我们在陶寺遗址的高等居住区附近发现一了个大沟，沟里面有好多层，一层里边有十几个人的人头，有的人头被打穿了，甚至有剥头皮的现象，非常残忍。对于这种现象，现在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住在城内部的一个阶层对另一阶层的惩罚，这些人是被处罚的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生活在陶寺中期大城的人与外来集团进行的战争所导致的，因为这些尸骨和大城废弃基本同时。可以说，陶寺中期大城废弃的时候伴随着一场动荡。

王鲁湘：至少是一次大的社会动乱。

王巍：这个动荡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现在还不好说，但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社会阶层已经分化到很严重的程度：王要控制整个社会，不会仅仅用和平的方式，他可能也会用暴力的手段。

王鲁湘：过去儒家对上古三代做了一个温情脉脉的描写，但是从陶寺考古发掘看，上古社会也有很残忍的一面。

王巍：是的。

在后来的很多研究中，人们对于温情脉脉的上古传说发出了质疑。

考古人员也试图在不断地勘察和研究中找到史前的真相。对于陶寺，有人说是尧的天下，也有人说是舜的城邦，层出不穷的假设在大墓出土之后依旧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何努：把考古材料和文献对应起来，一直是我们的向往，但也以一直是我们的一个难题，因为直接的对应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确切地说，我们很希望陶寺是尧或舜的都城，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我并非完全否定这种可能，但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来佐证这个结果。都城有几个要素：有城墙，有宫殿，有王陵，还应该有礼制建筑。宗教礼制建筑无非是大的祭天、祭地的地方，这个比较好找，其重点部位也有章可循。这样大的一个都邑聚落，其布局和规划都是和它的宇宙观有关系的。我在研究过长江中游屈家岭城址、湖北天门十家河城址后，发现在他们的宇宙观当中，东南部是一个天的位置，西北部相对来说应该是地的位置。因此，祭天的场所有可能在城址的东南郊。

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2003年3月底，考古人员对陶寺中期小城进行了复探，果真在城的东南方发现了一个造型奇特的建筑。

何努：在我们的观念中，一个建筑的形状应该是很规矩的，或者是长方形，或是正方形，或者是一个完整的圆形。但这个建筑既不方也不圆，似乎在平面上是一个梯形，这是非常奇怪的。还有，我们寻找夯土建筑，是以夯土作为基准来判断，而这个建筑外面虽有一个夯土的条带，中间却是生土，这令我们非常迷惑。

2003年4月，为了再探究竟，考古队员对其进行了解剖。

何努：比较幸运的是，我们挖到了关键部位，不久就发现了一道弧形的墙，我们立刻明白，以前所谓的梯形恐怕不对，这个建筑至少应该是半圆形。而后我们在弧墙上又发现有几道槽，土质虽然是夯土，但比旁边的夯土要软一些，颜色也不太一样。一开始我们只发现了两三道槽，并没有足够重视，但随后的一场春雨，把比较干的工作面打湿了，雨过天晴我们再刮平面的时候，发现了更多的槽、缝，而且这些缝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正对着遗址东南部的塔儿山。

这样的发现，振奋着在场的所有人。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这个奇特的建筑很有可能就是上古时期的天文观象台，为了进一步考证，考古人员对此进行了有步骤地观测。

何努：2003年的12月22号是冬至，我们提前一天去看，结果大失所望。我们认为太阳走到最南端，应该进入最南边的一号缝，结果日出的时候离一号缝还差得非常远，根本就进不了一号缝，所以一号缝是不可能进行日出观测的——第一个设想被否定了。12月22号冬至那天，我们寄希望于东二号缝，结果发现日出也进不了这个缝，这下我们心里又彻底凉透了——恐怕天文观测的这种推测要落空了。

在悲观情绪的笼罩下，一个月后，即1月21日大寒当天，考古队员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观测。

何努：大寒是2004年的除夕，这一天非常冷，滴水成冰，是那一年当中最冷的一天。可是，那一天的观测结果是最令人振奋的，我们竟然在东三号缝看到日出了，这证明我们的推测应该还是正确的。我们的心潮起伏跌宕、时好时坏，一会儿是绝对的绝望了，一会儿又重新燃起希望。对于这一发现，天文学家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尚书·尧典》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被无数次引用，就是“历象日月星辰，竟授人时”。“历”是计算，“象”是观测，也就是说，观测和计算太阳、月亮、星星运转的天象，来制定立法颁布给臣民，让他们安排农业生产、宗教祭祀等一系列活动。《尧典》的这句名言被当作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一个最高水平的代表，但疑问就在于《尧典》到底能早到什么时候。很多学者认为，《尧典》所记载的天文学，只代表了中国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并不能代表四千年前中国的天文学发展水平；而我们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了至少在四千年前，《尧典》所谓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已经存在。

王巍：古观象台的发现应该说是令人非常震惊的。英国有一个巨石阵，很多人都认为它与天象观测有关，但天文学界却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观测点。比如说，我看这个天象的时候从这个缝望过去，然后看另一个天象从另一个缝看，这样的话就有比较大的随意性，这是它的一个致命弱点。我们古观象台的观测点是固定的，而且我们也找到了观测的圆心，天文学家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圆心可谓一锤定音。否则，他便说你的观测是要不停地移动的。

王鲁湘：这个随意性太强了。

王巍：所以说，我们这个遗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可以确证的天文遗迹里面最早的一个。英国的巨石阵也是四千年左右，后来延续的

时间比较长，可惜观测点不固定，而我们的遗址不但有固定的观测点，而且年代也更早一些。

五、夏文明的推想

王鲁湘：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比较侧重于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于是我们把文明的兴衰更多归结为社会文明内部的一些原因。而西方学界有时候则倾向于认为人类文明更受到大自然的制约，我们的探源工程是不是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多。

王巍：是的。从中国的范围内看，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很多地区原来的强势文化衰落了，比如说良渚、红山、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等。接着它再出现的文化人口很少，文化的发达程度显著地减弱，这反映了一种由盛转衰的情况，而且不仅仅在一个区域。

王鲁湘：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

王巍：所以我就探索变化的原因，结果发现环境因素非常重要。总体来讲，尧、舜、禹这个时期的北方地区总体偏干旱，气候波动很大，而南方是偏涝的，我们称为"南涝北旱"。长江、黄河下游的很多遗址都是在崮堆上，可以证明我们的推测。

王鲁湘：良渚文化就是在堆起来的土山上头。

王巍：这恐怕就是为了防止水患的，水患对当时的人们有很大的威胁。

王鲁湘：也就是说，很多古代文明的急剧衰落，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环境的变化。

王巍：我觉得不能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仅仅归结为环境，但环境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比如说大洪水曾导致整个遗址被淹没，然后人们有可能有组织地对洪水进行一些抵御。中原地区对洪水的抵御恐怕是它崛起的原因之一。陶寺遗址早期小城和中期大城时期，始终是以粟和黍作为主要农作物，但也有水稻的栽培，而且还有非常零星的小麦。水稻的出现我们倒没有觉得太意外，让我们意外的是小麦开始在这个时期被引进了。小麦的产量比小米高得多，所以说陶寺时期的农业应当有了相当的发展。有一种观点认为，生产的发展是文明的基础，我们这次的

发现印证了这个理论。随着生产的发展，粮食有了剩余，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于是一部分人开始脱离农业生产。

王鲁湘：开始有了社会分工。

王巍：脱离了农业，从事手工业、管理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起源是文化起源的前提。我们这次在动物考古学方面也有很重要的发现：大约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时候，绵羊开始出现在中原。绵羊的出现引起我们很大的关注，因为它是西来的东西。

王鲁湘：麦子、绵羊从西亚来，说明这时候和那边已经有一种文明的通道。

王巍：这些同时在中原地区出现，是很值得思考的。我们还发现了砷铜合金的青铜。一般来说，青铜是铅锡合金，但还有一种青铜是砷铜合金，这个砷青铜很早就出现在西亚地区。我们原来认为中国没有砷青铜，但在陶寺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砷青铜，它的冶炼技术应该是从西亚那边传来的，这可以说是中国与西亚文明接触的最早记录了。

在对陶寺遗址发掘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对中原文化日渐强大并流传至今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地剖析。

王巍：为什么周围地区相继衰落，而中原地区却还在继续崛起，最终导致了夏王朝的诞生呢？我觉得有下面几个原因。第一，虽然环境因素相同，但中原地区在粟和黍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水稻，后来又有了小麦，多种农作物的种植结构，更有利于抵御自然灾害。旱的话可以收获粟和黍，涝的话可以收获水稻。

王鲁湘：就是说他们总会有些收成。

大禹治水成功地让上古时代的淮河流域水流顺畅，永不闹灾。在众多的史前传说里，对诸神给予的帮助，大禹一直心存感激。他命人在会稽山修筑了九鼎，在九州标注出猛兽、邪神、厉鬼出没的区域，以使中原地区的百姓在出行时与神灵互不干扰，趋吉避凶。有专家分析说，这些互敬互畏的祭祀之风，也是中原文化得以振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巍：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其宗教色彩极其浓厚。贵族的随葬品有琮[10]、璧等宗教器物，而且，贵族还被埋在祭坛的附近。

王鲁湘：因此整个社会是一个神权社会。

王巍：辽西的红山文化也是如此，随葬了很多玉器，还建有女神庙，宗教色彩也非常浓厚。而尧舜禹这个时期的中原地区，则有了更多的世俗色彩，在宗教方面的真正投入并不多。就处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来讲，中原地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反观长江下游地区，那里的先民遇到自然灾害，只得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去求神，结果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世界上有些古老文明的衰落，包括玛雅、印加，好像都有这种经历。

王鲁湘：这是比较理性的一个尺度，即它有一些祭祀，但是没有淫祠。

王巍：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国家政权阶段，这种组织不仅在抵御自然灾害的时候是十分有效的，在军事力量方面更有决定性的意义。军事力量的强大有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比如说舜禹时期将很多曾经强势的部族，如三苗等，给流放了，靠的就是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我觉得，环境变化是一个大的背景，而它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处理人和神之间关系的平衡点、高度的组织化导致的军事力量的强大，才是中原文化最终延续发展的主要原因。

探源工程开展至今，也只是刚刚开始，用“任重而道远”形容并不为过。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老文明相比，华夏文明自然毫不逊色，这是我们骨子里难以抹杀的骄傲。对过往文明的追溯和拷问，探源工程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人们对远古时代的思索，必定会推动这样的勘查在中华大地上一次又一次上演下去。

良渚的神灵

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究竟诞生在哪里？1929年12月，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头骨，让我们触摸到了这片土地上远古人类的存在，但是这些原始人从何时、何地开始出现了社会、出现了国家、出现了文明，我们的答案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中去寻找。

以浙江省杭州市东北部的良渚镇命名的良渚文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能找到的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古代遗存。它分布于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区域，包括了现在的杭州、苏州、上海、无锡、嘉兴等地区。

一、发掘前奏

良渚地区最早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36年，一个当时年仅24岁，名叫施昕更的良渚青年，开启了日后一系列发掘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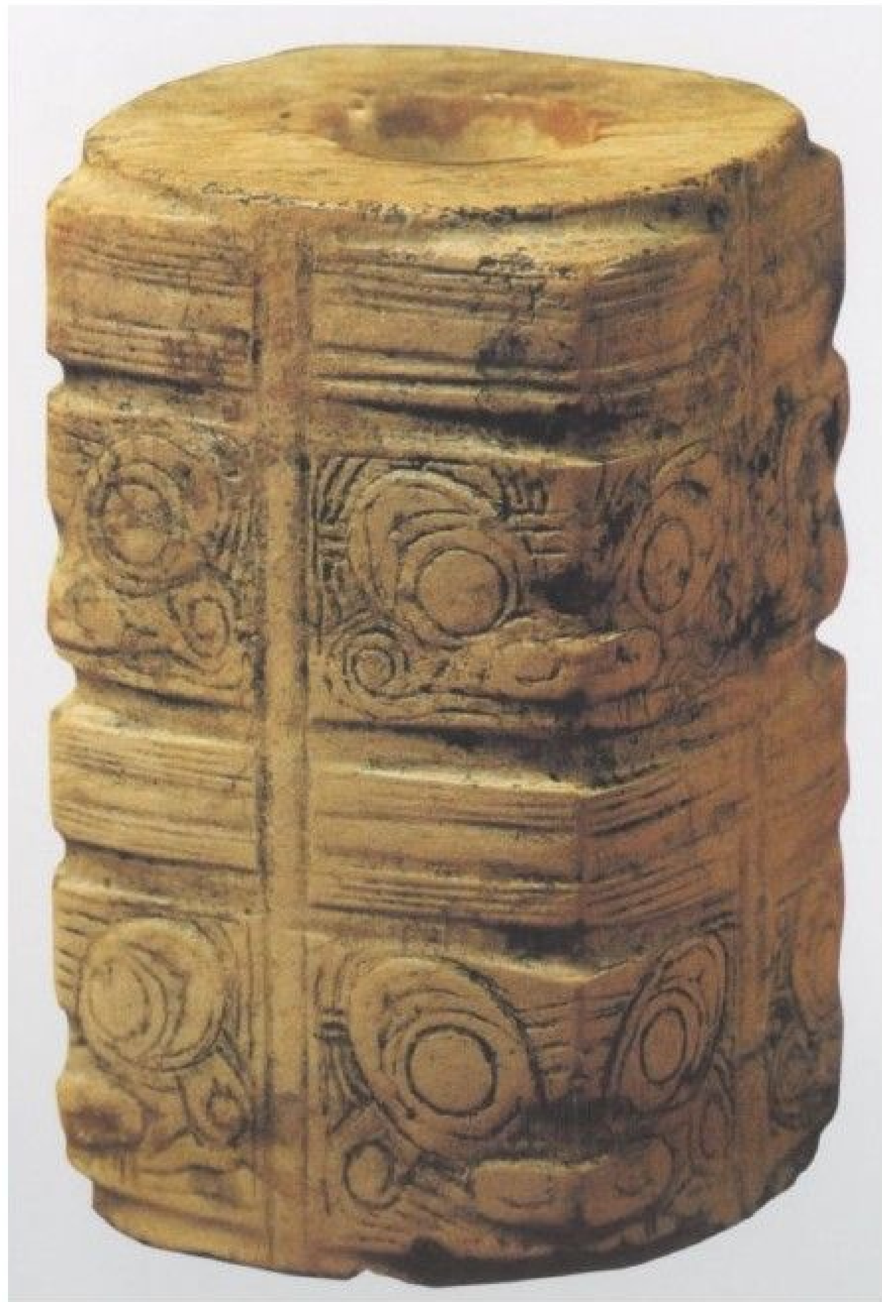
王鲁湘：牟先生您好，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的，当时施昕更先生是出于什么考虑想到要到良渚这一带来进行考古调查呢？

牟永抗[11]：鸦片战争以后，知识界出现了探索中华民族历史问题的热潮。这时国内历史研究对传统文献产生了一些怀疑，希望能够从另外的渠道来获取新史料，以正确地解读我们国内的历史。在这个基础上，有些学者引进了西方的现代考古学，从而与我们传统的以“证经补史”为主的经史学并立，形成了探索古代的两条道路。当时的探索重点是黄河流域，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了。辛亥革命以后，江南的一些有识之士考虑要把一些先进科学运用到本地来，于是在三十年代创立了西湖博物馆，当时的馆长是学生物的董聿茂[12]先生。1936年初，杭州市在西湖西北的古荡老和山下（在今浙大玉泉校区内）建造公墓时，曾陆续出土一些石器和陶器，这些发现引起了西湖博物馆的重视，并于5月31日对这一处古遗址进行试掘。施昕更先生当年是西湖博物馆地矿部的一个助理员，他参加了那边的试掘，发现古荡出土的几件古器物在他的家乡附近也发现过。施先生于是回家乡正式做调查，当时就发现了一些陶器跟石器。他知道这一带的农民有挖玉的风气，但是这些玉跟这些陶器和石器是什么关系，他还不很清楚，而且也没有挖到。

王鲁湘：实际上这个地方发现古玉的情况是自古有见。

牟永抗：是的。我们在刚才提到的杭州古荡地区发掘汉墓时，发现过两组玉器。这说明至少在汉代，就有人开始搞考古收藏。以后我们在湖州发掘的汉墓里也发现了良渚的一些古玉，所以这里收藏古玉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后来春秋墓葬里也发现了良渚玉器，因此良渚玉器得到认识的最早历史可以推到春秋。

王鲁湘：这就推到了两千多年前。后来南宋的官窑瓷器有琮式瓶，肯定是瓷瓶的设计者看过良渚玉琮而且照着来做的。当然，这些工匠未必知道它们是什么年代的，以及是做什么用的。



良渚文化玉琮

牟永抗：这种琮式瓶在浙江地区一直流传下来，清初这类东西还是比较多的，雍正时期还做这种蓝色瓷的。

王鲁湘：那很长时期以来，人们是不是一直把这个东西当作三代以

后的？

牟永抗：玉是一种高硬度的材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玉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在没有金属器以前，琢玉是不可能的事情。《礼记》上面提到过玉，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这一带发现的玉器只是周、汉之遗物。一直到1928年在安阳发掘到玉，中国玉的历史才提前到殷。能够把玉器从西周推到商的晚期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此后一段时间，人们就不敢把玉再往前推，尽管我们在五十年代就发现了史前的玉器，但不敢认啊。

到了20世纪，西方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原地区先后发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因此，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诞生的中心区域，而其他地方的文明，则都是从中原传播过去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偏居江南的良渚。

牟永抗：大概从我开始工作以后，学界对良渚尽管还是很重视，知道有这么一种文化传统，但是把它的年代看得很晚。当时学界在发展不平衡理论的影响下，认为中原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良渚地区还在蒙昧时代。

王鲁湘：考古界似乎把它和中原龙山文化看成是一体的。

牟永抗：当时学界认为它比龙山文化要晚得多，是因龙山文化向南传播，跟当地的硬纹陶相结合所形成的。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1956年浙江博物馆成立的序言，这个序言是由当时的著名学者曾昭燏[13]女士起草的，她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早于吴王寿梦元年[14]，也就是把良渚文化的年代定在春秋时期。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浙江、上海、无锡、苏州等地一系列的考古发掘，研究者们逐渐发现，这一地区出土的器物，在特点及组合形式上，与中原龙山文化有很多不同之处。于是他们开始思考，先前对于良渚文化的认定，是否出现了差错；先前的中原中心论，是否也出现了差错呢？

牟永抗：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要编写一本《新中国考古收获》，就在这些器物上探索，觉得这里发现的黑陶跟原来龙山文化的黑陶不一致，所以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的前辈夏鼐先生就正式提出了，对于江南这一块以黑陶为代表的文化

可以单独命名，他把这个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这四个字叫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以前，中华大地上是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一统的局面，所以在这里面忽然又出现一个单独的文化实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良渚文化黑陶高柄盖圈足罐

王鲁湘：也就是说，良渚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一个考古学类型，在学术界已经被提出来了。

牟永抗：到了七十年代碳14技术被引进以后，良渚文化的年代才被比较准确地肯定下来。钱山漾[15]下层的测定年代距今4700多年，而邱城下面的红陶层则距今6700多年。

王鲁湘：良渚的时代成倍地往前提前了。

牟永抗：是啊，这样整个学术界对良渚地区史前文化的认识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1977年10月底，在南京召开的长江流域新石器考古学会议上，我们提交了一篇论文，把太湖流域的考古文化定为三个阶段，叫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这种划分被苏秉琦[16]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加以概括，成为我们中华大地上六个文化区块里边的重要一支。

王鲁湘：这六个区块都有哪些？

牟永抗：第一个是以晋陕豫边界地区为中心的地区；第二个是山东及其邻省一部分地区；第三个是湖北及其邻近地区；第四个是长江下游地区；第五个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第六个是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有关长江下游地区，苏先生的表述是以太湖为中心的。

王鲁湘：这种区分我们把它叫做“满天星斗”，“满天星斗”学说对于“中原一元论”学说来讲，的确起到了挑战的作用。

牟永抗：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在苏先生区系类型说的影响下，我们江苏的朋友、上海的朋友，围绕这个中心共同奋斗，才创立了以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南岸的考古学文化。

打破了华夏文明起源于中原中心论的良渚文化，注定要不断地给人带来惊喜，在1974年，中国玉器出现的上限也被它用强有力的事实打破了。

牟永抗：1973年5月，以南京博物院考古部为主体的考古队在苏州草鞋山的发掘取得了突破——这个地区经常见到的玉器竟然是良渚文化的产物。玉器出现在良渚文化的墓葬里边（198号墓里），跟陶器共存。这第一个发现还不能得到大家的承认，也没有被公布。到了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的张陵山4号墓又见到了这个东西。张陵山4号墓并不是正式的考古发掘，当时农民在这里挖到玉器，江苏省的同行去那

里调查，发现玉器的人告诉他们挖到玉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再次进行发掘，结果发现有陶器。这就验证了1973年草鞋山的那个发现。这些发掘结果在1977年的会议上一公布，马上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同，取得了很大的影响。

二、反山发掘

1977年10月，南京召开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会上，江苏同行公布的考古成果引来了众多关注，良渚文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提高。然而，对于牟永抗来说，同行取得的成果却让他感到深深的惋惜。因为早在1963年，他就在一次发掘中发现过良渚玉器，只是由于当时传统观念的束缚，疑惑中的他选择了沉默。而到了此时，传统观念的枷锁已经被事实打破，一片广阔的前景摆在了他的面前：作为良渚文化的中心区，良渚地区也一定有更加令人兴奋的古代遗存。终于，在1986年，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发现震惊了全世界。

王鲁湘：著名的反山墓地出土了良渚文化迄今为止最精美、级别最高的玉器，那么当时这个遗址是怎么发现的呢？

牟永抗：1971年，我们做调查的时候路过这里，不经意地发现这里的土壁上有红烧土屑，这肯定是人为烧过的。遗址上面有处人家，我们就在他家吃饭。老乡在烧饭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这地方为什么有红烧土屑，老乡说是因为1958年炼钢。后来他又说，1958年炼钢是在公路边上，这里没有炼钢。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里面有红烧土屑？于是我们就开始注意这个反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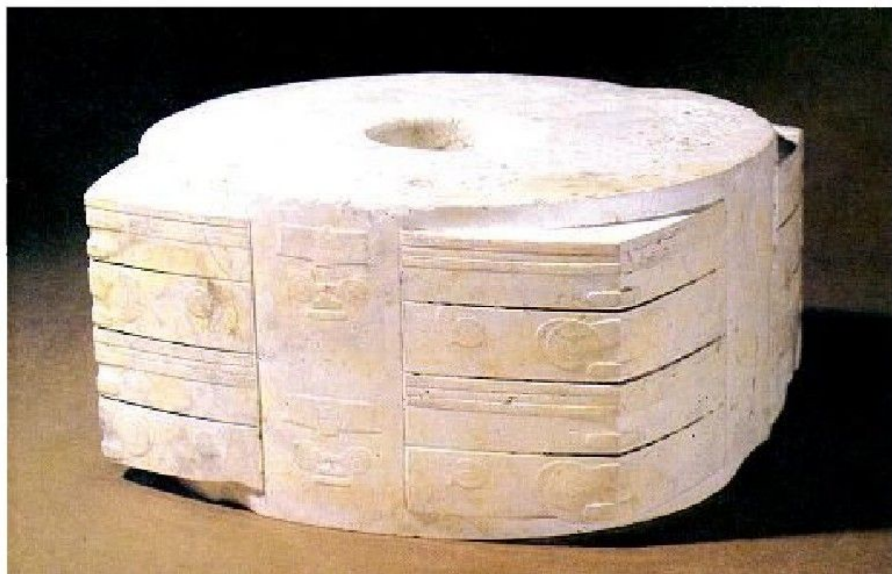
到了1986年，为纪念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浙江省考古队踌躇满志，在良渚地区展开了一次全面的搜索和探挖，早就引起考古队注意的反山，终于开始了正式发掘。

牟永抗：良渚遗址的最早发现地是在杭州地区，可是到了50年代以后，良渚文化的一些重要发掘比如寺墩的发掘是在江苏，福泉山的发掘是在上海。因此在反山发掘的前一年，我们决定在这个地区找几个土堆好好挖一挖，结果挖一个地方空一个地方，就是没有重要发现。最后就剩下这个反山了，这是当年发掘反山的一个动机。当时有个工厂的围墙要穿过这个遗址，我们就以抢救性发掘为借口对反山进行挖掘。可是开始挖掘以后，一号是汉墓，二号是汉墓，一直挖了十一个汉墓。

王鲁湘：那不是越挖心里越凉了吗？

牟永抗：不过就在挖第十二号墓的时候，有队员挖出来一块土，土

的反面有两个小玉粒，还有一片漆器，这就是良渚文化的墓了。考古队员陈越南在继续挖的时候碰到了玉琮的转角，这就可以证明挖到的是个玉琮了。这时已经挖了一公尺深，另一个队员王明达马上跳了下去，同时喊道："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反山发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我们把整批人员都调到这里，当时发掘的时候，下面的东西很多。



反山墓地玉琮

王鲁湘：好像没有落地的地方，只能趴在上面。

牟永抗：这还不行，得想个什么办法。于是我们就在坑的四个角，打四个茅竹桩，挂绳子下去，再放上板吊着。

王鲁湘：人就趴在上边，像吊床一样。

刘斌[17]：对，边清理边往后退。整个墓的清理大概花了四天时间，我们就整天呆在里边，几乎是动都不动的。

三、瑶山发掘

1986年反山良渚墓葬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让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同时也使当地的民间传世古玉价值陡然剧增。1987年5月1日，一些人利用假期在距反山5公里的瑶山盗掘古玉，而这竟引发了良渚文化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

王鲁湘：瑶山这个地方发掘的时候是哪一年呢？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哪个遗址呢？

牟永抗：1987年5月5号我们正式到现场进行了发掘。早在这之前，即1986年我们在反山发掘出了良渚文化的玉器，当地的人知道这种玉器非常有价值，于是，他们就利用五一放假的时间煽动群众到这上面来盗墓。

王鲁湘：他们先下手了，有人报告给你们吗？

牟永抗：我们放假休息，没人值班。我们三号才上班，四号赶到遗址区。而当我们上来的时候，有些农民还在盗。

王鲁湘：有没有被他们挖走东西？

牟永抗：当然挖走东西了，挖得千疮百孔。但是我们和警察来了以后，乡长到现场做工作，所以当时老百姓就交回来六个玉琮。

刘斌：当时判了13个人，根据收缴文物的多少量刑，最重的一个人好像判了12年。

王鲁湘：判得还挺重的。

刘斌：这样一来这一地区的不正之风就被压住了，所以这个打击还是很重要的。

王鲁湘：瑶山从沙盘看是一个小土包，这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堆积形成的？

牟永抗：整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它的下面是石灰岩，瑶山遗址就建在山上。不过遗址的形态不是山上的原始形态，是人为地在山顶上

制造了一个平面。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个山顶在1958年是一个林场，林场种的都是桃树。当时的种植规格是每种一棵桃树，要挖一米深、一米见方的坑。我们发掘时，当年桃园那些坑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发现的顶面并不是当年的顶面，当年顶面比现在还要高。像3号墓就明显很浅，按照现在的深度，棺材放下去就要露出来，所以它少了至少一公尺以上。

王鲁湘：也就是说山顶有一米多地表层消失了，于是良渚文化的很多信息也随之失去了。



瑶山祭坛遗址

牟永抗：瑶山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祭坛。它的面积有400多平方米，在近中部的位置挖出了一条南北长约7.7米，东西宽约6米左右的回字形沟槽，沟槽宽约1.7-2.1米，深约0.65-0.85米，沟槽中用山下纯净的灰色黏土填满，与山上原来的红黄色土壤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在平面上形成了内外不同的三重色土。

王鲁湘：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当时的人选择这个地方做祭坛还是很有道理的。按风水讲，那条山是来龙，前面的苕溪等于是去脉，前面有几个小山包是砂，他们居住的地方叫做穴。中国人选择葬地的这种风水观，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了。

牟永抗：所以葬礼是构成当时礼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王鲁湘：您是最早参与发掘良渚文化的考古工作者之一，而且主持了几个重要遗址的发掘。集您这几十年的研究心得，您认为良渚文化的发现，以及对它内涵的认识，对于认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性意义？

牟永抗：就我个人经历来说，十年动乱以前，我们基本上都泡在野外，以收集东西为主，把四面八方的材料填充到脑子里。十年动乱以后，我恰好得了脊髓炎，下肢瘫痪，不会走路了，于是脑子开始想一些问题，觉得原来的方法不对，太偏重于物质层面。考古学发现的是古人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这都是物的表现，可是我们要复原的是人类社会。我开始感觉到，物质层面背后的观念形态应该值得重视，所以在上个世纪末以前，我以“玉器时代”为主题来概括良渚文化的研究成果，把玉器文明作为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很深的爱玉情节，也是因为玉器在文明起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良渚美玉

1986年，在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整整半个世纪之后，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著名的反山墓地，11座墓葬中出土精美玉器1200多件。第二年，瑶山祭坛遗址又出土玉器700余件。两次发现的玉器，不仅总数超过了以往的总和，品种、纹饰也多有新的发现，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于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困扰着考古人员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4000多年以前，金属工具尚未出现的石器时代，如此众多硬度极高的玉器，是被什么人用什么工具雕刻、打磨而成的呢？

王鲁湘：良渚玉器特别是反山和瑶山这些高级玉器的出现，的确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四、五千年以前的人怎么能造出这样精美的东西？

牟永抗：玉器的硬度非常高，当时在没有高速度、高压力机械的条件下，古人凭借什么才能做到这么精美？只能凭两方面：一是毅力，一是全身心的投入。这是通过十个手指、完全手工的劳动才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人估计，如果把一块五公分到十公分这么大面积的玉料一分为二，单是一个人用纱、用绳把它切割的话，要一年的时间。特别是这个徒手阴线刻，在三公分到两公分的方寸之内，把神人兽面的头像整个包含进去，现在即使戴了老花眼镜或放大镜看都很难做到的。

王鲁湘：这相当于四千多年以前的微雕了。

牟永抗：所以对那时的人来说，这种材料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比它物质层面的价值更大。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我们在文明进化的模式上有个玉器时代，玉器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标记。比如这两件标本，就非常有意思。

王鲁湘：好像是半个琮。

牟永抗：对，这是个片切割的标本。它是带弧形的，两头深，中间鼓起来的槽沟正是一个片锯来回往返切割的痕迹。这是一个非常难得遇到的标本。

王鲁湘：这另外一件是钻孔标本。它好像是从两头钻的，因为没有对得十分地准，所以在中间形成了一个台阶，在圆壁上留下了很多的旋纹。



良渚文化玉琮钻孔标本

牟永抗：是的，钻孔也是当时良渚制玉工具的一个重要标本。为什么在中间留个台，而且两边的深度大体差不多？在加工的时候是钻头旋转，还是两边仅仅加压，钻头不转，加工对象转？

王鲁湘：就是工具两头夹着一个钻管，不断地往里头加砂加水，然后两边施压，但是转动的是这个琮本身，所以才能够同时在正中间相接。

牟永抗：我们可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制造生产用的石器的话，啪啦一下把一个石头打开就可以了，但如果把这条缝锯下来，要花很多时间，投入很多劳动量。这有力地证明了当时的人类对这两类原料的估价

不一样。

王鲁湘：人们在玉石上花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本比较多，在那些普通石头上花的比较少。

牟永抗：因为人们通过石制工具所获取的是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而通过这些玉器所获取的则是超越衣食住行的精神生活、信仰和观念形态。玉是观念形态的物化，是精神生活的载体。

王鲁湘：也就是说，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突变力量，其实就是精神的动力。在这个陈列柜里，我看到好像有这样的意图，就是把良渚玉器最主要的三种类型，琮、钺和璧放到一起。

牟永抗：这三件玉器，是当时良渚社会权力结构的三个代表，构成了良渚文化玉器的主体。琮是神权的代表，钺是军权的代表，璧是财富的代表。财权、军权和皇权，在当时虽然不是非常明确，但实际上这三权，就是上层的权力结构。

王鲁湘：这三权是合一的还是分开的？

牟永抗：是分开的，但也有交叉。

在遥远的年代，为了打造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神器，我们的祖先曾费尽千辛万苦，通过双手和最为原始的工具，将坚硬的玉料切割、加工、打磨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玉器。然而，处于文明初始阶段的祖先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玉作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呢？

牟永抗：为什么选择玉呢？我的感觉是，玉代表了人类对光的一种向往、祈求。

王鲁湘：几乎所有的原始宗教信仰都是崇拜光的。

牟永抗：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农业需要光的作用。当时人们虽然不知道光合作用，但是人们知道只有风调雨顺、光线充足，禾类作物才可以丰收。处于采集时代的人们，如果今天采集不到东西，明天可以采集得到；可是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如果一季没有收获，就不是一天两天没有东西吃了，因此，人们对光的崇拜、恐惧心理就更大了，总希望能够控制光，使之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对于光，人们既害怕它，又希望去支配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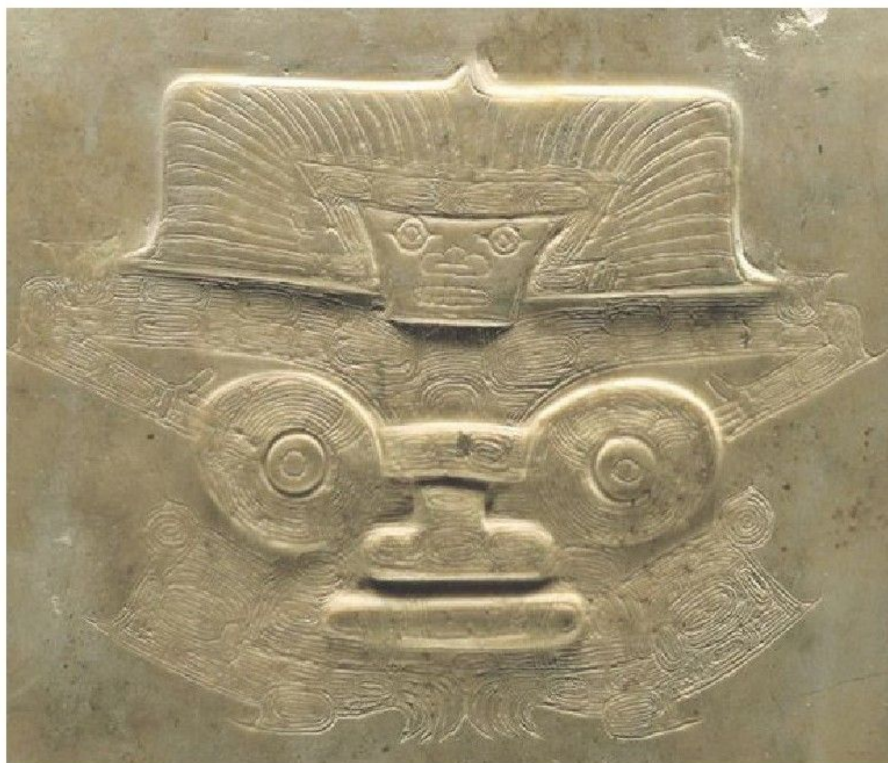
王鲁湘：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西方人崇拜的钻石，它的光泽度比玉要高，这种石头是不是更适宜代表光呢？

牟永抗：可是钻石呈现的是强烈的反射光，是直线光，是一种强烈性的表现。西方人对光的追求跟我们东方完全相反。其实从玉矿资源上讲，西方玉的产地比我们多，它们的产量都是上万吨，但现在他们把玉用做装饰材料，跟我们把大理石当地砖一样用。玉所反射的光芒，是淡雅的、柔润的，不是强烈的、散裂状的。所以我提到，东方观念形态的核心背后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这从玉文化里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王鲁湘：对，儒家常说一位君子的品性应当是温文尔雅、“温其如玉”的[18]。

牟永抗：所以玉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它后面的精神状态是跟中华民族的传统连在一起的。

神人兽面像



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像

在良渚玉器众多的精美纹饰中，一个神秘的图案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这个图案反复出现在几乎所有种类的玉器上，绝不是随意刻画的。它头戴羽冠，身骑神兽，俨然一个蓄势待发的英俊战神。图案的精致程度也达到了极致：通过放大镜可以发现，在一毫米宽度内，竟刻着四五条细线，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它的虔诚信念。对良渚人来说，它应该是他们崇拜的一个神。考古学家们也将它视为良渚文化的一个标志性图案。

牟永抗：良渚文化里所有的玉琮上面都有我们叫做“神人兽面像”的图形。它的上面是神人，下面是兽。一开始我看错了，把上面那个帽子看成是额骨，把下面两个兽眼睛看成是神人的眼睛，把兽眼睛旁边的神人手臂看成了神人的眉毛。神人的两个手，我看成了神人的两个颧骨；兽面下的两条兽腿，我看成了神人的下巴。

王鲁湘：你把它整体地看成一个人，没看到是神人和神兽的组合。

牟永抗：因为刚出土的玉器还不能洗，我们把它摆在干燥剂上，让它自然干燥。我用照相机给它拍照以后，用放大镜观看，发现原来所认为的眉毛上面有手指甲，这才明白这个地方是手，于是神人兽面便分开了，这是我认识的第二阶段。那么上面的部分是帽子吗？其实看作帽子是不对的，因为它里面还戴了一顶帽子，“风”字形的帽子，怎么会戴两顶帽子呢？

王鲁湘：有人说这个是在冠饰上插的羽毛。

牟永抗：羽毛外面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偶然在纳西族的东巴文里找到了。东巴文的“天”字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它象征天空。这样解读以后，我认为它是东方的太阳神，是太阳光的神化。

王鲁湘：那么下面这个兽是现实自然界中的某种兽，还是古人完全想象出来的一种兽？

牟永抗：应该说它既是具体有所指的，但又不是。它是具体的兽被人抽象、又加上人的观念以后的产物。比如说，它的爪像老虎，但是老虎的爪子只有在发怒的那一刹那才露出来，这是人们把老虎刹那间愤怒的某些形象固定下来了。如果它具体地是哪个兽，就不能成为神兽；它只有既是又不是具体的兽，才高于具体的兽，才能成为神兽。

王鲁湘：那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兽呢？

牟永抗：现在还不能确定，只知道是个猛兽。我曾经在九十年代后期说，这个是东方的太阳神，跟西方骑在马上的太阳神有所区别，跟埃及坐在船上的太阳神也有不同，这个是骑兽的太阳神。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神徽，当时我觉得这种看法也不错，不过后来我觉得这个词不是很确切，因为神徽是固定的，像徽章。

王鲁湘：这个神兽的图案也相对固定了啊。

牟永抗：不是，它的形态一直在演变，所以如果说是徽化的就是定局化了。但我觉得“神徽”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它表明当时还不是一神崇拜，但也不是万物有灵阶段平等的多神崇拜，而是在多神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主神崇拜。

王鲁湘：就像古希腊的时候有众神崇拜，但是众神中间有一个主神宙斯。

牟永抗：人类宗教信仰的发展，就是经历了多神崇拜、多神中的主神崇拜、一神崇拜这三个阶段。我们按照这个模式来看，世界其他几个文明进入文明阶段的时候都出现了一神崇拜，出现了教主、教义。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还没有发展到一神崇拜，而是萨满巫师的系统，这个神人兽面就是一种主神。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原创力，中华文明在没有进入一神宗教的阶段就进入了文明时期，这就是中华传统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鲁湘：这个主神的出现，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环太湖流域地区在信仰上，已经趋于统一了。

牟永抗：应该说是开始出现了一统的雏形。神人兽面图是有一个演化过程的。现在反山、瑶山所见到的神人兽面像是它的早期阶段。其实，在良渚文化的器物中，除了玉器最具代表性以外，还有很多石器和陶器也很重要。

五、良渚石器



良渚文化石锛

牟永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良渚文化的石器，在良渚文化石器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石锛尽管良渚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发展阶段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成批的石锛上面依然保留了当时打制的痕迹，只是在刃部局部磨光。由此看来，当时人们对劳动价值成本的计算，还是很精明的。



良渚文化石斧

王鲁湘：这个石斧做得就比较精细了，显然不是用来进行砍伐的农具。



良渚文化石犁



良渚文化破土器

牟永抗：这个应该是武器，是在狩猎武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战争用武器。作为良渚时期物质生产层面高度发展的最重要标志，是发明了石犁。原来那些石锛，或者石斧，都是一种断性的开垦工具，只能一次一次地改变土壤的结构。犁的出现标志着连续性破土工具的出现，能够整体上改变土壤结构。更重要的是，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需要排水，有了这个犁，它就可以犁出沟来，引水排水。这就表明，当时以水稻种植业为标志的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

王鲁湘：那这个破土器呢？

牟永抗：破土器是良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很明显是一个被捆绑的东西，后面还有一个缺口。它是斜向的，刃是三角形的，上面是翘起来的。如果要开一条水沟的话，就先用它在地上画出很直的两条线，然后用犁把中间的土起出来。所以这个斜把破土器和推沟犁，是构成当年水稻种植业发展的重要工具。



良渚文化石镰

第三个就是石镰。在农业起源上，水稻起源的一个很大分歧就是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区别。其实，野生稻稻穗中的种子是逐次成熟的，而栽培稻是整穗成熟的，所以栽培稻可以割，野生稻只能采集。而石镰的出现，正是栽培稻出现的证据。

王鲁湘：栽培跟采集不一样，采集还是一个自然经济，而栽培则是生产型经济。

牟永抗：所以从采集到生产经济，我们还看到了一点，那就是人们开始懂得了储存，懂得了积累财富。在农业没有出现以前，采集时代的人是没有财富概念的。中午吃完以后晚上有没有吃的是不管的，反正到时候总有得吃。而农业出现以后，有了财富积聚，整个社会就开始大踏步前进了。

六、良渚陶器



良渚文化鱼鳍形鼎足陶器

王鲁湘：好像良渚的陶器比较有名的是黑陶，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鼎的足像鱼鳍一样。

牟永抗：是啊，鱼鳍形鼎足也是我们当时确定良渚文化的时候给它定的名字，这个陶器的发掘地点不在良渚，而是在良渚以北的太湖边，靠近钱塘江那个地方。我们把这种扁的腿叫做鱼鳍形，现在考古界、学术界都接受了，认为鱼鳍形鼎足是良渚文化的一个特点。不过非常遗憾

的是，现在看来，我们当年用的这个词还有所欠缺。

王鲁湘：准确地说应该是什么呢？

牟永抗：这个应该叫翅形。鱼鳍形的两边都呈弧形。你看良渚的这个陶足，实际上外面都是直的，里边是弧的，所以是翅形。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马家浜、松泽、良渚这些个文化系列中间，还同时存在着许多相近的考古学文化，并不是这么一支，所以有了翅形和鳍形两个不同的序列，这就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过程，是个更复杂更广泛的过程。

王鲁湘：实际上鳍形是有的，我在苏州博物馆就看到跟鱼鳍一模一样的鼎足，还画有鱼鳍的花纹。

牟永抗：对啊，它外面是扁薄的。实际上，鱼鳍形和翅形有一个共同的地方：炊器下面支撑的三条腿是实心的，不是空心的，这个是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炊器的特色。

王鲁湘：黄河流域的鼎足中间是空的。



良渚文化豆器

牟永抗：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太平洋北岸，就是中南美洲，它那里的陶器里也有三足器。所以提出太平洋文化圈这个概念是很有学术意义的一个探索性课题，相对于环地中海文化圈，这个圈博大精深的多。

你看这三件，它们都是豆，它这里反映了我们东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烧制的时候不加沙，全是泥的，因此不能加温，不能炊煮。

王鲁湘：那就是只能做陈设器或者礼器。

牟永抗：对，不能炊煮。它旁边有个圈，里面明显是摆东西用的，应该是神具。我们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或者缩小一点看，东亚和西亚的饮食文化就很不一样。西餐没有主食副食之分，所以西餐的餐具都是

盘，大大小小的盘。我们东亚以粮食为主食，一道一道菜是副食。副食装在这些豆中，是给众多人享用的，主食则是一人一份。所以副食和主食的分离，是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特色。这些器具当然可以用在饮食上，也可以用于祭祀，所以有意把它的形状抬高，提高它的视觉水平。

王鲁湘：所以孔夫子很小的时候，人家就能看出来这个人以后是儒家。因为当别的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他就学摆豆俎这些东西。

七、神秘的古良渚国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反山、瑶山等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发掘，以及对玉器认识的增加，一个等级分明、有着统一信仰的文明古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然而，在考古学家眼中，藏在这些精美器物背后的，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社会。进一步的发掘也证明，浙江省余杭县的长命乡，应该就是四千年前良渚古国的中心城址所在地。现在，这里建起了一个面积为42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在这个区域内，任何需要动土的工程都要经过文物部门和考古部门的审批。

王鲁湘：刘斌，现在的良渚文化保护区是指哪一片区域？

刘斌：我们的良渚保护区从北面天目山的支脉一直转过去，转到西头，那儿有几座隐隐约约的山，然后是南面到大雄山，东面到良渚镇的东边。

王鲁湘：就是一个群山环抱的中间地带。

刘斌：一个小的河谷地带吧，东苕溪就是一直沿着北面的山流过去的。在这五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130多处遗址，它的密集程度跟现在的村庄差不多。从更大的环境来讲，从杭州到我们良渚文化保护区的整个地区是一个簸箕形的盆地。

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在三四千年以前，无论是从它的山水、气候环境，还是盆地的大小来说，都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刘斌：对。早期的国家一般都比较小，比如史书上说夏代有万国，一个国的范围大概也就这么大。西周在岐山的时候方圆七十里，差不多也就这么大。

在良渚文化保护区的中心，一条涓涓流淌的溪流横穿其中，它就是几千年来这里的人们日常饮用、灌溉水田的母亲河——笤溪。

王鲁湘：学文学的人都知道《苕溪渔隐丛话》[19]，没想到苕溪还真的就在这个地方。对良渚人来说，当时这条溪水就存在吗？

牟永抗：良渚文化时期这条河就是主河。

王鲁湘：也就是说，苕溪两岸是良渚文化聚落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时苕溪是良渚人的母亲河。

牟永抗：应该可以这样讲。苕溪在涨水时期是条溪水，枯水时期可能是一片湖沼，这片湖沼里面非常适合种植水稻。

刘斌：当年的河网应该更密集，每一个山谷里面都有溪水流出来的，大坝修建以后就把河网约束了。

牟永抗：苕溪上的这条大堤叫做西险大塘，因为一旦这个堤决口，整个杭州市就会被淹没，所以这条溪和良渚关系甚大。

在良渚文化保护区北侧的大遮山脚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高出地面、呈现“L”形的土垣，当地世居的居民称之为“塘山”。《说文解字》中称：“塘，堤也。”这个不知何时叫起的名字也许说明了它的功用。1995年，附近修路时，在土垣断面上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碎陶片，引起了专家的注意。经过多次调查和发掘，证实塘山遗址是在良渚文化时期由人工堆筑而成的一项巨大的防护工程。

王鲁湘：这么一道高高的、长长的土垣，应该是人工堆积物吧。

刘斌：对。我们经过调查、试掘证明，它整个都是人工堆积的。它的长度现在有6公里左右，包围着良渚遗址。在它以北，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良渚遗址。

王鲁湘：这道土垣可以说是一个分界线。

刘斌：对。现在它外面的有些地方还保留着有水的部分，我们由此推测，它当初可能是用来防洪的。再者，在古代，这个山脉还是比较大的，里边可能有很多野兽出没，所以它也要防野兽。

王鲁湘：或者还有一些山里的部落也要提防。这就是最早的护城河、最早的城墙。

刘斌：对，不管它防什么，总之它是个防护设施。

王鲁湘：从世界考古学的范围来看，四千多年前的这个时期，地球

上其他的文明地区有没有这么大的人造工程？

刘斌：没有。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城址还都没有这么大范围。

如果说，长达5公里的塘山是良渚古国的一面城墙，那么，如此巨大的防护设施所保护的，会是怎样一座城池呢？就在塘山土垣的正南方向，一座长方形的巨型土台揭示了它的中心。经过考古鉴定，这座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高10米的土台，竟然也完全是由人工堆筑而成的。在它的周边，则是包括了反山墓葬在内的良渚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种种迹象都表明，这里就是当年良渚古国的中心。

王鲁湘：这个莫角山就是目前在良渚文化中心区里发现的最大的一个高台吧？

牟永抗：我们把它表述为超大型的人类营建工程。它的平面呈长方形，而且是正方向。在这个长方形的平台上，又有三个小高台，分别叫大莫角山、叫小莫角山、乌龟山。这三个也是在大高台的基础上再营建的一个工程。

我们在60年代晚期曾发现当地人就在乌龟山底下挖沙。山的下面是苕溪，在苕溪里边挖沙是可以的，但是沙怎么跑到山上来？我到那里看了几次，沙里边没有出什么东西，就是一直不清楚沙是怎么来的。到了1987年的12月5号，104国道修建要经过这个地方，我们在高台的角上，发现了一个大灰坑，灰坑里面堆的全部是形状规整、像砖坯一样的红烧土。灰坑有10米见方，中间1.1米高，在红烧土上面还有一个良渚小墓，这说明红烧土和这个坑，都是良渚时期的东西，所以我们马上把这个发现报告了国家文物局。

王鲁湘：你们开始把莫角山这个高土台和良渚文化联系起来了。

牟永抗：联系起来了。当时北京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俞伟超先生讲，这个是当时整个地球上营建规模最大的一个工程，无论如何要保护好。

王鲁湘：当时大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了。

1987年的初步发掘，让莫角山成为了考古人员密切关注的重点。1992年，原本位于莫角山上的一个印刷厂要求扩建厂房。这个在常人看来普普通通的消息，却让考古队员们兴奋异常，因为进一步的发掘工作

又能开始进行了。

牟永抗：1992年上半年，当地的一个印刷厂要扩建，于是要在这里挖一条沟，结果这个沟里边也发现了沙，而且是上面一层沙，下面一层土，土下面再一层沙，一层一层这么摞上去的。第二年、第三年，我们把整个台面揭开，发现整个范围都是这样。在揭开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沙上面有很多小坑，这是夯的。

王鲁湘：是小夯窝。

牟永抗：这些密集的小沙坑就是人工营造的痕迹，我们于是把它和原来看到的挖沙的情况联系起来了，后来我们又在这块角上的沙里边发现了柱洞。

王鲁湘：这就说明上面有建筑。

牟永抗：可是这一块，2000平方米的地区，没有柱洞。

王鲁湘：那就是一个广场。

牟永抗：我们又联系到1987年12月份发现的红烧土堆积，那么至少在这广场的南边，当年还曾经生过10米以上的大火堆。

王鲁湘：这里发生过大型的祭祀活动。

牟永抗：这里就是祭祀礼仪的中心，因而也成为良渚文化中心址的中心。

保留在莫角山的这些地下遗迹，已经成为良渚文化发展高峰的最为重要的证据。考古学家们推测，这里曾经是良渚先民心目中最为神圣的地方。当年的地面上，一定矗立着恢宏的建筑，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因此也有人说，这里是“5000年前的紫禁城”。

刘斌：这是莫角山的东北角。

王鲁湘：从这个地方看莫角山的大土堆，这么绵延过去还是比较壮观的，四千多年以前由人工堆筑成这样一个东西，它的工程量还是蛮大的。这个大土堆当时应当是这个庞大社会共同体的核心地区，它的周围应该散落着很多贵族的住宅、平民的住宅，当然也应该有一些奴隶。这

应该是一个稻作文明的地区，周边应该还是以大片的水稻田、沼泽地为主吧。

牟永抗：在当时，社会分化是不是这么极端，还不敢讲。不过村民在建房子挖水井的时候，在水井的7米深处，还发现了稻谷的堆积层。稻作文明正是建立这些大型建筑的经济基础。这些谷粒可以储存，又是财富的象征，因此人们能够进行财富的积累。在财富积累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这么一个超大型的营建工程。所以这小小的稻谷，对整个人类文明在那个时期产生质的飞跃，起了关键的作用。

王鲁湘：所以这是真正的神物，所谓“嘉禾”啊。

古蜀金沙

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举世闻名的考古发现——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人们由此知道了，曾有一支神秘的部族在古蜀土地上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可是，考古证据显示，三星堆文明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它似乎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向，神秘得不可思议。直到20年后，金沙遗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专家们才意识到，它和三星堆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金沙遗址的出现是否能揭开三星堆之谜？而这个21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考古发现，又给我们带来多少新的疑问呢？

一、金沙的发掘

金沙村是位于成都市西郊的平凡小村，唯一有些稀奇的，就是在此世代居住的农民，不时能够在河滩边、在耕种时捡到大小不一的金箔片，而这一传统，连他们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翻开文献，早在五代时这里就一直被称作“金沙”，至今没有改变。然而，2001年2月9日，一个房地产公司准备在这里修建开发项目，就在挖土机开挖下水沟铺设水管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朱章义[20]：当年他们搞基建的时候埋水管，挖土的时候发现大量的象牙，有人报警后，消息便转到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当时的队长是王毅，他马上带人到了现场。

王鲁湘：出土的东西主要是什么？

朱章义：当时的挖掘作业对出土的东西和遗址有破坏，我们从断面看的话，有八层堆起来的象牙，最下面还有大量的玉器和铜器。



金沙遗址博物馆

除了最初发现象牙和玉器的金沙村，考古部门在它周边又有了发现。最终探明，整个金沙遗址的总面积有5平方公里，被一条叫做磨底

河的小河分成南北两个部分。金沙村是它的祭祀区，在它的西北部，发现了一些房屋、陶窑和墓葬遗址，被判定是生活区和小型墓葬区。位于磨底河北岸的黄忠村遗址，则属于宫殿区。现在，在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祭祀区，建成了遗址保护博物馆，游客可以穿行其中，体会当年考古现场的气氛。

王鲁湘：这个像体育馆一样的建筑，就是现在遗址保护的一个建筑吧，大概有多少亩地？

朱章义：这个博物馆的占地面积有30万平方米，大约456亩。实际上，金沙遗址的面积比这要大得多，差不多在五平方公里左右。

王鲁湘：金沙这个名字肯定是有来历的吧。

朱章义：可能因为当初金沙村是祭祀区嘛，河流在不断地改道过程中，把祭祀区里边的小金片给冲出来了，这地方便以此命名。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因为唐到五代时期的墓葬当中便记载了当时叫做金沙乡，金沙是古名了。

王鲁湘：博物馆的磨底河是从金沙村和黄忠村的中间穿过来的，这在中国的博物馆还是很少见的。

朱章义：如果站在高的地方看，这条河还有点像条龙，风景非常好。

数量众多的象牙

考古人员在现场首先看到的便是成堆的象牙，他们立刻联想到：1986年，在距离成都仅38公里的三星堆遗址，也出土过80根象牙。于是，两处遗址从此刻开始，便产生了联系。然而，考古人员很快又发现了两者的不同：金沙遗址中，象牙的大小和质量虽然整体不及三星堆，但在数量上，则远远超过了它的近邻。据估算，整个金沙遗址中出土的象牙有1000余根。这样奢侈地使用象牙，在中国古代是绝无仅有的。（图2，）



金沙遗址象牙

王鲁湘：遗址出了那么多象牙，这对于金沙人有怎样的意义呢？

朱章义：我们在遗址发现的玉璋上有这样的图案：一个人跪在地上，肩上扛一根象牙，象牙尖朝前。这件文物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它告诉了我们金沙、三星堆出土那么多的象牙是做什么用的。象牙在金沙和三星堆古蜀文化当中，主要还是用作祭祀品。具体地讲，它是怎么使用的呢？其中之一就是人把象牙扛在肩上。

王鲁湘：尖朝下，跪在地上。

朱章义：这可能是当时祭祀的一种姿势吧，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姿势。如果我们还能不断地发现其他图案，就能够把当时祭祀的姿势搞得比较清楚，并加以复原。

王鲁湘：那么这个古文明就复活了。

奇特的乌木

同时，根据地层出土的器物，考古学家们判定，金沙遗址属于商代晚期到春秋时期，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那么，3000年以前的金沙是什么样子呢？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金沙遗址中还出土了很多乌木。它的一面是条形树皮纹理、而另一面却像珊瑚一样坑坑洼洼，这又是怎样

造成的呢？



金沙遗址乌木

王鲁湘：乌木的造型很奇特，像礁石一样，上面有一个一个的洞，很有质感。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朱章义：这个实际上是乌木的一个特点。发洪水的时候，树从上游冲下来，埋在河床里边。因为成都平原有大量的卵石，树木向下的那一面便受到了一些挤压，所以就形成了像礁石一样的一个个孔，而另一面保存的较好。

王鲁湘：连树皮都还有呢。

朱章义：因为没有卵石对它进行挤压，可能是沙子一类的东西把它盖在上面了。

王鲁湘：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树的话都是两面，一面带有很多很多的圆坑，像月亮的表面一样，一面比较平，造型很好。

朱章义：绝大部分是这种情况。这是大自然的一种杰作，自然而然

地成为一种艺术作品了。

长久以来，考古界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正当中原人过着富足和文明生活的时候，成都平原上还是一片蛮荒之地。但是象牙、乌木的出土，让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描述3000年前古蜀人的生活状况。当时这里的自然环境应该是这样一番景象：气候温热、丛林茂密、大象成群。

随着挖掘工作的深入，大量的玉器、石器和金器也伴随象牙一起出现了，考古工作者们吃惊地发现，整个遗址区里竟没有一件生活用具。更令人不解的是：所有这些东西还不是同时掩埋的，而是分层分批，精心摆放在这里的。经过分析，考古工作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里是一个大型的祭祀场所。

朱章义：它实际上是专用的一个祭祀场所，它的旁边是一个河滩地，里边还有大量的乌木。当时可能是在河岸上进行祭祀，祭完之后就把祭品埋在河滩地里。它的祭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最下层属于比较早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祭祀品以象牙、石器为主，金器、玉器比较少见。到了中间层，祭品就比较丰富了，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都有。到了上层，大约相当于西周末、春秋初的时候，祭品又发生变化了，象牙、玉器、金器虽然还在用，但是非常少了，而主要以野猪的牙和鹿角为主。

王鲁湘：生态环境越来越不好了。

朱章义：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但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国力逐渐衰落了，想用象牙没有了，想用的玉器没那么多了。最后人们就用在河滩边上捡到的漂亮卵石代替玉器，来祭祀祖先、神灵。

王鲁湘：国力越来越衰落，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弱了，周边地区的贡品自然越来越少了。

朱章义：但是祭祀活动还是必须做下去，因为只有这样，祖先才会保佑后代平安。所以他们只能用野猪牙、美石来代替了，不过，他们对祖先、神灵的崇拜还是一样的。

王鲁湘：这个分析很有道理。从这样一层一层各不相同的祭祀品，可以看出当时整个古金沙蜀国在500年中的国力变化，甚至间接地反映了整个周边生态环境的变化。

朱章义：如果我们做得更仔细的话，那么古代蜀国都城的变化、政治集权的变化，都有可能被发现。比如通过对出土象牙的研究，可以发现这里出土的二十多根象牙中最长的一根有1.85米，是亚洲象。

王鲁湘：现在亚洲象不可能有这么长的牙齿了。

朱章义：你不要说1.85米，就1.6米的象牙也很少见了。但金沙出土的象牙长度一般都在1.6米左右。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生态环境是多么良好：四周都是树木，鱼在游，鸟在飞，河床边上的那些大树后来就成了乌木。

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在三千年以前是一片原始森林。

朱章义：我觉得倒不一定是原始森林，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作为人类居住的一个都城。应该说，这个地方的人类聚落四周是大片的森林，当然，在聚落内的话，肯定也有大量的树木，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城市这样，全都是房子。

黄金面具

根据考古发现得出的相关细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3000年前这里人们的生活状态：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野象成群，河水常常泛滥淹没农田和家园。人们白天务农耕种，制作陶器，用多余的粮食酿制美酒。每逢重大事件，统治者要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那时候，人们肩扛象牙跪立在祭坛前，祈求风调雨顺，人民康乐。而后把精心准备的祭品摆放在河滩里，用泥土掩埋。然而，这还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表面现象。随着对更多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金沙遗址黄金面具

王毅[21]：非常荣幸，我是那个金面具出土的见证者之一。

王鲁湘：当时好像几个主要负责的人都在现场。

王毅：是，我们当时猜到最多会有一些金器、玉器出土，但没想到还是大吃一惊：这居然是东亚地区那个时期保存最完整的一件金器。出土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一块小金箔嘛，而且沾满泥土，这在金沙遗址出土过很多。但随着它不断地展开，我们看到有一个地方好像有两个小孔，在两个小孔之上有一个隆起的东西。最后展开一看，果然是好大的一个金面具，这可真是重大发现。

王鲁湘：当时应该非常兴奋吧。

王毅：当时确实是激动不已，但是还要表现出一种镇定自如的感觉，因为考古学家不可以有一种挖宝的心理。这个金面具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可以使用的，只有最高统治者、最大的巫师才能够使用。它是最高级别的，这样一来，金沙又发现了一件跟蜀王的祭祀活动有关的东西。

经过专家修复，变了型的金面具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庄严神圣的表情让人们不禁联想到遥远的西方，古埃及文明那著名的图坦卡蒙金面具。是什么人，在3000年前的金沙使用了它呢？神奇的金面是不是蜀王

本身的“画像”呢？

王鲁湘：这个金面具的形象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很相似，除了嘴稍微短一点。

朱章义：没三星堆的那么夸张。它大约有四十多克重，厚度则从0.02厘米到0.04厘米不等。

王鲁湘：这个大小好像正好能扣到一个真人的脸上。说不定当时它就是被扣在一个祭师或者首领的脸上，用在某种特殊的场合。

朱章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它罩在其他上面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些。因为它背面有很多卷过来的痕迹，如果戴在人脸上的话，就会把脸刮破了。也许它就扣在一个圆雕的东西上，有凹槽把它嵌在里头，三星堆有些金箔就是直接嵌在青铜面具上。

黄金冠带



金沙遗址黄金冠带

这是金沙出土的一条金冠带。在它表面刻有四组相同的图案，每组图案由一个人头像、一只箭、一只鸟和一条鱼组成。整个图案表现的是人用箭射鱼，箭经过鸟的侧面，射中鱼头的场景。这个图案对有考古经验的人而言意义重大，因为类似的金器在三星堆也有出土。它同三星堆一个金杖上的纹饰竟然极其雷同。

王鲁湘：朱馆长，这条金冠带出土的时候，是完整的还是成一团

的？

朱章义：是完整的，不过有点褶皱。它也不是团成一团，而是在中间断开了。

王鲁湘：那怎么知道它是一个围成一圈的冠带呢？

朱章义：它断开之后，我把它弯过来一看，接上断口是完整的一个环。不过它不是均匀的，上面的直径大一点，下方的小一点。它的大小应该和头基本一致，所以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戴在头上的冠带，而且它可以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相对应，因为冠带和杖都是权力的象征。它上面的纹饰和三星堆金杖上的纹饰也是一样的。

王鲁湘：当时发现这个纹饰的时候你们肯定非常欣喜，因为找到了一件和三星堆文化有关联的直接性物证。

朱章义：这件文物当时出土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开修下水管道时，挖掘机挖上土来之后就堆在一边。下水管道修完之后，旁边的土还得回填下去，而且还进行夯打。这是我们又重新开挖的时候发现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它在挖掘机开挖的时候掉出来，人们一看是金子，那么肯定就被拿走了。这些土在那里摆了半个月呢，能够保存下来非常幸运。

王鲁湘：这个和三星堆的那个金杖的图饰有哪些地方是完全一致的，有哪些地方是不一致的呢？

朱章义：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小的地方也有一点差异。比如说三星堆那个人面和这个人面是有差异的，三星堆图案上的那个人是一个正在跳舞的形象。茑纹饰也有一点差异，金沙的那个鸟尾是一个三角，三星堆的则有点像弧形。鱼尾也有些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是非常细微的。

王鲁湘：两个图案都是一根箭经过鸟，再扎到鱼。但是箭好像没有扎到鸟身上，只是从鸟前边掠过去了。

朱章义：箭扎在鱼眼上，然后扎进去，没有扎到鸟的身上。这给人感觉图案里的人要射的是鱼，而不是鸟，这和三星堆也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应该有传承关系，而且不是一般的装饰图案。

王鲁湘：也就是说，三星堆和金沙的这个图案，都象征着极高的权

力。

朱章义：跟世俗权力有直接的关系，是权力的一种表现。

金沙出土的铜器零部件跟三星堆青铜神树上面的青铜鸟非常相似，看起来也是插在一个大型器物上面的。但是到今天为止，金沙还没有出土像三星堆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一样的大型青铜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王毅：我们还没有挖到像三星堆大立人那样辉煌的东西，这是跟金沙遗迹的构成形式有关系的。我们感觉，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被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是特别隆重的一个祭祀。跟金沙的祭祀不同，三星堆的那个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代表权力的那些东西都埋在一个坑里面。

太阳神鸟



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箔器

王鲁湘：这就是太阳神鸟金箔。

朱章义：对。这件东西做得非常精美，但并不大，直径只有12.5厘米，厚度只有0.2毫米，质量总共只有20克。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剪纸工艺，空心部分才是它要反映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它的中间应该是一个太阳，周边有12道光芒，这些光芒刚好是弧形的，是太阳在运行的动态表现。太阳的周边有四只高度抽象化的鸟。

王鲁湘：好像是水鸟。

朱章义：差不多，它的腿特别长，颈也特别长。

王鲁湘：这个金光闪闪的太阳神鸟应该就是我们金沙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了。它和我们凤凰的标志太神似了，而且其基本内涵也是一样的，凤凰的标志是一个凤一个凰旋转成为一个太阳鸟，这个实际上也是太阳鸟。

朱章义：凤和凰也是太阳的一种表现。这个饰品更直观地把太阳和鸟放在一起，把人们对太阳和鸟的崇拜有机地结合在一块，来表现生生不息、追求光明的寓意。

王鲁湘：这个金箔是完全用沙金敲出来的？

朱章义：对，敲出来之后再把图案画上，然后慢慢进行刻划。我们可以看到它刻划的痕迹。

王鲁湘：我觉得当时刻划的艺人的手艺相当好，四个鸟完全一样。据说这个东西当时团成了一团，那个喙都还留着。

朱章义：能保留下来确实非常不容易。当时我们慢慢把它打开的时候非常惊奇，那么薄的一件东西，做得那么细，而且又竟然保存得那么好。

青铜立人

除了太阳神鸟的金箔器以外，金沙出土的这件青铜立人头上还戴着旋转光芒的太阳形帽，这个带柄的有领璧上面也有象征太阳的圆孔和三

只绕日飞行的鸟。它和在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铜器和栖息了九只鸟的神树一起，给我们传递着一个共同的信息：那就是古蜀人对太阳和鸟的崇拜。



金沙遗址青铜立人

王鲁湘：这个小青铜人的姿势和造型很奇特啊，特别是头上戴的那个东西。

朱章义：对，这个小青铜人戴的是一个太阳形帽，帽子上面表现得还是太阳的一种光芒。

王鲁湘：如果从上面俯瞰的话，它的确和金箔上的太阳鸟很相似。但考虑到咱们现场出土了很多野猪的獠牙，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帽子是不是用野猪的很长的獠牙一个一个插起来，然后做起一圈的？因为它实在太像野猪獠牙了，而且野猪獠牙也是这么弯过来的。

朱章义：古金沙人用排成一圈的野猪牙代替太阳的光芒，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王鲁湘：这样的造型也相当酷了，也是金沙的一件标志性器物吧。

这个仅19.6厘米高的青铜小立人是金沙最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而当年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个高达两米多的青铜大立人。它们的造型极其相似，两者的一脉相承由此可见。当然，继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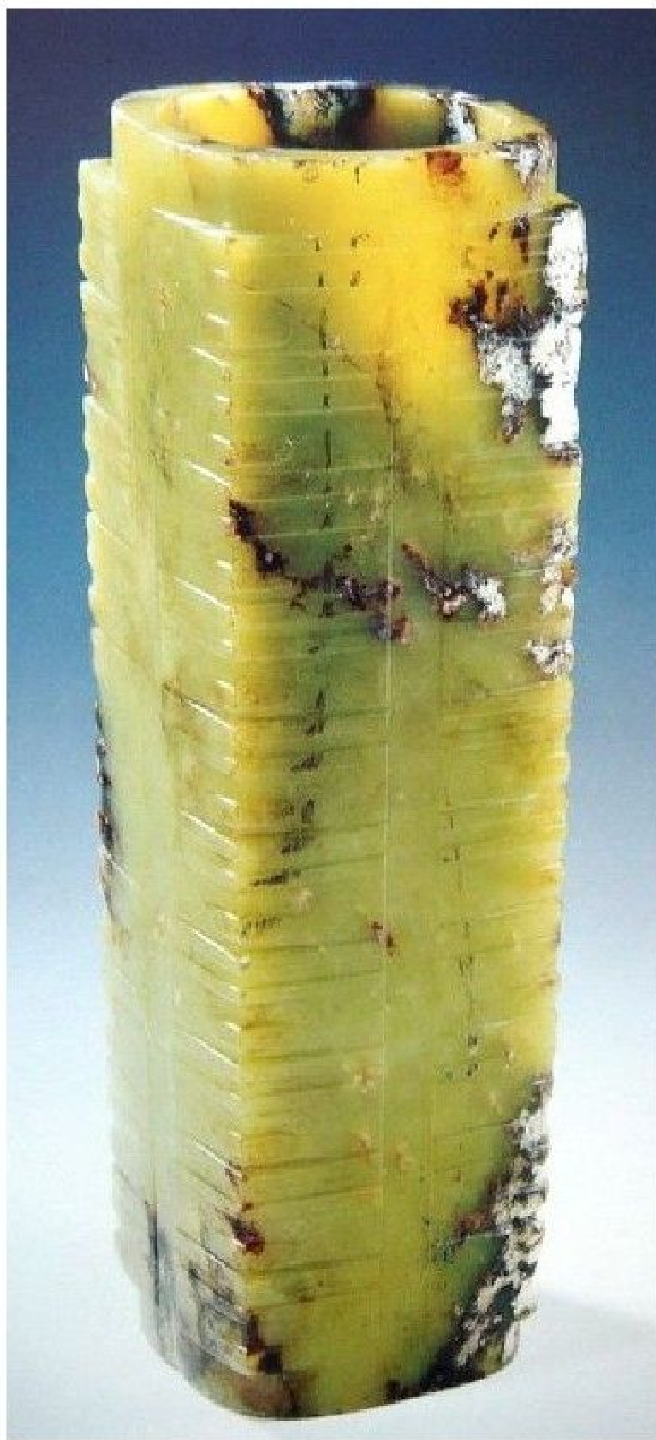
朱章义：金沙发现的青铜立人和三星堆的那个非常大的青铜立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王鲁湘：比如它手的姿势和三星堆那个一样，都是双手空握，好像拿着什么东西。

朱章义：是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一个最显著的差异就是，金沙铜人戴的是太阳帽子。再者，它还有腰带，还插了把剑，或者是权杖，这跟三星堆的铜人也不太一样。我们从背面可以看到，它扎的是长辫，一直垂到腰部，每一个辫子下头都是三股辫子，还打了结，而三星堆的铜人则是梳着发髻的。

在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是梳着发髻的，他是位大祭司，属于宗教阶层。而有专家认为，三星堆的头像中，梳辫子的应该是宗教阶层之外的另一个贵族阶层。根据这两种发式的对比，我们可以联想，3500年前，在三星堆这两个不同的贵族之间很可能引发了一场纷争，谁胜谁负不得而知。但是后来梳辫子的一族辗转来到金沙繁衍下来，延续着他们过去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玉琮



金沙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青绿色玉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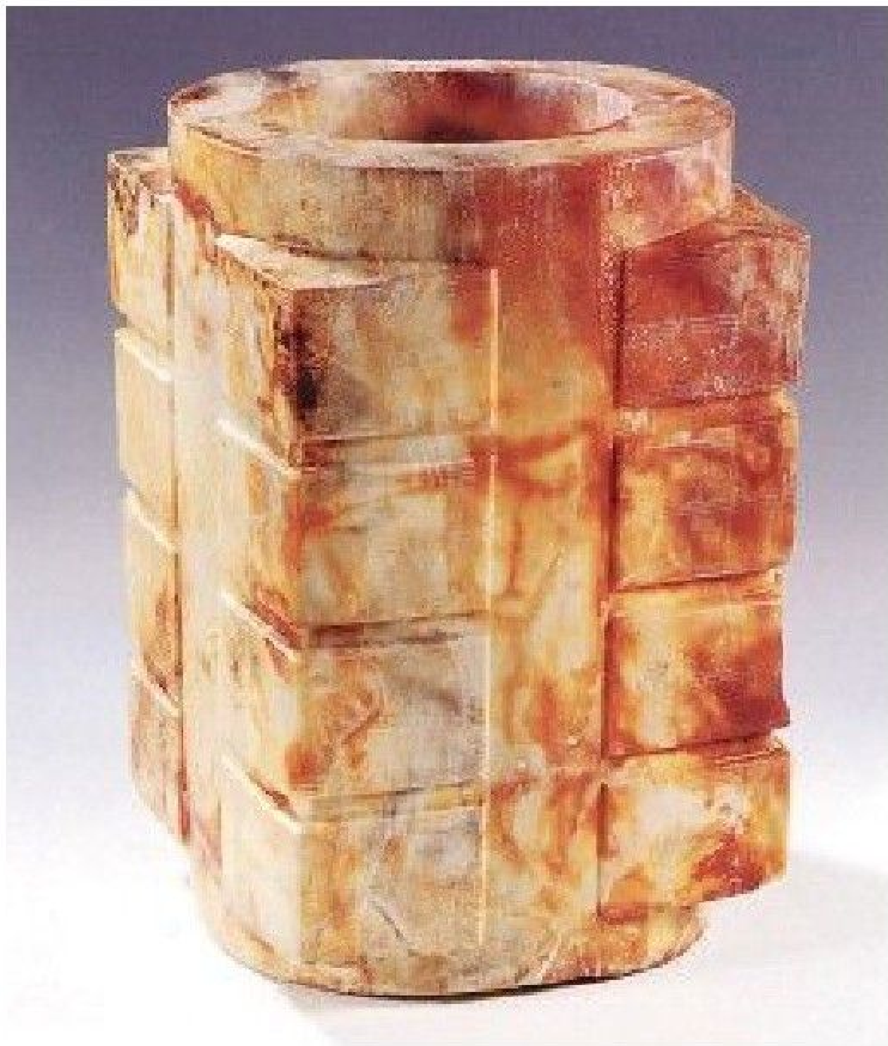
随着金沙遗址被一层层地剥开，考古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这是一个柱状的物体。工作人员除去上面的泥土后，在场的人都惊呆了——竟然是一个青绿色的玉琮！

朱章义：在成都平原三千年前的遗址里边，居然出土了一件距成都平原几千公里以外的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件东西，这件东西的时代比金沙文明早了一千多年。

良渚文化是指距今5000年左右浙江、江苏环太湖一带的水稻文明。它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玉器。而良渚文化中体积最大、制作最精美的玉器就是玉琮。琮体通常分为多节，每节上都雕有神人兽面像。这件金沙发现的玉琮上面也出现了和良渚相同的纹饰。那么，这件在金沙发现的良渚玉琮是怎么穿越时空、不远万里来到四川的呢？

朱章义：它在一千多年之后，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作为蜀王的一个重器，在祭祀祖先神明之后被埋了下去，这个非常难得。

王鲁湘：一在江之头，一在江之尾啊。



金沙遗址四节玉琮

朱章义：很多专家检查过之后，都认为这绝对是良渚晚期的一件东西，而不是蜀人做的。有少数专家怀疑，是不是当时的良渚人到了成都平原之后在这里制作的？我觉得可能性不存在。经过一千多年，这种工艺早就消失了。而且能够明显地看出，这个琮上边有把玩的痕迹。所以我认为，它就是良渚的东西。但这个东西是怎么过来的？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有可能会成为千古之谜。

王鲁湘：金沙出土的其他几件玉琮，从材质、工艺、神韵上一看就是金沙的东西，但是这件东西则是良渚的。

朱章义：比如那件四节的玉琮，从外形上来看还是良渚的风格，但很明显是仿那件良渚的玉琮做的，比原来的更为简洁了。

玉钺

金沙不是一个封闭文明，它的统治者们和中原地区的上层社会之间有着广泛的交流。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各种型制的玉器，似乎都在以其独特的精美来替统治者祈求上苍的厚爱。

朱章义：这个是我见过的玉钺中最精美的一件，当然是否应当称为钺，我们觉得还有待商榷。它实际上是用一块整玉来做的，上边和下面的玉皮[22]还在。它上面的兽面纹做得非常精细，两面都有纹饰，而且是对称的。但很奇怪的是，它的下边这部分采取阴刻的手法，而且阴刻的水平相对也比较低。

王鲁湘：那就是不同时期刻上去的。



金沙遗址兽面纹玉钺

朱章义：很难说，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匠人做的。

王鲁湘：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件玉钺不是本地玉匠做的，而是从商传过来的。因为它的整个纹饰和商的青铜纹饰是相同的。

朱章义：我们以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这种玉料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其他地方没有。

王鲁湘：它上面阳刻部分的技艺如此精湛成熟，不会是偶尔为之的东西。

朱章义：应该是经常做才能达到的那种熟练程度。但下面的阴刻那部分的确相当粗糙，所以说这件器物很值得研究，金沙的很多文物都有这个问题。

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到底是交流的结果，还是本地原生的东西，这是一个要好好研究的问题。

二、金沙的谜团与启迪

在成都平原这片土地上，考古工作者们一直在找寻古代蜀国人的遗迹。继1986年发现广汉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之后，1995年，在成都发现了宝墩古城遗址，2000年在成都商业街发现了船棺墓葬遗址，2001年又发现了金沙遗址。它们时代最早的应该是距今5000年的宝墩、而后是与商同代的三星堆、商末到春秋时期的金沙，最后是战国早期的船棺墓葬遗址。考古学家们已经证明出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继承关系。可以说，这里已经诞生了一个长江文明的典型代表。也正是因为金沙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成都平原上古蜀国序列的空白。

从三星堆到金沙

三星堆文明是土生的古蜀国文明，没有来源、没有去向。对于它的突然消失，有人说是外族的入侵，有人说是内部的骚乱，也有人说是肆虐的洪水逼迫三星堆居民匆忙逃亡。根据年代测算，三星堆文明比金沙文明早500年，那么，金沙人是否就是三星堆人的后裔呢？他们又从三星堆人那里继承了什么呢？

王鲁湘：根据您对这个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您觉得那个时候的人大概具有什么样的宇宙观和世界观？

王毅：你说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在探索：这个区域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对于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开，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去了解。我们曾经以为这个地方在两千多年前是蛮荒之野，这里的人群都是从外边过来的，它的文化一定比中原滞后。但是金沙的发现，包括1986年三星堆的发现，让我们彻底改变了对成都平原，以至于对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的认识。金沙出土了大量的象牙、玉器、金器这些东西。考古学家在一个遗址里面能出一件象牙，一件玉器都不得了，而这个地方的象牙是数以吨计，几十根上百根的出现。

王鲁湘：而且玉器也是数以千计。

王毅：对，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你会感觉到这个区域的文化具有极高的水平，而且有一个独立的思维体系，天地人的体系。很多的出

土文物都代表着对祖先的崇敬，大量的象牙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这时应当出现了统治者，进入了某个王国时代。这个古蜀国的世界观已经把成都平原作为世界的中心，它的世界观当中也有无限崇敬的上帝。

王鲁湘：那些国王可以直接与上天对话。

王毅：在三星堆出土了很多神树，那是沟通天地的。而金沙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玉器金器都是通灵的。金沙村就曾经是古蜀人专用的祭祀场所，这个祭祀遗迹的分布面积很大，有五千平方米以上，而且它的祭祀品也非常丰富，埋藏了一坑一坑的象牙、玉器、金器，每一次埋藏都是一次祭祀活动，到底有多少祭祀活动，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统计出来。

王鲁湘：我觉得金沙遗址的发现，使考古工作者的视野有了突破性的扩展。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包括历史学界有一个很顽固的观点，即“中原文化中心论”，认为中原地区以外的区域在上古时期不会有太发达的文化，即便是有某种文化现象，也是中原文化辐射的结果。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在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流域的上游，离中原有相当距离的古蜀国，居然有这么发达的上古文明，而且这种文明的形态与个性又是那么强烈。在这个意义上，金沙和三星堆遗址对我们整个成都平原的考古，乃至对整个中国学术界都有一种解放思想的作用。

王毅：你说的非常对。我们都珍视我们的文化，但是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过去一直是黄河中心论。黄河是我们的母亲，这肯定是没错的，很多的文化创造者都在黄河流域居住生存，大量的文献典籍都可以让我们感触到这个母亲，以及母亲河给我们中华文明带来的深刻影响。但是我们也应当思考，黄河流域之外的区域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文化？我记得上个世纪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良渚文化的发现、长江中游的一些发现，确实让我们感觉到长江流域也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从那时起，已经是长江文明、黄河文明并提了。

王鲁湘：所谓中华文明的双子河，也是中国的“两河流域”。

王毅：这种提法是真有考古依据的。除了长江中下游的那些发现，像三星堆、金沙都证明了这一点。三星堆是一个非常发达的青铜文明，它表现出的博大精深你怎么说都不过分，它可以跟任何同时期的青铜文明相媲美。但三星堆才发现时有种说法，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外来的。九

十年代以来有了新的考古发现，比如在三星堆文明之前的宝墩古城，它的时期在四千到五千年前，是文明的门槛。那个时候成都平原已经出现巨大的城墙，出现了阶级分化：城里边居住的人和城外居住的人是不一样的，城里边居住的人也分群而居。比如我们在郫县古城中发现一个长方形的房子，它周边所有房子的门都朝向这座大房子，可以看得出当时已经有统治的事实和理念了。

王鲁湘：已经有社会核心的概念了。

王毅：城墙的出现，说明当时可能有战争，不同族群之间有利益冲突。那时候农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们能生产更多的粮食，出现了社会的分层，还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三星堆遗址，正是这些遗址文化的延续，但三星堆文化到晚期好像突然消失了。

王鲁湘：而2001年金沙遗址的发现，一下子就把三星堆前面的东西和它后面的东西联起来了。

王毅：这样一来，从宝墩古城、三星堆，一直到金沙这么一个5000年前到3000年前之间的文明体系，就很清晰了。我们现在可以说，成都平原已经是长江文明的典型代表，它的文化发展序列很清晰，它的文明程度是过去的人们完全想象不到的。它跟长江下游是有交流的，跟黄河上游也是有交流的，所以它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交互影响，正是因为这两个区域的文化交融互动，才推动着中华文化不断地创造发展，同时又有传承。因此，我觉得成都平原这二十年的考古发现，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特别重要的贡献。

王鲁湘：那么在这样一个序列中，金沙遗址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王毅：我刚才说了，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它去哪里了？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谜团，而金沙遗址则为我们解开了。金沙遗址具有王都级的规模，我们怀疑这个地方是古蜀国的最高统治者专用的祭祀点。最早发现的是祭祀区，现在我们正在发掘祭祀区北边大约500米左右的宫殿型遗址。就我们所知，金沙遗址的范围已经达到五平方公里。我们由此知道，在距今大约3200年到2800年左右这个时期，这个区域有一个非常高的文明，而这个文明正好把三星堆消失以后的一个时段给接起来

了，它充实并从新确立了我们这个区域的文化发展序列。对此，无论何种积极评价，都是不过分的，甚至可以说它的发现改写了中华文明起源史。

王鲁湘：好像到现在为止，三星堆遗址除了发现两个大型的祭祀坑以外，其他遗迹的考古发现还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是吧？

王毅：我想三星堆肯定还会有重要发现，它有城墙，而且有些区域文化堆积特别丰富，只不过因为它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因此发掘它是受限制的。金沙遗址正好处在城市的中心，城市要建设，我们考古学家必须配合基本建设进行发掘，从这种角度看，考古学家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从2001年到今天，我们已经发掘几十万平方米，对一个考古学家来讲，对一个遗址进行如此集中的发掘，这种机会是弥足珍贵的。

王鲁湘：现在大家都可以断定，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有一种源与流的关系，或者是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我对三星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青铜文化，像面具啊，人像啊。另外，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还有大部分象牙。这些东西在金沙遗址也大量出现，但是相对而言，金沙的大型青铜器件好像比较少，而且很多青铜器不是整件，而是一些构件。这是什么原因呢？

王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确实还没完全到位，从金沙目前出土文物的现状你可以感觉到，金沙确实是刚刚发现，它应当还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土。从器物类型来讲，几乎凡是三星堆有的，金沙都会有，但是，三星堆那么巨大辉煌的青铜器在金沙竟然没有发现，这是很奇怪的。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你就感觉到金沙一定会有大型器物，只不过在于考古学家有没有机会。金沙遗址已经出土了很多青铜器的残件、构件，而且它的祭祀区在探测时有强烈的金属反应，也就是说下面肯定有巨大的文物。但考古学家不能以一种挖宝的目的来处理这些事情，而是要对那个时代的整体有一个研究。三星堆出土了很多金器，也有象牙，而金沙的金器和象牙数量更为巨大，是中国那个时期出土金器、象牙件数最多的遗址，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文化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他们之间是有变化的。

王鲁湘：这种变化表现在什么地方？

王毅：比如鸟箭鱼的纹饰，在三星堆是出现在一个金杖上面，而在

金沙遗址则出现在冠带上面，金杖和冠带同样是权力的象征，但是构成部位不一样了，图形也有一些变化，比如人头的形状。三星堆曾经出土巨大的青铜立人像，在金沙则只出土了一个小立人，它可能是跟祭祀有关的器物的某个构件。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种祭祀跟金沙的祭祀是不一样的，三星堆的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全放到一个坑里。

王鲁湘：肯定是发生了某些事变。

王毅：可能是巨大的政治变化造成了三星堆那种特殊的祭祀，但是金沙是很多一个一个的小坑，是常规性的。金沙有些祭祀坑很小，两米宽，几十厘米深，但却埋藏了金面具，是非常非常的隆重，所以说三星堆的文物情况跟金沙是有差别的。跟三星堆相比，金沙文物的工艺技术水平不仅有继承，而且也有创造。

王鲁湘：三星堆出土的这些东西给人一种灵异的感觉，与殷商的东西更近一些，器型比较大，线条比较锐利伶俐、方正，显得杀气更重一些；而金沙的东西开始由方变圆，由粗变细，变得更和谐、柔润，弧线更明显。再比如青铜人像和金面具的人像，三星堆出土的给人感觉更夸张，不太像真人，倒更像神，尤其它的两个嘴一直裂到脸后；而金沙面具的嘴已经像我们正常人的嘴的宽度，颜形也更接近正常人，这跟今天成都平原的文化性格更接近一些。

王毅：你说的非常有意思，三星堆的那些东西还是显得比较狰狞一些，夸张一些；金沙出土的好多文物出现了一种新的审美状态，但这种创新是不是达到了很特别的程度，还是需要进行研究。

王鲁湘：革命性的变化没有出现，但是更精细化，更雅致化了。特别是那件有六个翅膀的浮雕小玉件，在那个年代极有可能是绝品，而这种精细性在成都平原保持下来了，使蜀地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精细手工业的核心地区之一。比如三星堆的玉璋，杀气腾腾的，给人一种冷兵器的感觉，可是金沙出现的居然是袖珍的、用作吊坠的那种玉璋，已经完全是装饰品了。所以说，工艺的精致化在金沙时期可谓达到了极致。

王毅：对，我们后来发现的遗址当中再也没有发现像金沙这么精细的东西。另外，金沙文物的另一个特点是体系更完善。在金沙遗址发现过两件石磬，其中之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件，而且声音非常好。

王鲁湘：昨天我在馆里面听到的背景声，朱馆长告诉我就是这个石磬敲打出来的录音，我当时还以为是金属敲打出来的。

王毅：由此你可以想象，当时它的祭祀场面是非常宏大的：这个地方濒河，靠近河边搭了一个很大的祭祀台，罄声庄重。金沙还有从大到小的成体系的石璧，它到底是一种祭天的礼器还是乐器，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你可以感觉到，金沙在祭祀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场景。我们通过这些文物的不断复原，形成了对金沙文化的整体认识。与三星堆所相比，金沙给我们传递的文化信息量，在有些领域要大得多。

文化的交流

王鲁湘：根据出土的东西，我们可以概括地说，金沙时期是金石交响的文明。它的金有两种，一个是真正的黄金，再一个就是青铜；石的话，有玉也有石，比如石磬、石璧。与中原相比，特别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黄金。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东亚地区的文明，从整体上来讲，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没有对黄金产生一种崇拜。可是世界其他的一些文明地区，很早就进入了黄金时代，用黄金来做最神圣的东西，以及和天地沟通的媒介。西亚、地中海、玛雅文明都是这样，恰恰在东亚不是。然而在东亚的成都平原却发现一个例外——金沙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对黄金有一种崇拜的感情，并赋予黄金神人一种沟通的功用。金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还是自身就是原发的？

王毅：你所谈的问题考古学家一直在思考。在当时的黄河流域甚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们也使用金器，但还没有成为主流，人们对青铜的酷爱是远远超过黄金的。但是三星堆和金沙这样一个文明传统却出土这么多金器，这确实与众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跟这个区域的位置肯定有关系。第一，这个地区当时肯定是产黄金的，而且是天然金，不是冶炼金；而黄河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那个时候要得到天然金是不容易的，我称此为“产地优势论”。其次，这个区域跟周边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频繁的，它的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跟中原不完全一样。尽管这种交流的路线、时间、阶段特点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但从后来的一些历史文献来看，当时东西方之间确实是存在交流的。比如汉代张骞出使大夏的通道，我们认为就跟从四川到云南一直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有关系。金沙、三星堆器物上海贝的造型也是从印度洋那边过来的。南方尽管山川阻隔非常厉害，但它可能有另外一个交流的孔道，这个交流孔道

并不是简单的文化传播与复制，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欣赏，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化变化。很多人正在探索，在中国的西南是不是存在一个跟西亚相连接的孔道。

王鲁湘：它还不止这一条孔道。我们过去更多地强调了成都平原作为一个盆地的封闭性，但实际上它是有多条通道与外边联系的，比如刚才说的向南通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而岷江也是一条通道，由此顺流而上就进入了河西走廊，通到西亚；由嘉陵江可以直达汉中，过秦岭就和关中地区联系起来了。当然长江也是一条通道，这样成都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就联系在一起了。这些通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某种方式使各个区域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我特别注意到，我们馆里摆着一件玉钺，它与河南二里头和陕西陶寺的造型一样，只不过是形态略小一点。因此我完全有理由推断，这件东西是从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过来的。还有那件特别漂亮的十节玉琮，完全是良渚晚期的东西，是长江下游的文化。

王毅：你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些东西，很多人觉得好像是因为贸易关系交换来的，但这种如此高档次的东西，应该是统治阶层才具有的。

王鲁湘：对，它们都是国之重器，不可能做贸易交流，一定是政治交流的东西。

王毅：甲骨文中就记载了蜀国的各种交流事件。武王联合诸侯伐纣的时候，蜀国也是联盟的一分子，这个蜀应该就是成都平原的蜀。其他甲骨文当中还有征蜀、入蜀、蜀人献穷宝的记载，由此可见，古蜀国与当时中原的商、周王朝有很多的联系，而且是在高层之间。那时候人们靠天吃饭，如果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灾难，便会进行迁徙。他人的迁来可能给蜀地带来了一种异样的文化，所以说蜀文化是很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成就。金沙有卜甲，也有卜骨，但是中原用腹甲，这里则用背甲，正好反过来。所以，金沙跟中原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又有意跟中原不完全一样。金沙的青铜器和玉器有符号，有图像，但就是没有刻字。对金沙的文化，我们必须站到一个更高的视野来思考，要考虑到在整个东亚文化当中它与其他文化发生的交流，以及与西亚、东南亚文化之间的关系。



金沙遗址玉璋

王鲁湘：在金沙出土的大量玉器中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叫玉璋的玉器。在中原出土的玉器中，其实很少看到璋，但是三星堆以及金沙都有大量的璋，从微型的到大型的，应有尽有，而且成为古蜀国玉器最具个性的一种形态，这是怎么回事呢？

王毅：其实不仅仅是玉璋，玉琮在金沙也数量巨大，有十几个，在其他遗址中能出一两件就不得了了。中原那个时期的青铜器一般是鼎、簋、爵这些东西，而金沙则是青铜罍、青铜尊，而且有自己的一套独立的礼乐制度。这种礼乐制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创造的，另外一部分是对其他文化加以改造，甚至是对其借鉴的某一个方向进行无限放大形成的。当然，它有自己的思考，不是全盘借用。它在礼乐制度方面就吸收了商、周王朝行之有效的尊卑有序的体系。

其实从今天来看，凡是跟周边发生剧烈的文化碰撞、不断吸收周边文化的文明，它的创造能力就特别强；如果它跟周边的交流终止了，或者是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它就开始衰落了。三星堆到金沙这段时期，它频繁地与周边文化相碰撞，所以很快就有一种新的创造能力出现。而它之后的开明王朝就出现问题了，开明王朝时的蜀国自以为是，竟然嘲笑秦国是东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最终被秦国灭掉。所以从三星堆到金沙，再到以后蜀国的消亡，可以给我们很多启迪。

王鲁湘：其实文化就是在交往中间不断发展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都搞不清楚它们的源流关系了。这个地方出现了大量用玉器做的牙璋。《周礼》记载，玉璋在古代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礼器，上拜天下拜地，中间拜四方。而玉璋中，这类有V字刀刃状的又被称作牙璋，是玉璋中的极品，也只有权力在握、地位尊贵的人才能以它祭天拜地祈福。牙璋的形状也很像两个牙齿绑在一起，我由此有一个联想：我们南方人经常把偶尔吃一顿好东西叫做“打牙祭”，我搞了这么多年文化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弄清楚“牙祭”的词源在什么地方。我在金沙找到了依据：用牙进行祭祀就叫做“牙祭”，而且这个璋的形状就是两个牙捆在一起，或者是野猪牙，或者是象牙，璋下面的旋纹就是捆绳的形象。人们开始用真实的野猪牙或象牙进行祭祀，但是到后来玉越来越贵重，人们可能认为玉比真实的牙更能博得神的欢心，于是牙璋就出现了。牙璋最先的使用地一定是在我们古蜀国，但是后来到了周朝，这样一种来自于蜀国的特殊祭祀仪式就被纳入到周朝礼制文化系统中，成为中国礼制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这个联想推理有一定的根据

没有？

王毅：你的说法有些很有道理。其实我们所有祭祀的器物，都是在实际生活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的。你说的金沙的这个獠牙跟金沙的玉璋之间的关系，从学术意义上来说还不确定，但我觉得你这种解释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三千年前的金沙人留下这么个东西就是让你猜。金沙完全可以用你的说法做广告。

考古的期望

过去我们所知道的古蜀王的历史，只是一些文献记载的简略片断，而这些简短的记载也带有神话传说的性质，让人半信半疑。从开明王朝以上至蚕丛王怎么会有三万四千岁呢？蚕丛为什么是纵目？鱼凫王是如何得道仙去的？杜宇王为何又化成杜娟鸟？鳖灵王怎能死而复活？凭这些文献记载，难以弄清古蜀历史的真实面貌，也许在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后，当我们真正找到蜀王墓葬的时候，那些文明的碎片将告诉我们更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

王鲁湘：现在金沙的考古发掘，从面积上来说只是揭开了一角，从文化层面上来说仅仅才揭到第八层，下面可能还有七八层，而且更精彩的东西好像都在下面，所以金沙的考古发掘，以后肯定还会继续做下去。那么以后，金沙考古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方面的惊奇呢？

王毅：金沙遗址从发掘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不只是属于考古学家思考的问题，而且是好多老百姓都在关心的问题。目前金沙真正的发掘不到十分之一，但这不到十分之一的范围却出土了三千多件玉器、象牙、金器。那么对于剩下的十分之九，我们如果有计划地进行发掘，肯定还会有更多的重大发现，再出几万件东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老祖先的遗存，我们是不可以轻易处置的，我们的保护技术如果没有达到保护状态，不可以轻易动，我们已经遇到过象牙难以保护的问题。我觉得考古学家还是不要只想满足个人的发掘欲望，有些发掘，还是等技术水平提高了再说。我们现在正在发掘北边跟金沙遗址的最高统治者活动有关系的一个遗迹。作为金沙文明的最高统治者，它还会有墓地，我们现在还没找着。如果每一个地方在动工之前，考古工作者都先去进行文物勘探，埋在地下三千多年的蜀王陵墓总有一天会被找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金沙遗址那个时代的文化状况，我们可能会了解的更多、更深。

王鲁湘：三星堆留下了一些谜，金沙遗址又留下了一些谜。成都平原更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可能会解答一部分的谜，但是又会带出更多的谜，而这恰恰是考古工作者的乐趣所在。

王毅：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不过今天考古学家走到哪里，我们的媒体就跟到哪里，所以说，考古学家所做的考古，已经不是单纯的考古行为了，已经变成了一种公众行为。也许，考古学家和公众一起进行研究，要比考古学家单独呆在房子里面思考好得多。

青铜时代

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青铜文化在中国起源，到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的契合给了我们旷古至今的无尽想象，在近乎五千年的历史脉络里，青铜器的起源与落寞见证着奴隶制度兴衰发展的全过程，于是，那个与奴隶社会相关联的时代，被形象地称为“青铜时代”。对于这样的青睐，青铜器不辱使命，它天生超乎寻常的重量感，使它有资格承载历史的厚重。四十多个世纪过后，当我们在湖南再度凝视这些满蕴历史积淀的青铜器物之时，仍然能够从它们深厚的质地与精致的纹饰里触摸到历史的沧桑。

一、湖南出土大批青铜器

在一般的人印象中，湖南并不是青铜器的主产地，好像只有河南，后来发现的三星堆，以及云南古滇国等遗址才是青铜器出土的集中地。但后来人们慢慢地纠正了这个看法，就是因为在湖南发现了大量非常精美的商周青铜器。

四羊方尊



湖南宁乡四羊方尊

1938年，正值春耕季节，在湖南宁乡的月山村，农民姜景舒兄弟象往常一样开始了新一年的耕作，祈望着良好年景的到来。令他们意想不

到的是，翻地的锄头刚一用力，便已震得虎口发麻，接下来的发现，更令两兄弟和闻讯赶来的村民兴奋不已。一时间，兄弟二人得宝的消息传遍了宁静的小山村，更是引起了古董商们的热烈关注。几经转手之后，四羊方尊身价大增。不久，政府就得知了有关四羊方尊的消息。

李乔生[23]：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听说这个事情以后，马上让警察局调查这件东西，然后它就归当时的湖南国民党省政府了。

王鲁湘：听说张治中把这件东西收去以后，认为这件东西做笔筒很好，于是就一直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做笔筒用。

李乔生：他也是好奇吧。到1938年日本进攻长沙的时候，省政府就把这个四羊方尊放到湖南省农业银行。农业银行也要迁徙啊，由于没有专门的保护措施，四羊方尊就在迁往湘西的途中被炸成碎片。抗战结束后，四羊方尊重新回到湖南省农业银行，然后就被放置到地库里，无人问津了。1958年恰逢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听说湖南宁乡有件四羊方尊，就指示文化部来查一查。文化部马上派人去查，发现这件方尊在当时湖南农业银行的地库里。他们发现以后很高兴，马上连同包装箱一起运到了北京，经过专家修复以后，这件方尊便成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了。

王鲁湘：它现在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成为青铜器的一件国宝了。

李乔生：一种不成文的说法是，解放以来有十大国宝，四羊方尊在其中排第二。第一件是司母戊方鼎。

王鲁湘：那是河南安阳的，很凝重。这个方尊则纹饰精美，太靓妹了。

四羊方尊不仅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伟大杰作，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改写了长江以北不出青铜器的历史，此后，湖南青铜器在考古研究领域据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王鲁湘：熊馆长，像四羊方尊这些湖南的商周青铜器，在中国的青铜文化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湖南宁乡带盖象尊

熊传薪[24]：湖南这块地方出土青铜器的时间比较早，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一直陆陆续续地有青铜器出土。湖南的青铜器很有特色，对中国青铜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在世界上的影响也非常大。我国的一些藏品要出国参展时，国外的博物馆都会点名要我们湖南的某一件青铜器去参展。我们湖南最著名的青铜器是哪几件？



湖南宁乡羊尊

熊传薪：1949年以前，很多重要的湖南青铜器都被国外收藏了。有两件“虎食人卣”25，一件在法国，一件在日本；有件象尊26在美国华盛顿；有两件羊尊，一件在大英博物馆，一件在日本的根津博物馆。这些青铜器都是这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然，目前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青铜器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我国的青铜器每次到国外巡展，湖南青铜器必定参加，因此引起了青铜器专家的特别注意，很多专家也很喜欢到湖南来考察研究。

人面纹方鼎

王鲁湘：这个四面人物方鼎，好像全世界仅此一件。

熊传薪：这件东西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宁乡黄材镇的炭河里抬出来的。这是农民挖的，挖出来后就当作破铜烂铁卖出去了。我们从冶炼

厂里面把它捡出来，当时已经破碎了。

王鲁湘：有个地方好像焊接了一下。

熊传薪：我们后来对它进行了修复。这个鼎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件四面都以人面为装饰的鼎。关于这个人面兽，有各种各样的分析。



湖南宁乡人面纹方鼎

王鲁湘：它有可能是个神兽，虽然有人面，但身子是兽。这有点像斯芬克斯，也是个人面兽身。它的整个身子被压成一个平面了，中间是一个人脸，两边是两个耳朵，耳朵上面是两个犄角，耳朵下面是两个兽爪。

熊传薪：从人面所表现的人种特征来看，这是典型的蒙古人种，也就是我们东方人种。但他不是简单的人，而是一种神，很有可能是代表农业方面的农神。

王鲁湘：为什么这样说呢？

熊传薪：因为鼎里面有“大禾”两个字。禾就是禾苗，就是稻谷嘛。所以他可能是稻作农业方面的一种神。而且，这个鼎很端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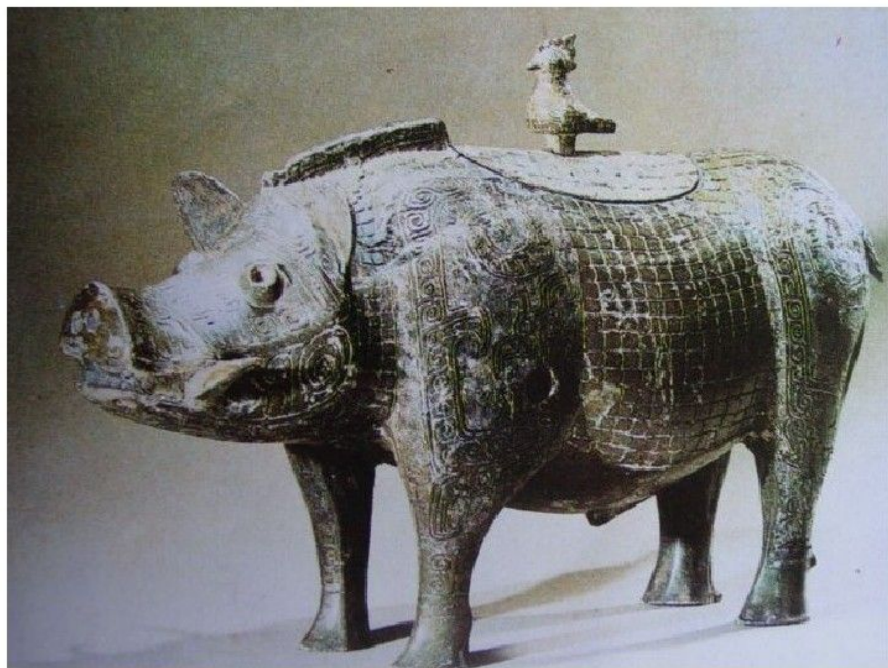
王鲁湘：器形不是很大，但是给人的感觉很大。

熊传薪：所以在中国青铜文化里面，这是一件代表青铜文化的典型艺术品。

王鲁湘：好像只要中国的青铜器出国展览，这一件必在其中。

熊传薪：对，这一件和那个四羊方尊，这两个是代表中国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

猪尊



湖南湘潭猪尊

熊传薪：这件猪尊是1980年湘潭的农民修房子挖地基的时候挖出来的。它是中国唯一的一件猪尊，形体很大，造型也很好，是一只野猪，而且是公猪。它的两个耳朵向着前方，两只眼睛本来还有绿松石嵌在上头，可惜掉了。很奇怪的是，猪全身本应该都是猪毛的，这个猪尊身上却是鱼鳞纹饰。盖上面有一只鸟，应当是神鸟。猪身上还有对穿的两个深眼，前后两个，应当是让棍子对穿过去，然后在祭祀的时候，人们可以抬着它，所以，这是祭祀的一种酒器。由此而看，祭祀在中国文化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王鲁湘：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地位，就不会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做这样一件东西了。

熊传薪：另外，从铸造技术、冶炼技术来看，这件尊也是很不错的，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文物。

象尊



湖南宁乡无盖象尊

熊传薪：这个象尊是1975年我亲自到湖南收购的。这是当时一个农民发现的。这个农民在山上植树挖坑的时候突然挖到一件东西，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捡起来觉得很重，以为是金子，拿到火里面烧，烧也烧不烂。

王鲁湘：你当时是怎么知道消息的呢？

熊传薪：当时的公社秘书看到我们有关文物的宣传画，认为当地农民挖到的也应当是一种文物吧，于是就写信给我说明情况。我马上跑到现场去看，跟他说这确实是地下出土的文物，是属于国家的东西，打算收购这个文物。当时价格很便宜，铜价每斤一块五毛钱，这个总共才五斤，花了七块五毛钱。

王鲁湘：您按废铜价收的。

熊传薪：当时我实在不忍心按铜价收购，就给了他三十块钱。但是公社秘书说，给他那么多钱，助长资本主义。最后我给了他十五块钱，买了这么一件国宝。1978年以后那个农民又找到我，我又补了他几百块钱。现在它的价值要在两三千万以上。这东西太珍贵了，在国内目前就这么一件，世界上只有两件，另一件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那件有盖，这件缺盖。

王鲁湘：当时他带你去挖掘的现场了吗？就再也没有别的了？

熊传薪：没有了，孤零零的就这一件。这件东西小巧玲珑，铸造很精美，上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纹饰。特别是象鼻，最上面趴了一只老虎，鼻头前面是个凤鸟嘴，鼻的下面、顺着象鼻还附着一条倒挂的蛇。

王鲁湘：这是好几种动物复合在一起。

熊传薪：耳朵上方有蜗牛纹，腿上面有老虎纹，臀部还有兽面。从它的铸造技术、纹饰、造型的精美看，都反映了中国青铜艺术的极高水平。

王鲁湘：它被定为几级文物？

熊传薪：一级。

瓿

熊传薪：这件器物叫做瓿[27]，也是五十年代在湖南宁乡寨子山出土的。很奇怪的是，这件器物出土的时候，里面有224件小型斧头。

王鲁湘：这么一个堂里头可以放200多件斧头？



湖南宁乡瓿

熊传薪：都是小铜斧。我们觉得奇怪，是因为这些小铜斧应该是生产工具啊，但是却放在瓿里面，这瓿明明是贵族的东西。有人认为，这

个小铜斧在当时是贵族家里使用的小的生产工具，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货币。

王鲁湘：古代的货币有刀币，也有斧币，总而言之都是财富。

熊传薪：对，都是财富的象征。这里有分纹把它分了好几个面，大的四面，小的有八面。盖子上面也有六个分纹，分了六面。中间的把手是虎头形的，盘了一条龙，所以这种动物也是个怪兽。这件器物的花纹、冶炼技术都是很好的。

铜铙

王鲁湘：这是一种乐器吧。



湖南宁乡铜铙

熊传薪：是的，这种乐器叫铙[28]。湖南是大家所公认的出土铙最多的地方，而宁乡又是湖南出铙最多的一个地方。宁乡曾经有一遗址坑里出了十件铙，而且最有趣的是，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花纹。这个就是一个大型的兽面铙，它是军乐器。

王鲁湘：一般的铙都是用手持着进行击打的，形体不会太大。这个铙这么大，怎么打呢？

熊传薪：这个铙有200多斤，不过湖南还出土过一件“铙王”，有450

斤。这件铙不可能在宫廷里面用，因为在河南出土的几个小铙，形体都不大，手举起来就能敲。这里的铙一般都两三百斤，不可能举着的，应该是用车子载着它。湖南出土的铙，仅商代的就几十件，为什么会这么多、这么大？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王鲁湘：作为一种军乐，这么大的东西出现在湖南这个地方，意味深长。

熊传薪：这个铙的年代，根据花纹来看，应该是商代晚期。关于这些铙的铸造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因为在中原地区还没有过发现这么大的铙。

王鲁湘：那就是说，这个铙不是从中原过来的，而是本地筑造的。

熊传薪：可能是。湖南出了这么多青铜器，而且大部分器形中原都没有发现过，像猪尊、象尊这些东西。

马篇



湖南宁乡马簋

熊传薪：这是一个马簋[29]，它是西周年间的，这在全国也是只此一件。它敞口、鼓腹下收，腹下有长方形座，座内有悬铃舌的纽。它的肩部是四匹昂首伏卧的小马，小马装饰了卷曲的双身龙纹，腹部是卷眉凸眼的大兽面，兽面间有四只垂长冠、长尾的凤鸟。这个簋的器形和座上的兽面纹，都可以在中原地区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应当是受到了周文化的影响，但器身所饰卧马和器座的立马，在其他地方很少见。

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也是当地铸造的。

熊传薪：而且在铸造工艺上，马纹簋的胎壁较薄，器身凸出的马纹和兽面，器内也随着内凹。这样的铸造工艺，在湖南地区商代青铜器上早已出现，很明显地表现了它的地方特点。

二、湖南青铜器的来源

湖南省宁乡县的黄材镇，是一处四围青山环绕的小盆地，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有很多令人费解的地方。首先是它们的形制很奇特，往往是海内孤品，在中原的数十万件青铜器中间都找不到相同的例证。另外一点让人更感不可思议的是，中原的青铜器一般都是放在宗庙之中，是作为礼器来使用的，而宁乡的青铜器不是发掘于山顶就是发现于河流之中，而且有许多青铜器中间还储藏了很多的玉器，很明显，它们是当时的人用来祭祀自然山川之神的，这和中原青铜器使用的途径也是很不一样的。所有这些，都成了宁乡青铜器的难解之谜。

熊传薪：这个问题大家确实都感到很奇怪。湖南出土了那么多象尊、人面纹方鼎，以及猪尊、牛尊等类型的青铜器，在中原地区出土的不下十万件青铜器中居然找不到。

随着对出土青铜器物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对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专家们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熊传薪：关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问题，当时有几种看法。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些东西以前都在北京，李自成从北京败退后，就把这些东西从故宫带到湖南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东西是由湘军统帅曾国藩从外地带回来的。

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来到湖南已经很晚了，是明末或清末的事。

熊传薪：这些说法仅仅是揣测，没有什么根据。还有人说，殷商灭亡以后，有一部分商代贵族逃到了湖南，就把那边的青铜器带到了湖南。但这些说法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从北方带过来的话，怎么在北方没有发现啊。还有一种看法是，这些青铜器就是在本地铸造的。但是在商代晚期以前，这里还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商代叫“蛮夷之地”，属于商王朝的边缘地区，如果这里突然在商代晚期就达到那么高的水平，也不可思议啊。我认为这应该是商文化南下造成的，一部分商的贵族带了一些工匠迁到南方来了。

王鲁湘：整个氏族的大迁移，包括他们的奴仆、工匠都给带过来

了。

熊传薪：对。带过来以后，又与本地文化相结合。

王鲁湘：就是铸造工艺可能是从北方传过来的，但是某些造型，包括某些图纹可能受了本地的影响。

熊传薪：它就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当然，我们还没找到证据，仅仅是一种推测。

大约三千年前，一支亡国的商朝贵族一路向南逃亡，来到了这片山清水秀的地方，发现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就定居了下来。他们建立城市，发展生产，逐渐把这里建设成了一片祥和的世外桃源。当然，这个故事要一直到2004年才由湖南的考古工作者揭开。

王鲁湘：200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宁乡县黄材镇的炭河里西周方国遗址行了有计划地勘探和发掘工作，都发现了什么？

李乔生：这个方国遗址的西北是墓葬区，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七个墓葬，墓里有玉玦、玉璧，还有青铜器。遗址的东南是宫殿，当时发掘了大概将近三千平方米，前后花了两年时间。

王鲁湘：当时发掘出来以后，觉得这个宫殿遗址大概有多大呢？

李乔生：当时发现了两座宫殿，两座宫殿的长度是26米，宽度在八米左右。在当时来说，这样的宫殿是比较大的了。它的柱础直径最长的有1.2米，排列很有规律，很整齐。

王鲁湘：这个遗址是什么时期的？

李乔生：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对遗址的城墙进行解剖，发现它的构筑形式是西周时期的。发掘出的陶器进一步证明，这是西周早期的一个遗址。

王鲁湘：好像都城的中间有两条河流穿过，当年这个都城就把两条河流夹在里头吗？

李乔生：不是的。在西周早期的时候，这条河流是在城址对面的，后来由于冲刷就改道了。

王鲁湘：也就是说，当时这个城是被两条河流环绕的，河流起了保护城邑的作用，只不过河流改道以后，就从都城中间穿过去了。都城的面积应该包括两条河流在内。

李乔生：我们推测当时的都城有二十万平方米。

王鲁湘：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藩国了。

熊传薪：黄材镇为什么会成为湖南青铜器发现的集中地？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的必然性，就是当时从殷商来的那批人进入湘江流域是一个必然选择。因为，如果他们到四川盆地的话，要经过云梦泽，那里不好走，而且当时周人已经把路卡死了；他们也不能进入江西，那里的土著人很厉害，实力强大，而且江西是一个交通要道，不适于安家。湘江流域不一样，四周都有山环绕，而且面积很大，所以他们当时就想到湘潭这一带。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地方力量太大了，最后只得到黄材。这个地方后面靠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

王鲁湘：您认为这个藩国建于什么时候？

熊传薪：商末周初，就是西周灭商的初期。

王鲁湘：那你觉得它是本地土著居民建立的，还是外来迁徙部族建立的？

熊传薪：肯定是外来人建立的，但土著人的政治地位并不低，因为大量的日常用具都是本地人的。当然，外来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像宫殿的形制等都是和中原一样的。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发掘的几座商代宫殿都不是正北方向，这个宫殿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它的建制是从中原来的。墓葬里面的青铜器、葬玉也都是中原人的，本地人以前没有这种东西。

王鲁湘：中原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一般都是在宗庙和墓室发现的，湖南青铜器总是单件出土，不是发现在山上就是发现在河中，这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祭祀吗？

熊传薪：青铜器的埋葬，无非这么几种可能：一个是作为祭祀用品，一个是作为宝贝、财富埋葬，再一个就是作为随葬品。山上的青铜器不太可能是作为随葬品，而如果是作为宝贝埋葬，得请很多人把它抬

到山上去，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把东西埋在了这里，所以也不太可能。这些器物应当是祭祀用的，但是中原的祭祀是用鼎等器物来煮肉，以肉祭祖、祭神，器物本身是不埋的，贡献给祖先、上帝的那些牺牲品才埋掉。这个地区则是把祭器给埋了，这就说明，当时这里祭祀的内容、形式都和中原地区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个礼制系统。不过，有些器物肯定不是因祭祀埋的，比如有些埋在山上、河边的装饰玉。祭祀用的礼玉应是琮、璧这些东西，而这些在河边发现的装饰玉不是礼玉，所以肯定不是用来祭祀的，有可能就是作为财富来埋藏的。

王鲁湘：黄材镇炭河古城遗址的发现，对于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来源来说，是不是提供了某些暗示呢？

熊传薪：这是肯定的。遗址发现以前，虽然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年代肯定是商、周时期，但是没有考古的证据。没有这些考古证据的话，这些青铜器便缺少了历史价值，只有艺术价值。

三、湖南青铜器的特色与价值

湖南青铜器来源的所有线索在西周都城遗址之迷破解之前戛然而止，人们仍然只能在它的纹饰里继续猜测它旺盛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

王鲁湘：与中原相比，我们湖南青铜器在文化和艺术上有什么特色？

熊传薪：湖南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母体，包括铸造技术、纹饰、器形等，都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但它也有很多地域文化的特征，这表现在造型方面。比如以老虎为器形的“虎食人卣”。



湖南宁乡虎食人卣

王鲁湘：我们过去经常说这个青铜器的形象多么狞厉、凶恶，代表了奴隶主的残酷，但现在好像有另外的解释了。

熊传薪：我觉得把这个造型解释为虎吃人是不太对的。你看这个人，他不是很惊恐的样子。他有可能还是一种神，拥抱着虎，这个老虎可能也是一种神。

王鲁湘：对，他还踩着虎的两个脚，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时南方有很多氏族是以虎为图腾的，说不定它反映的就是作为氏族图腾的虎和氏族首领之间的某种关系。

熊传薪：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这个人坐在虎身上，好像在和虎嬉闹、游戏。

王鲁湘：这种器物一共几件？

熊传薪：两件，都是在建国前湖南宁乡出土的。现在一件在日本，一件在法国。尽管都是虎食人卣，但是从花纹上来看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大体构造都是老虎嘴下面含着一个人。

王鲁湘：这个既然在中原没有出现过，那么只能是湖南当地铸造的。

熊传薪：应该是。我刚才说过，中原出土了几万件青铜器，都没有这种器形。

王鲁湘：由上可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动物造型显得特别突出，有象尊、猪尊、牛尊、羊尊、马簋等这些基本动物。这种对动物造型的喜好，好像和中原有点不太一样，中原都是比较几何形的、抽象化的图案。

熊传薪：我个人认为，北方受帝王传统的影响比较深，而这个地方受大自然的影响比较大。

王鲁湘：中原青铜器整个造型古朴、大方、端庄，更注重几何造型，因为几何造型体现的是一种秩序，一种比例，一种对称和平衡，这和当时的宗法制度是吻合的。湖南可能因为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比较远，不太受宗法、礼制的约束，工匠在造型的时候能更多地表现个人的自由意志，发挥个人的想象力，所以就显得更活泼、浪漫一些。

熊传薪：对。除了青铜器艺术，后来我们的楚辞也比较浪漫嘛。在我看来，二者还是有些关系的。

王鲁湘：这些青铜器是我们楚文化更早期的一种东西。

熊传薪：当然，这些青铜器不完全是楚文化，但从楚文化的渊源上可以这样说。

王鲁湘：在青铜器收藏的人中间有一种说法，说品相最好的青铜器要到湖南去找，特别是“黑漆古”、“绿漆古”[30]等，好像它代表性的东西都是在我们湖南。为什么湖南的土壤在掩埋青铜器的过程中，能把青铜器的品相保存得那么好？

熊传薪：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从外表来看，除了纹饰精美以外，跟它埋藏在地下的土质有关系。黄河流域地区的土是沙土，是碱性的；而长江流域的土是酸性的，特别是我们湖南的这种红壤，地质学上叫第四纪红壤。再者，两地区青铜器里面的成分如铜、锡、铅、锌的含量也不一样。北方出土的青铜器，坑口[31]一般不大好看，表面很粗糙；南方出土的很光滑，有玉的质感。所以搞收藏的人，自然对这种造型又好，外表、颜色又漂亮，纹饰又精美的湖南青铜器很感兴趣了。

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对于我们的考古学乃至文化史的认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熊传薪：从考古学发展来讲，我们对于长江以南文化的认识比过去增加了。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中原一个文化中心，其他文化都是从中原传播来的。经过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大家逐渐认识到，中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土地有着不同的文化中心，黄河流域是中原文化发展的一个主体，起着很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中心。这里发现的这些陶器，很难说是中原人来到这里制作的，这些铜器有的具有在中原没看到过的一些特点。当然，我们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得到确定的结果，现在只能做进一步的思考。

王鲁湘：而且我想，它更加丰富了我们青铜文化的内涵。

熊传薪：是的。青铜文化的内涵很深，包括它所表现的铸造工艺、审美艺术、文化哲理等。当时的文化主要体现在青铜文化上面，而且，青铜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也比较悠长。

王鲁湘：我们称那个时代为“青铜时代”。

熊传薪：从夏朝到汉的两千多年，青铜文化是占主要地位的，它本身就包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王鲁湘：对。中国文明的形成阶段实际上就是青铜时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出土的青铜器，还有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在形成时期的那种辉煌，那种灿烂，那种神秘。

探秘古滇国

距昆明南部大约100公里，有一个叫江川的不太起眼的小县城。半个世纪以前，江川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坝子，而它境内北部的李家山也是草木丛生、人迹少至。云南向来山多地少，当地的农民也勤快，开荒地、修梯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于是，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当地老人家的说法，经常有人在李家山的西南坡见到零星的青铜器和玛瑙玉石。老乡们偶尔聊起来，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是谁的？怎么老出现在自家的地里呢？因为找不到答案，所以这批东西被扔的扔，废的废，卖的卖，压根没人把它们当回事。直到有一天，相隔不到40公里的晋宁石寨山一铲子挖出来个滇王金印，村民们才直拍大腿，难不成自家地里的那些破铜烂铁都是宝贝？

一、发现滇王金印

在云南，周回五百里的滇池泽养着昆明盆地里的每一位普通百姓。从滇池东岸眺望距离不足1000米的晋宁县晋城镇，石寨山就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横卧在田间。石寨山脚下，是已逾千年历史的上蒜乡石寨村。1955年3月，当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队第一次进驻这里的时候，村里的百姓隐约听说，他们背后的这座小山丘，很有可能是一处藏满了青铜器物的墓地。

原来，位于云南中部的晋宁古县是滇文化发祥地，是航海家郑和的故里。战国时楚将庄蹻入滇，以晋宁为中心，建立滇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封尝羌为滇王，置益州郡。滇王国都和益州郡治均设于此，称滇池县[32]。

蒋志龙[33]：发现石寨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其实，早在抗战期间，石寨山这批文物就已经流落到社会上了。其中有一部分有40多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当时他们认为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是梁王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云南省博物馆筹备期间，有个文物贩子拿着青铜器请博物馆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他鉴定，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值不值钱。这引起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注意，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批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后来，云南省文史馆的方树梅老先生说，他老家晋宁石寨山在抗战期间出土过一批青铜器，很多好东西都被当时的地主、恶霸霸占了，而文物贩子拿来的这些文物就很像石寨山的。

王鲁湘：其实就是被有钱人拿走了。

蒋志龙：没错。好东西被霸占了，剩下的残破的东西就当废铜烂铁卖出去了。方老先生说了之后，引起了博物馆筹备组的注意，当时就派了两位先生到晋宁去调查。果然，他们在石寨山的一个村民手里收到了一些青铜器，与文物贩子拿来鉴定的那些形制相同。那些村民还能详细描述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挖出来的，当时他们挖的坑都还在。出去调查的这两位先生回来以后，就向当时的博物馆筹备组汇报。汇报以后，博物馆当即决定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试掘。

试掘工作出奇地顺利，工程历时21天，共清理西汉时期墓葬两座，出土青铜器过百件，除了此前在其他省份不曾见过的贮贝器之外，还有

上百件的青铜兵器。

蒋志龙：这批青铜兵器跟咱们中原的铜器，无论是在形制上，还是纹饰上，都完全不一样。当时大家就认为，这批青铜兵器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东西，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恰好这个时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和郭沫若先生也来了，他们看了这批东西，也觉得非常有价值。正是在这之后，才有了后来的第二次发掘。

第二次进驻石寨山之前，考古人员对此曾有过猜测。根据早期大英博物馆和日本零星收藏的文物，再加上第一次发掘的成果证明，在相当于中原的战国到西汉之间，曾经有一支独立的、影响很大的，有一定势力范围的文化在这个村落和山间存在过。这个文明群体或大到一个部族，或小到一个王国。当然，在没有出现文字之前，一切都只能是猜测。直到4000余件文物在考古队员的铲子下陆续出土，这些猜测才逐渐得到证实。

蒋志龙：第二次发掘大概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这段时间。我看当时的资料，发掘人员，包括老先生们在内都非常激动：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到底怎么来证明是谁的呢？

王鲁湘：大家很焦虑是吧？这么好的东西竟不知道是谁的。

蒋志龙：对。他们就在第二次清理的时候，在编号为六号的一个墓地里面发现了一枚金印，当时他们是在墓地筛出来的。

王鲁湘：筛出来的？

蒋志龙：因为它非常小，是从细砂里筛出来的。

王鲁湘：那应该说是非常重大的发现。

蒋志龙：没错。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当时中国的西南被称为“西南夷”，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十几个国家。现在唯一能够得到考古材料证实的，就是这次发现的滇国。从此，这个滇国开始浮出水面。

在今天的云南省博物馆，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次挖掘成果被定格成瞬间，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考古工作着按原大比例复制的当时石寨山的一个墓坑，赫然陈列其中。

王鲁湘：马馆长，这个是当时石寨山一个墓坑的复原图吧？

马文斗[34]：是，这是石寨山六号墓的一个复原图，包括每个贝币，每个文物所在的位置，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考古的原状来复原的。比例是原大，唯一的遗憾是，因为原文物不敢放进去，所以用的是复制品。最主要的几件文物，包括滇王金印、执伞俑、编钟都是在这个墓里面出土的。这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墓主的身份非常高，而且一般人是不敢使用滇王印的，所以墓主应该是滇王。

王鲁湘：但是尸体已经全部腐朽了。



滇王金印

马文斗：对，已经成粉了。我们按当时的考古样子估计，金印可能是拴在腰上的，因为旁边有很多佩件，包括他胸前的一个扣饰等。这个墓的发掘，起码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的滇国的存在。

王鲁湘：而且这个金印本身也把墓葬的归属问题解决了。

马文斗：它还引出了整个王国的故事。

王鲁湘：对，整个滇国的故事就是从这个金印开始破解的。

滇王之印为纯金打造，呈正方形，边长2.4厘米，高1.8厘米，重90克，背上的蛇钮表情十分生动。

马文斗：这个金印出来的时候很有戏剧性。第一次发掘的时候没有发现它，后来发掘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发现土里边有一个黄颜色的东西，有个金色的角露了出来。考古人员开始以为是金扣子什么的，然后一层一层朝下剥，剥着剥着就出现字了。在滇王国的墓葬里边，出现汉字的情况非常少见，后来一看是“滇王之印”，大家都很激动。据说那天晚上大家杀了一只鸡来庆贺。

王鲁湘：在1950年代，杀一只鸡吃是不得了的啊。

滇池边上的石寨山出了一枚滇王金印，这让考古队的专家们既兴奋又迷惑。兴奋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上曾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也就是说，在相当于中原汉代的滇池之畔，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并且曾经臣服于汉王朝。这枚金印一下子给这次乃至后来的很多次考古发掘成果找到了一个标签。可令人迷惑的是，滇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迅速消亡的？仅凭现有的蛛丝马迹，距离了解滇国的真相，恐怕还相差甚远。

马文斗：过去有一个说法，云南这个地方在古代是一个水泽之国。现在昆明市滇池附近有一个部族叫滇族，他们族的名称据说是由古滇国传过来的。经过考古发现，这是一个滇族自己建立的小国家，叫滇国。

王鲁湘：当时滇国的范围大概有多大？

马文斗：五百平方公里到一千平方公里之间。因为它是游牧民族，他们不断地放牧、战争、掠夺，所以它的位置是经常流动的，我们认为它固定的核心区域在五百平方公里左右。

王鲁湘：大概相当于现在昆明滇池周围的盆地这么大。

马文斗：对。它朝几个地方延伸：西边到楚雄附近，东边到昭通、曲靖，朝南到文山附近。总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千平方公里。在当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国家了。

史书中记载的滇国人择滇池、抚仙湖而居，以耕田、游牧为生。循着《史记》里为数不多的线索，考古专家对现有文物进行了分析，但在仔细端详“滇王之印”后，更多的疑惑随之而来。

王鲁湘：1950年代，石寨山的考古发掘成果公布以后，引起了世界注意，当时的日本学者也在研究“滇王之印”。根据西汉的典章制度，印的称谓是很讲究的。在中原地区封的这些王，应该是叫做“什么王之玺”；内地的侯，就叫做“什么侯之印”，而中原周边的这些藩国的王，一般就叫“什么王之章”。只有滇王这个很奇怪，它既不叫做玺，也不叫做章，而是用了一个相当于内地的侯的称谓，叫做“滇王之印”。这应该很特殊吧？

马文斗：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滇国很奇怪，而且滇国和汉朝的关系也是非常特殊的。

王鲁湘：到底是什么关系？

马文斗：早些时候，汉朝想通过这个地方去印度。张骞出使西域，就听说这边有条路可以通向印度。后来，汉朝就派使者去西南，想打通这条道，结果没有走通，因为滇国有一定的势力。于是汉朝就派兵打，打了几次都不成功。一直到了元封二年，才把滇国打败，然后开进去。有学者认为，这个印是应急性质的。换句话说，平抚的汉朝官员不一定会提前想到带着汉王朝印，可是这边的使节通过各种渠道和汉朝通了气以后，可能就在四川单独制了一个印来安抚这边的民众。而且我们现在发现，滇王之印的制作也并不是那么细致工整。

王鲁湘：好像有点草草而成。

马文斗：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印可能是汉朝官员受汉王朝委托，在附近找了家金店做的，用来安抚当地民族。当时任何人都不敢私铸印章，因为私铸印章要砍头的。这个“滇王之印”的铸造或许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可以肯定的是，他既然铸造，肯定有依据，但是最后做得怎么样，这个也不为人知了。对我们的考古工作来说，“滇王之印”的出现，最多相当于打开了一扇了解滇国的

大门。

尽管金印的出现将传说中的滇国拉回了现实，但更多的问题也随之摆在考古学家面前。滇国既然是“国”，那么它的都城设在哪里，怎么才能找到它？

王鲁湘：它的国都到底在哪？

马文斗：目前还没有找到。我们在石寨山附近做了很多考古勘察，没有发现大型的建筑遗迹。作为一个都城的话，它起码要有一定的城池，要有居民居住的地方，要有皇宫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没有找到。直到去年，我们进行航空勘测，才发现在现在的晋宁县老县城附近，有一块城池遗址，但还没有经过最后确认。虽然如此，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墓地规模有这个墓这么大。也没有发现有任何遗迹表明，除了这个滇王以外，还有其他比较大型的滇王遗迹存在。

王鲁湘：应该有好几代滇王吧？但是目前我们只找到一个滇王。

马文斗：只找到一个滇王墓，就是尝羌这个墓。很奇怪的是，它前后延续了将近五百年，我们对它的整个王朝、它的典章制度、它的王位沿袭什么的，却都不清楚。

王鲁湘：因为没有文字嘛。

马文斗：对，所以只能靠一些零散的记载和不多的发掘去推断，比如，通过反映战争场面的一些雕塑，一些贮贝器上面的器盖和纹饰来确定它的历史。由于资料的匮乏，所以到现在为止，滇王的世系还是滇国的一个大谜。

二、李家山初次发掘

在此后的几年里，这批精美的青铜器被文博人员不断地翻来看去，然而，渴望找到更多蛛丝马迹的专家们却迟迟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正在他们为此困惑不已的时候，有人忽然间联想起距离此处只有几十公里的江川县李家山。

李家山早期零星出现的青铜器此时不断地提醒专家们，如果这里同样埋藏着滇国的秘密，那么摸摸李家山的底，会不会就能找到更多想要的答案呢？然而，期待才刚刚萌芽，云南省的考古工作便因为“文革”的到来被迫中断。

王鲁湘：江川的李家山和晋宁的石寨山，它们的距离有多远？

张新宁[35]：如果我们沿公路走，两个地方大概相距四五十公里。

王鲁湘：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们云南人所称的“坝子”吧？就是两个比较大的盆地。

张新宁：云贵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在这个高原上边，由于自然的地质变化等原因，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山间盆地。这些山间盆地，咱们云南人叫做坝子。如果坝子里还有那么一汪湖水，那这个坝子就是上天恩赐的宝地了。

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的坝子最适宜人居住了。

张新宁：最适合人生产、生活、居住和繁衍。

王鲁湘：那就是鱼米之乡啊。

张新宁：在云南的中部滇中，这种坝子有好几个。北面的是滇池盆地或昆明盆地，有滇池；往南是澄江盆地，有抚仙湖；抚仙湖往南是江川盆地，有星云湖。

王鲁湘：就是说，这块地方是最好的地方。

张新宁：在古代云南，它是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李家山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1972年。那时，中断已久的云南文物考古工作逐渐恢复，专家们再也坐不住了。从1960年代中期打算试掘李家山时起到1972年，一晃就是十几年，原本存放在早街村生产队仓库里的那批青铜器据说装满了整整18麻袋，卖给了供销社当废铜处理了，这让文物工作者心急如焚。1972年一开年，考古队员就拿着工具到了李家山。起初，当地“革委会”的“军代表”以为这一群人是来收缴武斗期间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的，还不大配合，声称“县里的武器早就交完了，没有铜了。”几番解释过后，军代表们终于把他们安排在了生产队的一间破仓库里。条件是窘迫了点，可队员们却兴致勃勃。在工地上搭起临时“工棚”的那一天，大家还颇有信心地开玩笑说，一定要抱个“大金娃娃”，不然绝不回去。

王鲁湘：实际上当时已经有风水的概念了。你看贵族选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整个坝子里头风水最好的地方？

张新宁：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它有两个比较奇特的地方：一个是山脚下有温泉冒出来，大概是三十五六度。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勾兑凉水了，可以直接用。由于温泉的原因，早街村栽种的节令比周围的节令要早，它的庄稼也比别地的早熟。再一个，每到冬天，这个低海拔高原地区要么大雾弥漫，要么青霜铺地，但因为有了温泉地热，这个山和它周围的耕地既没有雾也没有霜。这种奇特的景观，可能是当时贵族选择这个地方当墓地的一个原因。

王鲁湘：好像是上帝或者神特别眷顾的一个地方。

从元月十八号开始，挖掘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清理十八号大墓的时候，一个女俑杖头铜饰露出头来，考古队员见其长发披肩，随口就说：“呀，这还是个女的”。这一喊不要紧，早街村一下炸开了锅，到处哄传李家山墓地挖出来个大姑娘，于是，附近的村民像赶庙会一样把考古工地围了个水泄不通。

在逐一理清星罗棋布的墓葬时，考古队员惊讶地发现，躺在李家山上的墓主人身体均不约而同地指向远处豁口里裸露出来的抚仙湖。然而，随即出现的大批青铜器，让此时的他们来不及思考这一奇特的现象。

王鲁湘：那一次考古发现，出土的东西和晋宁石寨山的东西有很惊

人的类似是吗？

张新宁：对，它们在埋葬习俗、出土器物上都是一致的。比如说他们都用贮贝覆盖在身上，都有贮贝器[36]，都有铜鼓、葫芦笙等等，都有一些动物形象的扣饰和铜杖头饰。这是同时代的其他古文化里面没有，而云南滇文化里所特有的东西。

王鲁湘：还有执伞俑是吧？

张新宁：对，执伞俑，男执伞俑、女执伞俑都有。所以当时就能判定，江川李家山跟晋宁石寨山应该是属于同一个古代文化，也就是说，它们同样属于古代的滇文化。

然而因为没有文字，这些贮贝器、铜鼓和青铜兵器主人的身份无法得到证实。这让考古队员多少有些失望，就在他们流连惆怅之际，李家山二十四号墓给了他们一个意外惊喜。日后，几乎成为云南象征之物的青铜重器牛虎铜案出土了。当时，附近老百姓盛传，墓地里挖出来一头活牛，还会叫。1972年5月初，首次发掘结束。云南省考古队共发掘滇国墓葬27座，出土青铜器1700多件，特别是牛虎铜案，带给李家山乃至云南文博界的震撼不言而喻。

随着越来越多的滇国青铜器浮出水面，那些奇特的器形，写实的场面，正在透露出越来越多的信息……然而，裸露出来的真相却依然扑朔迷离。既然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滇人的主体民族是什么？他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如何？由于滇国没有文字，考古学家把目光转向了这些已经出土的青铜器上。

牛虎铜案



牛虎铜案

牛虎铜案是由青铜材料铸成的案祭礼器。其造型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以及维系种族繁衍的努力。

这个铜案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它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稀世珍品。

张新宁：整个李家山等级最高的应该是五十一号墓，但五十一号墓是西汉中期的墓葬；而出土著名的牛虎重器的二十四号墓是战国时候的。

王鲁湘：差不多比五十一号墓早了一两百年。滇国标志性的东西就是这个牛虎铜案？

张新宁：对。出土的时候已经压碎了，有三百多个碎片，所以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也认不出究竟是干啥用的。回来再整理的时候，有些变形了，就把它矫形，焊接，缺的地方用新的铜片去补，修复之后，

才知道它的器形。

祭祀铜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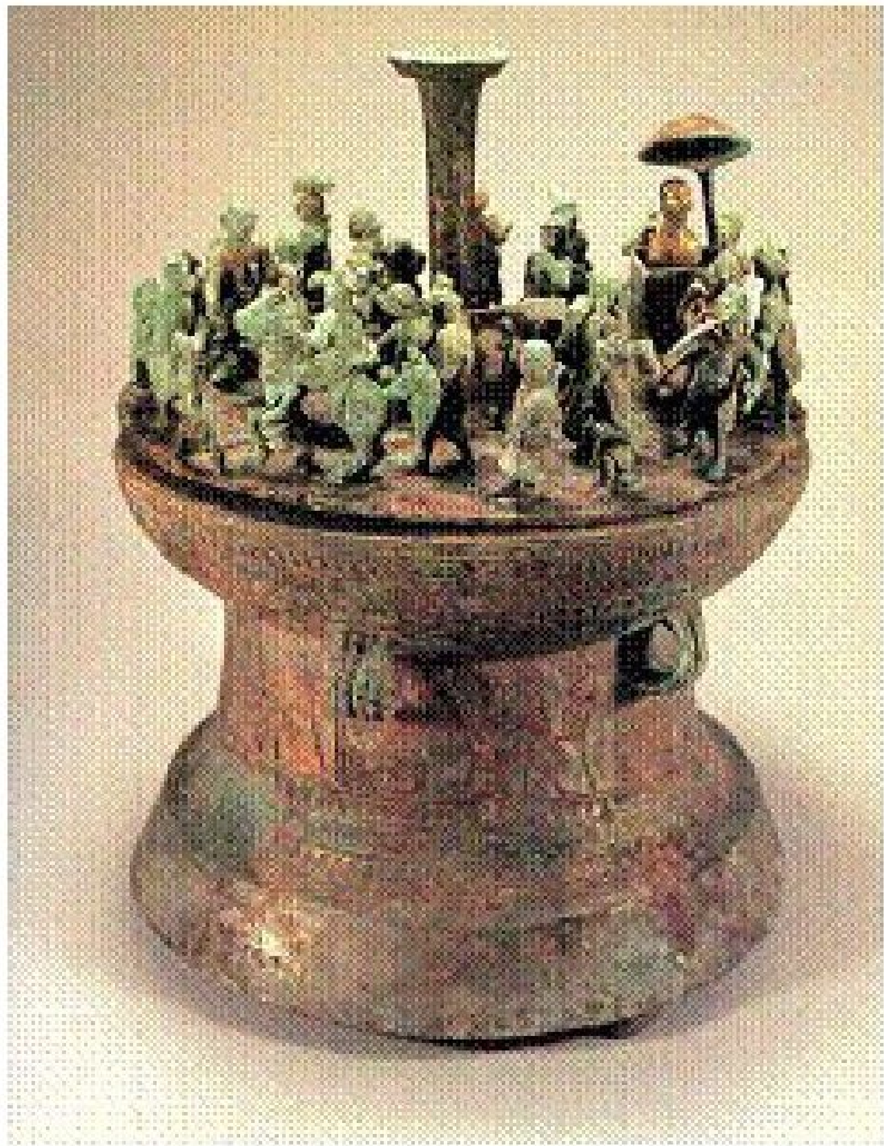
马文斗：目前我们发现的滇文化最主要的代表性墓地有三个，出土的文物大概有四万多件，它们印证了整个滇王国的存在，而且它是作为一个文化区域存在的。

这是一个祭铜鼓的场景，那时的滇国人认为铜鼓是神，在每次使用之前要祭祀，要用人血在上面泼洒。

王鲁湘：等于把几个铜鼓摞起来了。



祭祀铜鼓



祭祀铜鼓内景

马文斗：对，把这些铜鼓摞起来再祭祀，我们叫做祭铜鼓贮贝器。你看旁边有很多人在跪拜，旁边的柱子上面杀了一个人，有的人头都被砍掉了，就是为了祭祀这个铜鼓。你再看，贵族富人坐着一个轿子，旁边的人看见以后要下跪，这就有很多和汉文化接近的东西了。这表明，当时滇国有完整的礼仪和礼制。如果没有的话，人不用看见贵人就下跪的，这和当时官府出来以后鸣锣开道，要回避、肃静，是一样的意思。还有很多场景，你看，这个卖东西的拿着东西在卖。

王鲁湘：对，这个人蹲在地下挎着篮子，篮子里头肯定有什么东西。

马文斗：所以它反映的生活信息和留给我们的历史信息非常多，这就是活生生的史书啊。这些青铜器，特别是它的立体雕塑和纹饰，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证据。它的内容和题材囊括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滇国的历史，比如它的舞蹈、文化；服装、家庭用品；典章制度、等级制度；宗教信仰、图腾崇拜；战争场面等等。但因为它没有文字，所以没法记载下当时发生的事情，没法记载历史进程的层次、规程和整个场景，因而转用实物来表现。

王鲁湘：等于是以图记史了。

马文斗：他们企图把这个东西留下来，告诉后人，过去的战争是什么样子的，祭祀应该怎么做，织布、生产活动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当时它的题材也有限，艺人在做这些工艺品和器物的时候，用的题材多数是自然的题材。他们毕竟要表现一些他见过的东西，不然是做不出来的。这个工匠可能见过祭祀场面，他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就把它记下来了。

战争贮贝器



战争贮贝器

两千多年前，精通青铜制造技术的滇人在富庶的滇池岸边择湖而

居，他们的青铜铸造工艺，尽管在操作技术和器材设备上并未发现有何特殊，但浇铸如此庞大的青铜铸件，所需工序之复杂，所费心力之深，可见一斑。在这个既写实又灵活的圆雕战争场面中，我们似乎可以寻到些许两千年前滇人实际生存的痕迹。

马文斗：过去我们对古代西南民族的衣冠都有争论：他们梳什么头发，穿什么衣服。大批文物出土以后就不用争论了，那个贮贝器上面直接就有。根据研究，这个贮贝器表现的是当时滇国人和昆明人打仗的场景。滇人在昆明区域，昆明人反而在大理区域，两个部族在打仗，他们的发型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滇人即便穿金盔金甲什么的，他们也是没有鞋子的。

王鲁湘：都打赤脚。

滇国墓地共出土贮贝器60余件，这些以丰富圆雕著称的古代“存钱罐”，是滇国青铜器中独有的器型，也是使滇国青铜器享誉世界的功臣之一。在那个遥远的青铜时代，这些形象生动的贮贝器，正是主人身份与财富的象征和见证。

王鲁湘：古代的时候，贝在有些地区是作货币来使用的。那么当时在滇国，贝也是作货币使用的吗？

马文斗：对。云南很特殊，由于环境相对封闭，而且离大海很远，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据我们目前所知是从西周一直到明代，都在使用贝币，这在全国是很少有的。按理说，云南是产铜的地方，应该用铜币，但是因为中央把钱发给地方的速度很慢，整个运输过程又非常艰难；同时，海贝在此地是一种稀有物品，可以作为衡量价值的一种体现，所以以贝为币的风俗在这里沿袭的时间非常长。

王鲁湘：有点类似于贵金属。在滇国发现的贮贝器里头的这些贝，数量多吗？

马文斗：大概有二十多万枚，几百公斤重。我们通过和日本合作研究后认为，这些海贝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印度洋的，一个是太平洋的，以印度洋的为主。太平洋的运输应该需要长途跋涉，到印度洋反而近一些。因为印度过去和云南是接壤的，后来有缅甸就不直接接壤了。应该说，从印度这边运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云南自己不生产，所以这就为它作为货币提供了可能。

王鲁湘：对，至少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三、李家山二次发掘

滇国青铜器流露出来的信息证明，在两千多年前的滇池岸边，滇人在这片富庶的坝子里持续繁衍了五六个世纪，他们的农业、畜牧业发达，冶金业繁盛，族群之间、坝子与坝子之间的交往却并不频繁。由于地理位置和土壤的关系，这些墓主人的骨骼大多成了碎片或粉末，这给辨认他们的身份和葬式等增加了难度。

为了摸清滇国埋藏于地下的更多秘密，1991年，云南省考古队的专家们再次进驻李家山。那时，为了给李家山脚下的磷肥厂找到更多硅矿石，地质部门率先对李家山进行了勘探。

张新宁：因为矿石埋藏比较浅，地质部门采用的是槽探法，就是从山顶向下，顺着山的垂直纵深方向，开了几十条探槽。其中有一条探槽在接近山顶部的时候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这座墓葬在勘探的过程当中肯定被破坏了。为了使它不再遭到破坏，在1991年的12月至1992年的5月这一段时间，省、市、县三级的文物部门共同组成考古发掘队，对李家山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并将试掘范围定在了上次发掘的周边区域。

女性贵族的身影

这一年冬天很怪，冬天打雷、刮大风，天气特别冷，江川也出现了多年不遇的下雪天。一天下午，考古队正在工作，一阵滚雷伴着大风而来，把他们的帐篷给吹倒了，支撑帐篷的铁杆子都被吹断了。那一年的李家山工地上，艰难的发掘工作随着大量陪葬品的出土变得轻松起来。在李家山古墓群的西南侧，一个不同于其他墓葬的女性墓葬坑被考古队员一铲子挖了出来。

张新宁：这座69号墓，是李家山发现的所有女性墓里边规格最高的一座。那些纺织贮贝器，还有播种贮贝器、四个舞俑、鎏金铜鼓，都是在这里出土的。



纺织贮贝器

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60座，出土青铜器近3000件，铁器及铜铁合金制器340余件，另有大量金器、玉石、玛瑙等随葬品和装饰物。这其中，在包括纺织场面贮贝器在内的诸多器型中，女性贵族的身影屡屡出现，并且均雕装精美，仪态悠然，女性在古滇国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

王鲁湘：滇王是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

马文斗：这个还真研究不出来。

王鲁湘：但可以推测，当时在整个云贵高原，滇王的势力最强大，而且他经常会劫掠别的民族。我估计他肯定有很多的妻妾，而且在这些妻妾里头，有些人可能来自异族的女俘虏。

马文斗：抢俘虏用来做劳动力，应该是当时战争的主要目的。因为当时俘虏不是只俘虏一个男人，而是把整家整家的都俘虏过来，这里边应该有女俘虏作他的妻妾、宫女、佣人等。但是因为宫廷遗址还没找到，所以我们无法确认他的后宫到底有多大。

王鲁湘：这里还出土了一批漆器的祖是吧，那么这批祖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生殖崇拜呢，还是某种实用器呢？

马文斗：这是目前争论比较大的一块。国内的学者过去普遍认为，

那几十件种祖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器物，主要用于祭祀和舞蹈。但有些外国学者，像大英博物馆的学者很早就提出，这些祖有一部分应该是实用的性工具。

王鲁湘：就是后宫里头有一部分低级一点的妻妾在性寂寞的时候，拿来做安慰器的。

马文斗：对，他们是对比了阿拉伯国家的后宫情况来做这个研究的。在云南，目前我们还不好说有太多的证据。不过在性关系上，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还是比较自由的。即使是现在的少数民族，也有用生殖器做舞蹈的，像彝族的播火节，男性用自己的生殖器裸体来显示他的勇猛。

牛虎搏斗扣饰



牛虎博斗扣饰

马文斗：我觉得滇文化的动物雕塑非常有趣。它的雕刻一方面很写实、很生动自然，但另一方面，它又把很多奇怪的东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表示一种崇拜意识或其他思想状态。云南的蛇很多，所以多数的器具上都有蛇存在。我们现在认为，当时云南崇拜的图腾是蛇、牛和老虎这三个动物，不同的部落崇拜不同，当时的滇国就把这些图案组合起来了，这件牛虎博斗扣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张新宁：整个滇文化发现的所有动物形象当中，最多的是牛。牛是财富的象征。为什么呢？其一，古代在祭祀的时候，没有牛不能祭天。如果用羊头、猪头，只能是祭等级比较低的神，要祭最高的神就必须用牛。祭祀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一个贿赂神的过程，也是统治者实现自己意愿的过程，通过祭祀，他把自己的意愿升华成神的意志，再传达给民众。这样一来，君主的真理就变成了神的真理。

王鲁湘：所谓“替天行道”。

张新宁：所以祭祀过程本身就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一个环节。

王鲁湘：“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嘛，祭祀被摆在第一位。

张新宁：只有拥有牛，才能在统辖范围内实行最高的行政领导。而且只有拥有的牛多，才能进行多次祭祀，所以说牛本身就是财富。其二，牛本身也是食用、耕种的资源，它本来就具有直接的财富价值。然后再赋予它一定的政权、神权等象征意义，这个形式就可以一直保存到现代。今天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盖房子，房子的两端都要悬挂牛头。虎呢，我认为它应该是滇民族的图腾，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现在居住在云南的彝族，也是以虎作为图腾。

王鲁湘：他们自称罗罗，罗罗就是虎的意思。

张新宁：如果说牛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那么虎就是人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王鲁湘：所以你看这个扣饰的造型，一头猛虎从一头健壮硕大的牛臀部后面跳上来抓住它，好像就隐喻着人应该像猛虎抓牛一样，紧紧抓住和控制财富。

云南青铜器的主要特征，就是崇尚自然、生动，写实、逼真。除此，它还有一个更鲜明的特色：那就是粗犷，崇尚力量。它经常表现人类社会中间的一些杀戮、征伐场面，比如把尸体的头割下来，在手里提着等，这即是某种力量的显现。而表现在动物世界里头，古人也是崇尚同一种丛林规则：弱肉强食。

马文斗：我们古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就是适者生存。

王鲁湘：当时人类在世界上是个少数物种嘛，生活的环境很险恶，

所有野兽在某一方面都比人类要强大。

马文斗：在动物里面，人不是最有力的，但是人比较聪明，他会劳动。在云南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力量，即动物的凶猛和强壮程度往往起着主导的作用，是它们借以生存的主要根基。

王鲁湘：所以人类社会也要学习丛林原则。

马文斗：古滇国人其实并不崇尚后来儒家的那些学说。

王鲁湘：什么仁义道德、温文尔雅，至少在这些青铜器上，我们看不出来。

马文斗：他们的生产力和文化还没发展到这个高度，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整个物质基础也达不到这个条件。在当时，他们必须卖力地狩猎、战斗才能生存下去，生存是第一要义。

四、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发掘

上个世纪末叶，改革开放的篝火点燃了衰落已久的文物市场，盗墓业死灰复燃。于是，李家山、石寨山这些埋藏着大量宝贝的滇国墓地就成了盗墓贼不辞辛劳的作案现场。为了及时抢救和保护这批地下文物，1995年，石寨山考古工地上再一次搭起了工棚，开始了第五次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历时40多天，先后共清理墓葬36座。

蒋志龙：当时选择被盗非常严重的区域进行清理，我们把表土揭开以后，这些墓葬很快就露出来了。

王鲁湘：埋的很浅？

蒋志龙：非常浅。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发现有墓葬了，到底清还是不清？

王鲁湘：那肯定得清了。

蒋志龙：我们马上对这块三百平米的墓葬区进行清理，这才有了1995年石寨山的第五次抢救性发掘。我们发现了时代更早的墓葬，可以早到春秋时期。通过对小墓的随葬品，包括整个墓葬的叠压、打破关系进行分析，我们把它定到春秋时代，这是第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是，我们发现一座规模非常大的墓葬，就是七十一号墓。

这次发现是非常偶然的。那天我们差不多快清完了，准备收工了，突然看到有个地方露出一个青铜状的棍，后来我们发现那是伞把，就是执伞铜俑的伞把。我们把伞把挖出以后，再往下面清了大约二三十公分，那个铜俑螺髻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扩方，于是发现了七十一号墓。从随葬品的组合，还有随葬品的丰富程度来看，它可能是某一代滇王的墓葬，而且是比石寨山六号墓时代更早的某一代滇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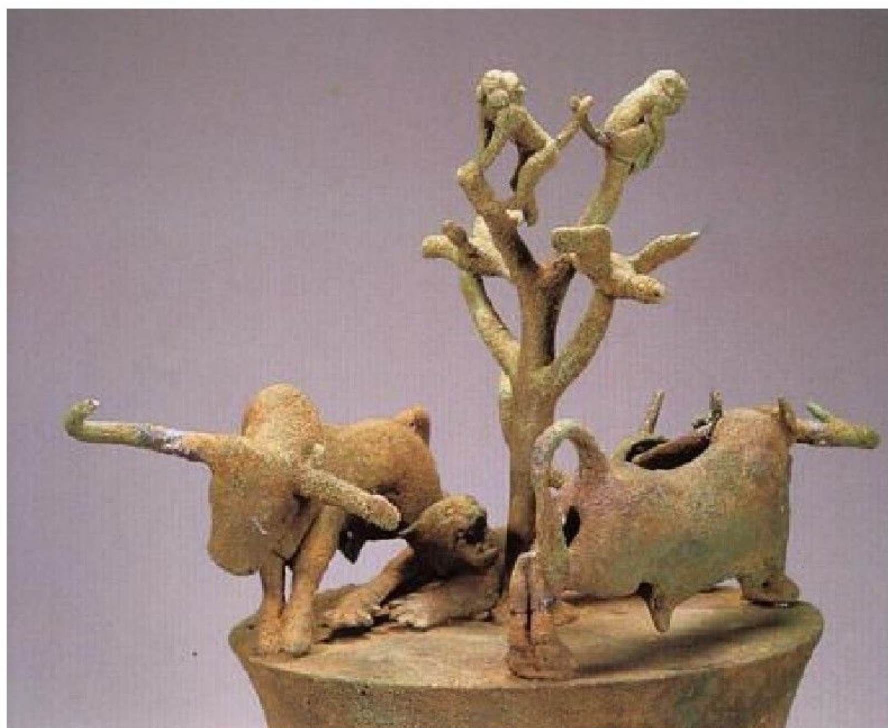
牛虎搏斗贮贝器

在这片至今仍然存留着大量滇国秘密的地层之下，考古人员历经五次发掘，共清理滇文化墓葬86座，出土文物难以计数。

马文斗：这件牛虎搏斗贮贝器是1995年在石寨山进行第五次发掘时

发现的。你看，牛和老虎的搏斗场面非常逼真。老虎围着树跑，用树作掩体，牛不断紧逼，可见搏斗非常激烈。最难能可贵的是，这场搏斗的激烈程度，并不全是直接表现，它还从树上面的动物来表现——小猴子在惊叫奔跑，鸟在惊飞。这说明创造者的构图和美术思维非常细腻，牛和老虎如果在这里单独搏斗，就会显得单调，而用树上的动物一衬托，整个场景就完全不一样了。

王鲁湘：气氛就出来了。



牛虎博斗贮贝器

马文斗：所以上面的动物都在惊飞、惊叫，这应该是目前发现的贮贝器中场景造型和美术构图最好的一件，可谓是典范之作。因为古人很少有这种立体思想，很少想到把整个纹饰作为整体场景导演出来。

王鲁湘：这些滇人工匠，观察生活很细，正如前面所说，这些场景应该都是他们亲自见过的。像这样高超的雕塑写实能力，不可能是一下子就达到的。

五、追溯滇族之源

从发现滇王之印到现在，神秘的古滇国依然被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它来自哪里是个谜，到哪里去的又是个谜。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中间的几百年，它却在滇池附近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王鲁湘：奇怪的是，在滇国的青铜器时代之前，我们似乎看不到有一个过渡，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好像它突然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峰，然后又突然消失了，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呢？

马文斗：这也是目前滇国留给世人的最大谜团。一般的部族，发生发展都有考古资料的印证。但滇国没有文字，它早期的发生发展也没有记载，所以没有考古材料的旁证，这是很罕见的。中国这几年的考古是比较兴旺的，我们还动用了很多新设备，比如卫星勘测，航模拍摄等等，还是没有发现过多的滇文化早期遗址。

王鲁湘：有一种解释就说，它如果没有本土文明一级一级发展的佐证的话，那就只能说它是横向移植，也就是说，它是从另一个地域移植过来的某种文化。如果这种说法成立，滇文化最有可能从哪里过来？

马文斗：这种解释也很难自圆其说。因为在滇文化周边，甚至整个世界的青铜文化里边，并没有发现和滇文化青铜器相同类型的文化。

王鲁湘：完全相同的没有，但找得出联系的却有，比如草原上的斯基泰文化、鄂尔多斯文化。

马文斗：我们发现，只有斯基泰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和云南青铜器有相近的联系。根据人类学的文化流向研究来看，云南的民族多数是草原文化民族迁徙过来的。

王鲁湘：草原民族的后裔？

马文斗：就是从甘肃、宁夏沿着三江并流这个文化通道，流到这里的。既然民族学上是这样的，文化人类学上这种流传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推测，有一个草原部落在当地留下来以后，结合当地的一些土著文化，创造出了另外一个新的不同的文化类型，这就是滇文化类型。滇民族的族源，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了，就是甘肃的草原文化的后裔。

王鲁湘：到了西汉后期以后，滇文化就逐渐没有了。它是真的没有了，还是化整为零，到了我们云南更边远的地方呢？比如说到了三江流域，变成了云南现在的彝族啊、佤族啊、独龙族啊，化到这些民族里头去了。

马文斗：就人种来讲，就目前当地部族的人种来讲，滇文化后来确实演化为彝族等现在的民族了。但是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滇文化的文化现象却没有保留下来？我们都知道，任何民族的源流都是和它的整个人种与文化一起传下来的，但为什么滇文化人种演变成了其他民族，但它文化的东西却没留下来？你看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它的纹饰习惯、器物形状等，都没有传承下来。这在其他文化类型里是很少见的，这也是一个谜。

滇人留下的谜团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考古队员的身心。在云南滇中地区，大量青铜墓地的主人是从哪来的？族群的痕迹何在，生活区是什么样子的？2006年2月6日，考古专家接到消息，距离澄江县城大约三公里的金莲山发现墓葬被盗，考古队随即介入。

蒋志龙：我们这几年把重点转移到了寻找滇王国时期的一些聚落上，2006年，我们发现了大量同时期的遗址，而且墓地周边也都有相对应的遗址。

王鲁湘：也就是说，他生活的地方和死后埋葬的地方离得并不远。

蒋志龙：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墓主人棺材的方向，很多是朝着他生活的这个遗址的，有这么一个对应关系。

王鲁湘：他是想死了以后仍然能看着后人在这里继续生活。

这样的发现，让考古专家兴奋不已，金莲山墓葬群保存完好的人体遗骸将成为研究滇人族群的基因库，这似乎给古滇国神秘的大门找到了另一把可能发挥作用的钥匙。然而，金莲山是否就是滇民族的生存聚落？那些腰坑里出现的累累白骨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之前，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20世纪末叶，就在考古专家的小铲子持续翻动的时候，又有人传出抚仙湖底惊现一处类似城墙的石砌建筑。有人大胆猜测，这些“石埂子”该不会就是遭受巨大自然灾害后陷落在湖底的滇王宫吧？一时间媒体

蜂拥，群众哗然。新一轮的争论开始了，而那个曾经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那个至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青铜王国的故事，还将在云南的大地上不断传说。

发现阖闾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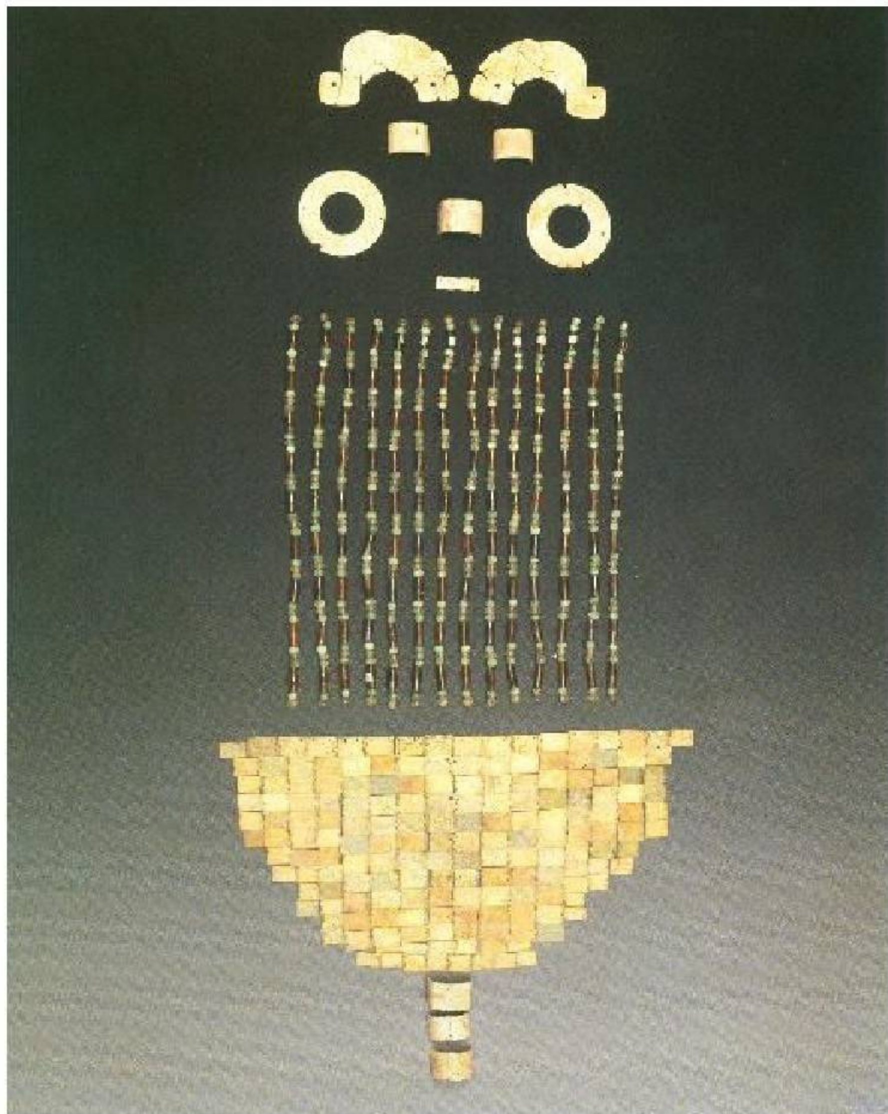
苏州城西，太湖之滨，有一座江南古镇，名叫木渎。相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专宠西施，特地为她在秀逸的灵岩山顶建造馆娃宫，源源而来的木材堵塞了山下的河流港渎，史书记载“木塞于渎”，木渎之名便由此而来。

2010年的一天，木渎镇上来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在此后的日子里，一系列的惊人发现，让这个千年古镇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当地人豁然醒悟，祖祖辈辈流传着的那些传说故事，原来都是真实的。也许，当尘封多年的秘密逐一解开之后，木渎将重新定位自己所承载的历史。2011年1月，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10年六大考古新发现中，苏州木渎春秋都邑赫然位列其中，一座可能改写江南历史的古城遗址，渐渐浮出水面。

一、真山大墓

苏州自古就是春秋吴文化的中心地区。近年来，在苏州市周边发现过很多春秋时期的墓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2年出土的真山大墓。考古工作者打开墓室之后，发现墓主人身穿一件精美的玉甲，显得十分高贵。在苏州春秋时期发掘的墓葬中，这个墓葬的级别显然是首屈一指的。

钱公麟[37]：这是由玉面饰、珠襦、玉甲，加阳具饰所组成的一件衣饰。大家都知道著名的金缕玉衣，而它可以说是金缕玉衣的前身。这件东西显然不是一般身份的人所能拥有的，它特别精美，我们认为，它出土的时代应当是春秋中晚期。综合它的级别和年代，我们认为这是第一代吴王寿梦墓葬所拥有的，这个墓葬也就是寿梦的墓。



真山大墓玉甲衣

苏州当地专家认为，真山大墓的墓主人就是吴王寿梦。不过，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因为在1996年，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在距离苏州仅仅200多公里的古越国都城绍兴，发现了印山越国王陵，其规模显然比真山大墓宏大许多。也就是说，作为吴王的墓葬，真山大墓的等级至少也应该与此相当。更何况，在第一代吴王寿梦的时代，吴国国力已经不容小觑，其强盛程度，直接奠定了吴国在阖闾时代走向鼎盛的基础。

王卫平[38]：吴王阖闾在上台以前叫公子光，他的祖父是吴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国王，叫寿梦。寿梦有四个儿子，老大叫诸樊，老二叫余祭，老三叫余昧，老四叫季札。季札这个人非常有才华，深得寿梦喜爱，所以寿梦很想把王位传给季札。季札是吴国最懂得礼仪制度的人，所以当他父亲想把王位传给他时，他认为这违反了祖宗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样一个规定，坚决不肯继承王位。寿梦在临死以前，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和几个儿子讲好，王位兄终弟及，就是哥哥老大先当国王，他死了以后传给老二，老二传给老三，老三传给老四。这样一来，季札就没有可以推辞的理由了吧。老三余昧去世以后，按道理应该是季札继承王位，但季札还是不肯，于是就逃出去了。大家没有办法，最后就拥立老三余昧的儿子僚当了国王。僚当上国王以后，引起了公子光的强烈不满，他想：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我的父亲是寿梦的嫡长子，而我又是诸樊的儿子，那这个王位应该通过我的父亲传到我的身上，僚怎么可以当这个国王呢？他暗地里招兵买马，想找一个机会通过暴力手段来夺取政权，这时候，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到了吴国，就向公子光推荐了一个著名的勇士——春秋时期三大剑客之一的专诸，最后通过“专诸刺王僚”事件帮助公子光夺取了吴国的政权。

二、子胥建都



伍子胥画像

伍子胥本是楚国人，在一场政变中他的父亲和哥哥被楚平王所杀。伍子胥身负血海深仇，投奔到吴国公子光门下。公子光弑兄夺位，成了吴王阖闾，伍子胥因策划政变有功被封为行人。一日伍子胥对阖闾说："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于是，伍子胥上台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阖闾建造一

座都城。

王卫平：吴王阖闾委托伍子胥建造阖闾大城，也就是吴国的都城。据说，伍子胥在建立阖闾大城以前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所谓“相土尝水，象天法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在这个地方建立城郭，必须对这个地方的土质、水质详加考察，土质要细腻，水质要清甜，对所处的地理环境、城市生态都有一定的要求。条件完备后，才能建立阖闾大城。调研以后，他就建筑了一个周围四十七里的阖闾大城。一般来讲，这个阖闾大城在现在的苏州。

成书于东汉时期的《吴越春秋》明确写道：“阖闾元年使伍子胥在姑苏建筑大城。”姑苏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另据唐代学者张守节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千百年来，苏州人一直以苏州是吴国古都而感到骄傲。一直到今天，他们还在感念伍子胥给苏州带来的恩德。

徐刚毅[39]：伍子胥的到来，对吴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他最先的表现就是建立城池。

王鲁湘：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建一个城池是很重要的吧？

徐刚毅：当然很重要。因为王室如果没有城池，也就没有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一切都是散漫的。

王鲁湘：没有一个中心的概念，就凝聚不起来。

徐刚毅：而且中国那时候有很多诸侯国，但凡稍强盛一点的，哪个没有国都啊。

王鲁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在冷兵器时代，如果没有一个高大的城池，恐怕也不足以自卫。

徐刚毅：除了建都之外，伍子胥还开拓运河，这是中国历史上运河的起源。应该说，中国现存的几条运河，都是伍子胥在吴国开筑的。

王鲁湘：后来它发展成为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

苏州市就是当年伍子胥建造的吴国都城阖闾大城，这种观念已经在

苏州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但是它在近代受到了质疑，那么，是什么样的证据在撼动着苏州人的骄傲呢？

徐良高[40]：2000年前后，就有学者根据考古的现象，对于所谓吴国的都城在苏州的说法提出质疑。因为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没有发现相当于先秦时期城市的建筑遗迹。

王鲁湘：所以当时就有一些学者提出，是不是有可能在另外的地方？

徐良高：应该在那个时期的遗迹分布比较密集的地方。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无锡和常州的交界处，发现并确认了春秋晚期的城墙。根据古城遗址的等级规模、年代布局，有专家初步推断为吴王阖闾的都城。这就对苏州古城的千载定论发起了挑战。春秋吴国的都城到底在苏州还是在无锡，一时间争论不休，而具有都城规模的木渎镇的发现，又是乱上添乱，似乎这三个地方都有可能是当年的“阖闾城”所在地。那么“阖闾城”到底在哪儿？伍子胥当年到底选择在哪里筑城？在更多更扎实的考古新证据出来之前，我们还是暂且搁置这个问题，先来看看木渎古城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历史价值。

徐良高：我们认为这遗址非常重要，确认它是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城址，是在2010年。

王鲁湘：发掘出土的哪些证据形成了证据链，证明这里是春秋时候吴国的都邑呢？

徐良高：我们通过这一年多来的工作，发现遗址有至少南北两道城墙，北城墙一千多米，南城墙也差不多接近一千米，这个规模相当大。另外，我们发现南城墙有一条河，河道里发现有瓦。瓦也是那个时期特有的，即具有东周时期的特征。这些重要迹象结合在一起，我们就知道其重要程度了。

王鲁湘：是一个大城。

徐良高：是政治中心，有高等级的人住在这里面。

灵岩山位于木渎古镇的北部，站在灵岩山的最高点“读书台”，我们可以看到被群山环抱的木渎盆地。这里河网交错，又与太湖水系相通，

的确是一个交通便利、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灵岩山的东边，是现在苏州城的范围，遗址实际是在灵岩山西边的盆地里面。它的西北方向是穹窿山的范围，翻过穹窿山就是太湖。

根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的记载，伍子胥所建的阖闾大城“周围四十七里。”而东汉《越绝书·吴地传》记载：“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这两本古书的记载基本一致。那么这个数据，与木渎古城遗址相吻合吗？

王鲁湘：根据《吴越春秋》等一些文献记载，伍子胥筑的城是个重城，两层的。大城周回有四十里，再加多少多少步；里头还有个小城，是周回八里又加多少多少步。您刚才提到南边的城和北边的城有上千米，这么一说的话，四面一围正好是八里左右吧？

徐良高：有人做过一个计算，根据南面、北面城墙的长度，把它封闭起来算面积，跟《吴越春秋》上的记载非常接近。

有学者认为，苏州城区地势开阔平坦，在那个战争频繁的年代，把都城建在这里实在不安全，作为军事家的伍子胥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那么，当年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时，会把目光聚焦在木渎古镇吗？

王鲁湘：伍子胥是一个军事家，他要给吴国建立一个都城，一定会先从军事上来考量。因为古代的城市主要是一个军事设施，其次才具有行政的作用。您从地形、地理上来比较一下，这两个地方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哪个更适合作为都城？

徐良高：在东南这一片，木渎的地形确确实实是非常理想的。木渎盆地周围是非常典型的一圈山，只有大约四个可以往外的关口，而西边隔着山便通到太湖。

王鲁湘：非常理想的地形。

徐良高：这个地方又毗邻太湖，但是跟太湖又不是直接敞着面对。据文献记载，吴越之间的多次战争也都是在太湖发生。由此你可以看到，它的选址确实是很讲究。

三、吴越争雄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木渎镇确实比苏州城具备明显的军事战略上的优势。战事频发的春秋时期，都城的第一要务是军事防备。因此，阖闾大城从诞生第一天起所担负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抵御外敌入侵。而当年在这座城的内外，就发生过很多与战争及军事有关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兵圣孙武的“吴宫教战”。



孙子画像

伍子胥的好友孙武原是齐国人，相传伍子胥曾向阖闾七次推荐孙

武，都被拒绝了。不过阖闾对孙武所写的《孙子兵法》却十分欣赏，并问孙武，这些兵法能否用于实战，于是孙武就通过操练宫女，进行对抗演练，诠释演绎了他的《孙子兵法》。

王卫平：吴宫教战的故事是这样的：孙武把吴国宫廷里边的180个宫女组成了两个队，分别由吴王阖闾的两个爱妃担任队长，组织她们进行军事操练。你想想看，这些宫女一天到晚生活在王宫禁院里边，难得出来见见世面，今天突然要把她们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进行操练，她们感到非常有趣，嘻嘻哈哈，不听号令。孙武非常生气，三令五申，要按照命令来执行，但是她们还是不听。在此情况下，孙武就严格执行军法，准备砍了吴王两个爱妃的头。

她们毕竟是自己最喜欢的女人，所以吴王阖闾就派人向孙武求情，说杀掉她们，自己会吃饭吃不香、睡觉睡不着的。这个时候孙武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也就是我们平常耳熟能详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在军队里边治兵，执行军法，国王的命令我也是可以不听的。于是孙武就把两个队长杀掉了。这样一来，那些宫女当然害怕了，一下子就规矩起来了，认认真真地按照孙武的命令进行操练。



《孙子演阵教美人战》图

这个时候吴王阖闾非常不开心，因为自己最喜欢的二个妃子毕竟被杀掉了。所以当孙武向吴王报告说我这个部队现在训练得很好了，你如果叫她们去冲锋陷阵，她们都是愿意的，阖闾就对孙武不理不睬。后来经过伍子胥圆场，向吴王讲述以国事和大局为重的道理，吴王阖闾才转

怒为喜，最后就任命孙武担任了吴国的将军。有了伍子胥、孙武这些人，在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上台九年以后，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

公元前506年，孙武带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军，长驱直入占领了楚国都城郢。伍子胥鞭尸楚平王，报了杀父之仇。从此吴国消除了来自西方的隐患，国力走向鼎盛。然而，就在吴王阖闾的春秋霸业如日中天之时，南方的越国却成了他的噩梦，历史上著名的“吴越争霸”就此拉开帷幕，而上演这场争霸的中心舞台，正是吴国都城——阖闾大城。

徐良高：木渎古城南面的城墙保存得非常好，我们调查的时候发现城墙中间有一个豁口，这个豁口不像是后来人挖的，有可能是城门。我们去年发掘的时候，就专门在这个豁口做了发掘，结果挖开以后，看到豁口中间有一条河穿过。

王鲁湘：也就是那时候的水城门？

徐良高：对，水城门。河底的淤泥里面发现了非常典型的春秋晚期的陶器、瓷器，还有铜箭头和瓦片，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发现。瓦实际上跟古代的高等级建筑有关，所以可以看出，曾有相当等级的人在这个地方生活过。

《越绝书·吴地传》载，“吴大城，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这样的记载，对应木渎古城发掘出的水城门和建筑瓦片来看，使得人们对这座古城与阖闾大城的关系生出了更多的想象空间。面对今天的这一段段土丘，人们可能无法想象2500年前的这座城池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景象，但在考古学家们的眼中，看到的却是一座规模巨大，盛极一时的吴国都城。

具有政治胆识的阖闾大力搜罗人才，采纳良策，听取民声，并修建城郭，设置守备，积聚粮食。经过几年的努力，吴国不断发展壮大，百姓丰衣足食，为称霸诸侯做足了准备。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所败。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立志报仇。为此，他特派专人驻守在宫门口，每当他进出的时候，便会向他高喊“你忘了越王勾践的杀父之仇了吗？”夫差则回答说“没有忘记”。阖闾死后第二年，勾践主动攻打吴国，在夫椒山被吴军打败。勾践向吴王夫差求和，与大臣范蠡一起到阖闾大城做了吴王的奴隶。



越王勾践剑

王卫平：越王勾践他们来到吴国以后，勾践的工作是当吴王夫差的马夫，帮他养马、铡草、喂马，他夫人的工作则是洒扫、织布、洗衣服等。

勾践在吴国卑躬屈膝，任劳任怨。即使是这样，伍子胥还是一再建议把勾践杀掉，以绝后患。夫差或许是被勾践的忠诚所感动，没有采纳伍子胥的建议，并因为这件事跟伍子胥产生了裂痕。勾践在吴国忍辱负重，日夜期盼着回到越国的那一天。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

王卫平：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吴王夫差生病了，这个病大概生的蛮重的，拖了好长时间。这个时候范蠡就给越王勾践出主意，说你最好去看望一下。勾践就通过伯嚭去求见吴王，正好碰上吴王夫差在大便，他就在外面等了一会。当伯嚭拿着大便桶出来的时候，他就上前去尝了一下吴王的大小便，然后跑进去向吴王夫差祝贺，说从粪便的味道来看是有一点苦，不过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过不了多久，你这个病就会好转了。这个事情弄的吴王夫差非常感动，于是就下决心把他们放回去了。

勾践回到越国之后，卧薪尝胆，立志复仇，经过二十年励精图治，国力有了大大的增强。他还精心挑选了美女西施献给夫差，在迷惑其心的同时，也让夫差放松了对自己的警惕。于是，吴王夫差完全将注意力放在了和北方诸国的争霸上面，不管伍子胥怎样好言相劝，夫差还是一意孤行。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在一次与齐国的战争大胜而归之后，君臣关系终于走到了尽头。

王卫平：夫差曾经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在出使齐国，就是送战书的时候，伍子胥把自己的儿子寄托给齐国的大臣，这被夫差怀疑为勾结外国，所以夫差就赐子胥宝剑让他自杀。伍子胥自然感到莫大的冤枉，临死以前和他的家人讲，我死了以后你把我的眼睛挂在东门上面，好让我看看越军是如何攻进吴国都城的。吴王夫差听了这个话很生气，后来就把他装进皮革里扔在了江水中间。

四、废都之后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军攻破吴国阖闾大城，一举灭吴雪耻。在此之后，阖闾大城作为吴国国都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然而，一个疑问也随之而来，假设今天的木渎古城遗址就是当年的阖闾大城，那么，这座盛极一时的国都，又是如何荒废，并最终成为今天的这一段段残垣断壁的？而现在的苏州城区，又是何时开始出现的呢？

徐良高：文献记载，越灭了吴以后，有一段时间是迁都到瑯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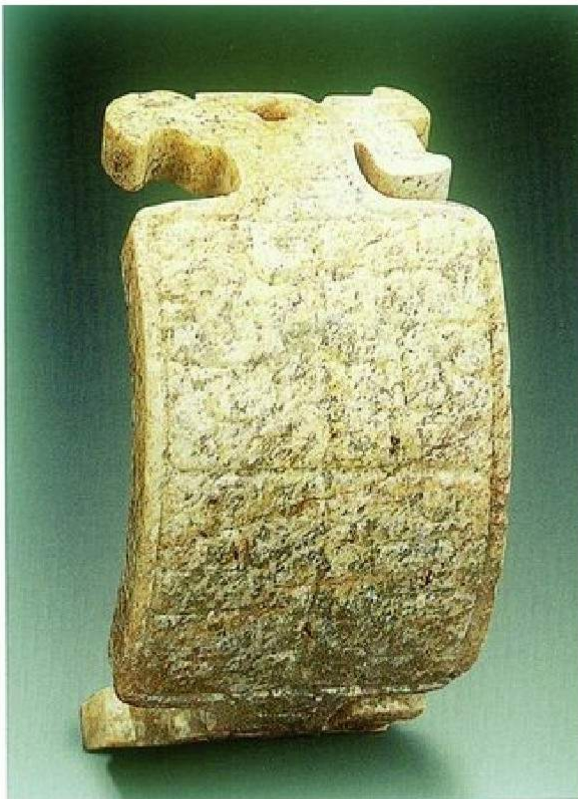
王鲁湘：迁到山东来？

徐良高：迁到苏北、山东这一带。但是后来不行了，它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它也可能是利用了吴国的故城，文献对此记载得不是很清楚。后来楚灭掉越，文献记载春申君的封地就在吴的故墟，不过，后来春申君也很快被废黜了。

王鲁湘：再往后这个地方可能就没有了？

徐良高：我们现在在苏州城下面发现好多汉代的城墙，因此可以知道，汉代以后，主要的城市建筑应该是在现在的苏州城下面。

1986年，就在距离木渎古城遗址不远的严山，一批采石工人发现了一大批春秋晚期的玉器。其数量之多，仅次于河南安阳的妇好墓，而其制作之精，规格之高，甚至超过了妇好墓。然而，等级如此之高的玉器，其埋藏地点竟丝毫没有墓葬的结构，埋藏方式也显得十分匆忙而草率。这批显得十分不合理的珍贵玉器，仿佛在预示着一个答案：这里可能经历过重大的历史变革。

鹦鹉首拱形玉饰

张照根[41]：玉器的种类非常多，有玉瑗、玉觿、长方形的勒子、虎形佩、鹦鹉首拱形玉饰等等。从雕工、纹饰的特征来判断，应该是吴国晚期的东西。你看这个鹦鹉首拱形玉饰，做工非常精美。

据《越绝书》记载，公元前473年，勾践率军攻到阖闾城下，吴王夫差带着些兵马和财物从灵岩山突围。于是有人猜测，严山窖藏玉器有可能是当年夫差逃亡时留下的。严山玉器窖藏距离木渎不远，它和木渎发掘的古城遗址会有什么联系吗？

张照根：玉器埋藏地点与春秋古城遗址相距不太远，大概有五公里，都在这个大型城市聚落群里面。古城的等级和这个玉器埋藏的等级之间应该有必然的联系。

苏州考古工作者在上世纪末发掘的真山大墓和严山窖藏，是迄今为止苏州地区发现的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而这两座山所处的位置，恰恰在以木渎古城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中。2010年，苏州古城联合考古队对

古城遗址周边群山进行了一系列探查，结果不出所料，春秋时期的墓葬在这一地区分布十分密集。无疑，这将是考古工作者今后工作的重点。

虽然目前的证据还无法证明木渎春秋古城就是当年的阖闾大城，但至少给今人带来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还仅仅是个开始，在城墙遗址之后，古代都城所特有的宫殿遗址在哪里？贵族们的墓葬在哪里？象征着一个王国最高等级的吴王陵寝又在哪里？在今后的几年中，中国社科院和苏州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能否带来更大的惊喜，能否给《吴越春秋》的精彩故事找到一个真正的归宿，我们只能留给时间来做解答。

千年阅一城

今天，如果让你说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都市，你会想到哪里呢？是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还是香港、上海或者北京呢？答案可能是仁智各见。但如果把时光拨回到1500年以前，答案恐怕就是唯一的了：那便是中国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城。

这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背依400里巍巍邙山，南临千年流淌的洛水，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帝王建都之所。当年，一座浩大的城池曾在这里岿然傲立。城中殿堂楼阁鳞次栉比，高台宝塔巍峨耸立，船车商贾周于四方，文人雅士往来不绝，繁华景象丝毫不逊明清的北京城。

然而造物弄人，公元534年，统治中国半壁江山的北魏王朝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各自营建新都，而原来的国都洛阳则在连年不断的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后来，隋统一全国，隋炀帝另辟新址，在现代洛阳城附近大规模营建都城，盛极一时的汉魏洛阳城最终被岁月遗弃，空留下一截截若隐若现的断壁残垣。现在，这里被称为“汉魏洛阳故城”。

一、故城兴衰

汉魏洛阳故城，位于今天洛阳城东15公里处，那些在地面上隐约隆起的土台、土堆，便是故城的遗存。通过对这些城垣的解剖和试掘，考古人员发现，现存的遗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其中外郭城南北东西各长10公里，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古代都城。



汉魏故城内城北墙遗址

王鲁湘：徐先生，这应该是内城的北墙。

徐金星[42]：对。现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城墙，一般的地面上保存有一到两米。这个北墙，尤其是东北角那一段，保存得最好，大概有六七米高的样子。

王鲁湘：从这个墙向南，可以看到宫邸万重次第开；向北呢，可以看到邙山春夏秋冬的各种自然风景。

徐金星：好多外国人看到一千多年前的城墙，感到非常吃惊、非常震撼——他们的国家没有这么长的历史。

王鲁湘：而且是一座由人工设计规划的庞大城市。一千多年在人类的历史上，可能算比较长了；但是在地球的历史上，那真的是一瞬间。这一瞬间之后，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一个都城，现在全部化为了农田。

徐金星：所以司马光在路过这个城的时候，就发出了“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那样无限深深的感慨。

王鲁湘：古今兴亡之事，就这汉魏洛阳故城了。

徐金星：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都使用汉魏故城作为都城。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证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就已经有这个都城了。西周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0年，如果从它的中期算的话，算到北魏是五世纪，那就是距离现在1400多年了。说它是千年古城，是没有问题的。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推翻殷商的统治，建立了西周王朝。根据史书记载，最早提出营建洛邑的，正是周武王本人。初得天下的他为了能有效统治中原大地，曾计划在夏商两朝的旧都洛阳兴建一座供周人居住的城邑。可惜武王第二年不幸病逝，这一遗愿便交给了其子成王和辅政的周公。此后几年中，经过一系列的勘察、占卜和兴建，洛邑便在周公的主持下宣告建成。那么，西周初年营建的这个洛邑，是否就是汉魏洛阳城的前身呢？

王鲁湘：我们说“周公营洛邑”，他在洛阳这个地方建了两个城对吧，一个是王城，还有一个叫成周。

徐金星：周公营建洛邑，这个已经是定论。当时营建洛邑是营建了两座城还是一座城，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但是多数学者认为是两座城。经过考古发掘，我们在汉魏故城那儿发现了西周的城，但是年代上只能推到西周中期，它是不是西周初期周公营造的城，现在还没有定论。有些学者以为，应该是周公初年营建的城。

王鲁湘：总而言之，在汉魏洛阳故城我们已经发掘到了周的城墙。

徐金星：对，现在我们认为，这就是汉魏洛阳故城的创建之始。

洛邑两座城池建成之后，周成王亲临这里举行落成典礼，并把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迁入王城太庙。从此，王城便作为天子召见诸侯、处

理政务的所在，而位于东边的成周城则作为军事重镇，迁入被征服的殷商大小贵族，并镇以成周八师，以防不虞。

王鲁湘：周灭了商以后，商有很多的遗民成了周的国民，但是这部分国民并不太服从周政权，被叫做顽民。这些顽民你又不能杀了他，得找个地方把他给安置了，据说就是安置在这个城里头。

徐金星：这个现在基本上没有啥疑问了。周公把殷顽民迁到洛邑，安排在成周，应该就是汉魏故城这儿，然后还给他们训话：你们的祖上怎么怎么不好，你们的国亡了，现在迁到洛阳来，你们要好好劳动、好好干活等等。这些不服周的殷商顽民，以前基本是王公贵族，从未参加过劳动，但是这些人也自有一番生存之道。他们在商立国之前，已经很会做生意了。后来国家亡了，他们还是喜欢做生意，后来这批人在全国各地做生意，有人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商人。

王鲁湘：对，我们现在常说商业、商人这些词，这个“商”本来是商民族、商国、商朝，结果变成现在组织货物流通、交易的专业术语了。

徐金星：因为周代就是两都制了，因而有这样的传说，当时这些人从洛阳到西安，从西安到洛阳，来往于东西做买卖，所以“买东西”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

周公营建洛邑大约五百年后，东周的周敬王在公元前516年将国都从原来的王城迁至成周，汉魏洛阳故城从此正式成为国家都城。上世纪初，在汉魏故城内城的北部，一个叫做金村的村庄附近，一大批精美至极的东周时期文物惊现于世，证明了这里曾是具有显赫地位的东周帝都。

王鲁湘：中国搞考古的、收藏的都知道大名鼎鼎的金村啊，这里出土的东西到现在为止都是极品。

徐金星：对。大墓的位置大概就在村的东部这一块。上世纪的1928年，这地方下大雨，有个地方被冲塌了。

王鲁湘：墓地陷下去了。

徐金星：是的，陷下去以后就发现古墓了。当时河南省会在开封，开封有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叫怀履光[43]，他得到消息就赶来了。到这以后

呢，他就组织当地村民大规模地盗墓，搭棚立灶，盗了好多年，一共盗了八座大墓。然后用马车装到洛阳东站，转运到上海，大部分文物都因此被盗往国外了，国内存的很少。

王鲁湘：国内很多著名的大博物馆里头都有金村的东西，还有一些东西出土地不太清楚，由于精美程度很高，就被疑是出自金村的。我看到有些刊物是这样说的。

徐金星：这个墓出土的文物非常非常精美，好多是过去没有见过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者对这个墓的时代无法确定。后来唐兰先生发表文章，认为是东周大墓，他的说法逐渐被大家认可。现在看来，这确实是东周大墓，因为洛阳在东周时做过国都，那时的几个王应该埋在这里。

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创建，直到隋炀帝另建隋唐洛阳城，经历了将近1500年的岁月风霜，它的几度兴废也见证了周秦汉魏的王朝更迭。作为古代“天下之中”，兵家必争之所，这座城市的形制和规模也随着统治者的改变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通过对现存汉魏故城的勘测，人们发现，除外郭墙建于北魏之外，内城墙和宫墙遗址的规模和形制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至少有三个规模不同、时代各异的古代城址叠压在一起，而且每一个时代较晚的城址，都是在沿用前代的基础上修缮或者增筑而成的。考古勘测表明，最早修建的西周夯土城墙位于现在内城的中心，南北长2.5公里，东西长3公里，基本呈方形。从勘测图上不难发现，这座方城是以后历朝历代扩建增筑的一个基础。

徐金星：西周方城向北扩展以后，便是当时的东周城了。

王鲁湘：就是由方一点的城变成一个长方一点的城了。

徐金星：对了，稍微长方一点。这是第一次扩建。然后到了秦始皇秦代的时候，吕不韦封在洛阳，他又向南面扩，这样又更长一点了，形成了南北九里、东西六里的“九六城”。历史上称它为“九六城”，这个基本上成定制了。

王鲁湘：如果我们从空中俯拍，而且每一个朝代建城的城郭都很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汉魏洛阳故城像一棵树一样，有一个生长

的年轮。这个年轮最里头的那个小圈，就是当时西周建的那个城，后面再一圈就是汉魏晋，最后到北魏，就是大的那一圈了。

徐金星：这个城啊，沿革时间之长和沿革之复杂都是非常罕见的，比起其他城来说，它在考古学上有很大的意义。

秦代，吕不韦将洛阳扩建为“九六城”之后，这座城市的规模基本形成。此后西汉、东汉、曹魏、西晋的洛阳城以及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基本都是在该城址的基础上修建沿用的，改变的只是城中建筑和宫殿的布局。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定都于长安。其实，根据史书记载，在国都的选定问题上，长安并不是汉高祖最初的选择。

徐金星：刘邦说，天下我走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就觉得洛阳这个地方好，所谓“吾行天下多也，唯见洛阳”。他本来就想把国都定在这的，后来有一个和张良齐名的著名谋士娄敬，建议把国都迁到关中去，不宜在这儿。

王鲁湘：据说娄敬给刘邦献三策，其中一策就是一定要定都到长安去。

徐金星：虽然他把国都迁走了，但洛阳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有人研究了，西汉当时洛阳的人口比长安多八万人。这是个了不得的数字，因为在古代，人口多就证明这里的经济文化发达。后来到了东汉，干脆就把这儿做国都了。

二、东汉洛阳城

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在“九六城”中大兴土木，起高庙，建社稷，修宫室。汉魏洛阳城迎来了它第一个辉煌的高峰。有记载说，城中各种殿堂楼阁遍布，宫殿之间有架空的飞阁相连，远在40多里外的偃师都能望见，足见这座东汉紫禁城的壮丽恢宏。

刑徒墓地

徐金星：刘秀定都洛阳之后，对洛阳进行建设，到他的儿子汉明帝的时候，国家比较安定，经济也比较繁荣了，就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建设。原来的洛阳城以南宫为主，即以南边为都城的重心。自汉明帝开始营建北宫，由此出现了南北两宫并重的局面。再后来，便以北宫为主，到北魏的时候，就只有北宫，南宫荒废了。中国都城的重心由南向北转移，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后隋唐的洛阳城，宋的洛阳城和元明清的洛阳城，都把都城的重心放在了北边。

王鲁湘：今天汉魏故城内城遗址的正南偏西方向，有一片高地，高地上有一条路沟穿过。让人惊骇的是，行经这条路沟的村民和路人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现人的遗骨残骸，当地老乡因而把这里称为“骷髅沟”。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此地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掘后得知，这大约5万平方米的区域，是埋葬了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从史料中我们知道，古代刑徒从事着修筑城池宫殿、建造陵墓、开渠挖河、修路架桥等等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牛马不如，很多人刑期未满就被折磨致死，而且往往是全国征发，数量巨大，动辄十万、数十万。所以，大批东汉刑徒的墓地，让人们立刻联想到了附近的洛阳城，他们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参与修建了当年那些恢宏的宫殿。



东汉刑徒墓地墓砖

1964年，刑徒墓地的一角被发掘开，在不到两千平米的范围内，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522座刑徒墓坑。根据专家对骨骸的观察分析，绝大多数属青壮年男性。全部刑徒的脊椎骨都有明显的劳损痕迹，部分还有骨折和残留的刀痕，可见当年的劳作是怎样的繁重和苛酷。值得安慰的是，人们还在部分墓坑中发现了刻有简明铭文的墓砖，上面有一些死亡刑徒的信息，算是给了这些死者一个交代。

张玉芳[44]：这个砖上写着“右部无任，乐安博昌”，“乐安博昌”是他家的地名。“永初元年五月二十五日，物故”，是说他的死亡日期，物故就是死的意思。

王鲁湘：反正就是累死的吧。

张玉芳：差不多。根据考古发掘推测，他们死后埋葬时，都是一排一排地被埋到坑里，连棺材都没有，就是一个小坑，正好把人装下去。

王鲁湘：然后这个砖就压在他的尸身上头？

张玉芳：一般都是在胸部或在侧面，等于是给死者留了一块石头作

纪念。

王鲁湘：可以说，汉魏故城主要的筑城劳动力，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刑徒。

张玉芳：对，就跟现在差不多，相当于给政府白干。

王鲁湘：从这些墓葬砖上可以看出，这里的死亡率很高啊。

张玉芳：这是一种见证：第一，汉魏故城是劳动人民修建的；第二，当时的工程非常艰苦，那么多人修了那么多年，不停地修，才成为现在留下来的东西。

王鲁湘：汉魏故城确实是一座最伟大的东方之城，可是实际上是建在很多刑徒的累累白骨之上的。所以有人说，古代充满了阶级斗争什么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张玉芳：对，这就是阶级压迫的见证。

当年发掘刑徒墓地时，正值“文革”前夕，于是这些累累白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控诉封建社会阶级剥削的典型罪证。此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和比对，人们逐渐了解到刑徒砖上铭文的含义。“左部”或“右部”是刑徒所属的管理机构，“无任”或“五任”是指刑徒是否掌握有技能，而其后的郡县名称则是刑徒来洛阳之前所属狱所的地名。此外，“髡钳”、“鬼薪”等4种名称均为刑徒所负的刑名，以髡钳最高，是五年刑。最后就是刑徒姓名和死亡日期。

东汉太学



熹平石经

刘秀在位期间，除了大规模营建洛阳的城池宫殿，还在城南的洛河北岸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太学和被称为“三雍”的三座皇家礼制建筑，其中太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久负盛名。

时至今日，虽然洛河早已改道，穿城而过淹没了部分遗址，但在汉魏洛阳故城之中，仍有一处名为太学的村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太学村附近曾出土了不少刻有经文的石碑残块，经确认，这些就是文献记载中著名的东汉“熹平石经”和曹魏“正始石经”，他们都曾立于太学之中，供天下学子观览临摹。

王鲁湘：徐老师，太学里还有外国留学生，是吧？

徐金星：有啊。太学规模大的时候，收的学生东越于海，西到流沙。新疆那时候叫西域，也有学生到这里来，还有高丽的。

王鲁湘：人最多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学生？

徐金星：书上记载说，最多的时候是三万余人。

王鲁湘：三万余人！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到一起也就是两万余人。

徐金星：东汉太学的学生，超过世界上很多名牌大学。

王鲁湘：那时候太学里头主要设置什么课程？

徐金星：主要的课程就是儒家经典，为政府培养儒家的治国人才。这有点像现在的社会科学院，全国文史方面的大家都集中在这，都在这学习或者在这当老师。像班固的父亲班彪就在这儿教书，培养了好多学生。

王鲁湘：蔡邕呢？

徐金星：蔡邕也跟太学有关系。当时各种经书的版本不一致，蔡邕他们几个人上书，把儒家的经本校勘、统一后就刻上石碑，立在太学的讲堂前。那个石碑就是蔡邕写的，蔡邕的书法相当好。

王鲁湘：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吧，是熹平年间搞的，相当于国家颁布的标准版本。当时天下仕子都到这里来抄。

徐金星：抄的人非常多。书上记载说，车马都把道路填塞了。有些人家专门为这些从外地来抄书、上学的学生提供食宿，有人说这就是最早的旅馆业。

王鲁湘：就是由于抄石经，在这个太学的周围产生了一批第三产业。

天文观测台



东汉灵台遗址

东汉时期，在太学的一旁，分列着被称为三雍的大型皇家礼制建筑。“三雍”包括明堂、辟雍和灵台，其中明堂是宗祀帝王的“天子之庙”，辟雍是皇帝“行礼乐、宣德化”的场所，即所谓的“天子之学”，而灵台则是占星云、卜吉凶的地方，也是古代的天文观测台。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都曾被安放在这个灵台之中。

王鲁湘：现在看来，灵台是貌不惊人的土堆子，可是它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徐金星：完全正确。

王鲁湘：据说张衡当年在这里主持工作？

徐金星：对。他曾经亲自组织、主持、参与灵台的工作，观测天象、日月星辰，进行天文研究。这个台子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原来它有两层平台，第一层平台跟地面差不多平，再上面还有第二层平台，它是四方形的，四个方面都有平台。西方面的平台有五间建筑，五间建筑后面，就是依托着灵台的夯土台，它向里面挖了一个密室。据记载，密室里面装的就是浑天仪。灵台顶上，是观测天象用的，“上平无

屋”，上面是平的，没有房子，人们在上面观测。在密室里边，人就看着浑天仪。

王鲁湘：浑天仪有天上的黄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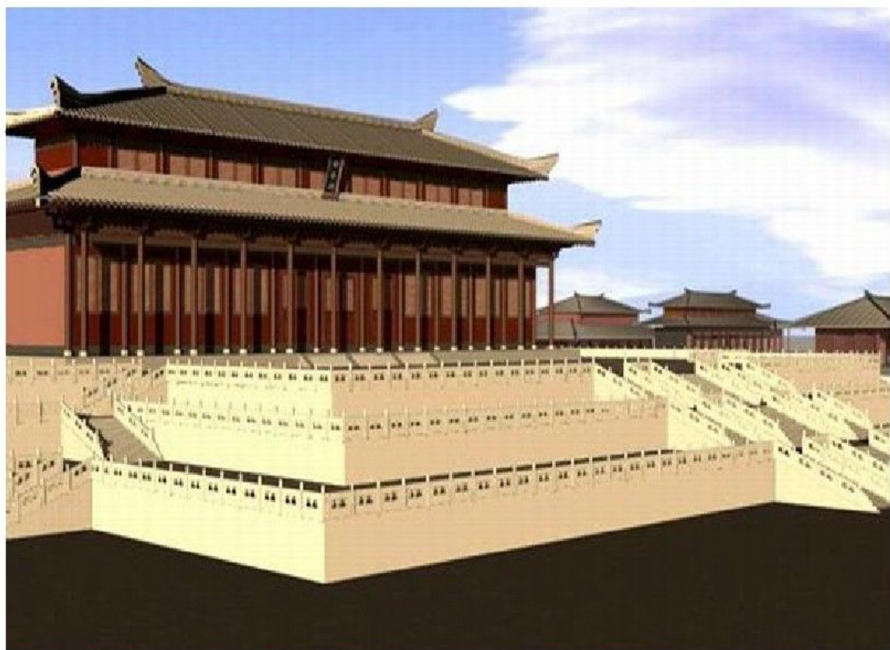
徐金星：平台上的人看天体运行，“昴星始现，昴星正中，星移斗转……”密室里就看浑天仪，刚好完全吻合。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几个人观测太阳，几个人观测月亮，几个人望天象，几个人观测星星，当然，有一个管理这一切的人，叫台丞。

王鲁湘：就是气象台长。

徐金星：对。这个灵台机构规模巨大，分工明确，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代表世界天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了。

东汉在洛阳城定都，总共经历了196年。与早年的辉煌相比，东汉后期皇室衰微，朝纲败坏，民怨四起。并州牧董卓此时趁机作乱，挟持汉献帝，自为相国，权倾朝野。他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还胡作非为，放纵西凉士兵冲入民宅，强掠财物，奸淫妇女。洛阳城中民不聊生。公元190年，各路军阀纷纷起兵，联合讨董。董卓于虎牢关大败，决定逃往长安。临行前，他下令将洛阳的宫殿、宗庙、官府、民宅尽皆焚毁，又让大将吕布掘开帝侯公卿的陵冢，盗取墓中珍宝。可怜昔日赫赫东汉帝都，顷刻间化为一片焦土。然而，汉魏洛阳城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一个董卓而结束，相反，一座更大更恢宏的洛阳城即将在这片废墟上巍然立起，继续书写它惊世的沧桑。

三、魏晋风骨



汉魏洛阳城复原图

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始建，历经多次修缮与扩张，在东汉迎来了它的第一次辉煌。东汉光武帝刘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关于他，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天，刘秀游猎晚归，夜入洛阳上东门，虽举起了火把亮明了身份，却仍被守门侯官郅恽以“夜晚看不清楚”为由拒之门外。光武帝无奈，不得不改由中东门进入。事后，刘秀非但没有惩罚郅恽，反而因为他忠于职守而重用之，相比之下，管理中东门的官吏却受到了处罚。从这件小事，足见刘秀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君王。在他的带动下，东汉的经济迅速恢复，民众安乐，史称“光武中兴”。作为这一盛世的国都，洛阳不仅经济繁荣，商业兴旺，而且文化昌盛、人才荟萃。公元67年，印度两位高僧以白马驮经来到这里，把佛教文化正式带入中土，其影响更是不可估量。总之，东汉洛阳城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一座东方大都会。

然而，“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东汉末年，汉室衰微，董卓一声令下，将帝都洛阳付之一炬。此后群雄并起，战火不断。公元220年，三国枭雄曹操在洛阳病故，结束了他长达20多年“挟天子以令诸

侯”的当政岁月。他的儿子曹丕继承魏王王位，继续把持朝政。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曹丕为完成父亲遗志，上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逼迫汉献帝让位，自称皇帝，建立了魏国。他依旧把国都定在洛阳，并开始在废墟上重建都城。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曹丕代汉45年后，同样的闹剧却反过来发生在了他的子孙身上，曹魏家业连同他们苦心修筑的洛阳城，尽皆改姓了司马。最终，西晋结束了这场乱世纷争，天下重新在洛阳城归于一统。

东汉末年，遭受了董卓之乱的大劫难后，都城洛阳已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开始重建洛阳的宫殿府第。由于当时尚处三国时期，魏忙于对吴、蜀作战，洛阳宫殿的建设也进行得较为缓慢。直到公元234年蜀国丞相诸葛亮去世，战事稍缓，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才开始大修洛阳宫。曹魏时期的洛阳城在规模上继续沿用秦汉“九六城”的形制，只是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在城市的西北角修建了一座城中之城，这便是著名的金墉城。（图6，）


北
土
堤
古城墙
甲城
古河道
T1
T5
古河道
T2
古河道
乙城
T3
T4
古城墙
翟泉村寨墙
T7
古城墙
丙城
古城墙
T6
汉晋洛阳城
0
100米

金墉城平面示意图

王鲁湘：徐先生，这条路应该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农村土路吧。

徐金星：对，这是金墉城的西城墙，高的那个地方是金墉城的西北角。它宽250米，南北长1000米多一点。

王鲁湘：一公里左右，那也不小了。

徐金星：在它的中间从北向南依次分成了三个城，甲城、乙城、丙城，北边的甲城位置最高，城墙最为坚固，当时在军事防御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王鲁湘：它正好是依据这个地形而建啊，你看这个地势是一个台地。

徐金星：这个城的位置高亢而险要，城墙固若金汤。而且这个城墙很有意思，它每隔那么一段，就会有突出的一部分。

王鲁湘：马面？就是防御工事吧。

徐金星：是的。当地老百姓叫炮台，啥意思呢，打仗的时候，下面的敌人要是攻城，上面的人可以从旁边来射箭。

王鲁湘：从几个角度来防御，就增加了防御面。

魏明帝修建金墉城，是效仿他的祖父曹操在邺城西北角修建铜雀三台的做法，主要就是出于屏障宫城、避险防乱等军事考虑。但是，在它建成后的日子里，这些功能并没有得到发挥，高大坚固的城墙，反而让它成为了一座颇为特殊的监狱。

徐金星：因为洛阳城里残酷的政治斗争，甚至改朝换代等，有些皇帝被罢免了，有些皇后被废了，而废后、废主有时候就被幽禁到金墉城里。

王鲁湘：哦，就是离宫别馆。

徐金星：有这么个意思。西晋代替曹魏后，就把那些失败的曹魏皇室、宫人都幽禁在这里。西晋一朝，它的“八王之乱”，也是乱得不可开交。在此期间，失势的皇后、皇帝，也会被囚禁在这儿。像著名的贾南风[45]，也曾被囚禁在这里。

公元249年，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后来司马师废魏主曹芳，迁于金墉城。司马炎重演“曹丕代汉”的旧事，逼魏帝曹奂“禅位”，也将其幽居于金墉城。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战乱，实现一统。

魏晋时期，虽然全国局势动荡，但国都洛阳并未遭战乱破坏，出现了一个近100年相对安定的繁荣期。经济复苏，文化也随之兴盛，“三曹”、“建安七子”[46]、“竹林七贤”[47]和“金谷二十四友”[48]等都是驰名一时的文人，他们的名篇名作，结合前朝东汉的众多文学成就，留下了“汉魏文章半洛阳”的美谈。



《建安七子》画

徐金星：有句话叫“汉魏文章半洛阳”，汉魏时期的天下文章，有一半都在洛阳。

王鲁湘：而且这个地方的文人一出现，都是一窝一窝的，像蘑菇一样，一般是一个集团或是一个家族，比如曹氏父子三人，围绕在他们父子周边，有一个“建安七子”，这就是一个文人集团。然后“竹林七贤”又是一个文人集团，“金谷二十四友”，又是更大的文人集团。另外还有左思兄妹。

徐金星：左思是当时的一个著名文人，他老家本来是山东的，后来他妹妹被晋武帝招到宫中做了妃子，全家就跟着来了。左思到洛阳一

看，觉得洛阳城实在是了不起。

王鲁湘：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乡里人进城一般。

徐金星：他本来就很勤奋，也很有才华。到洛阳以后，他又接触了好多文人，增长了很多见闻，看到了很多书籍，所以他用了十年功夫来写《三都赋》49，因为当时刚刚统一。

王鲁湘：三都就是他路上看过的三个都城。

徐金星：他的《三都赋》写成之后，洛阳富豪之家竞相传抄，留下了“洛阳纸贵”的美谈。

在完成统一大业后，晋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政策，让百姓逐步摆脱了多年的战乱之苦，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史称“太康之治”。当时的国都洛阳，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安居乐业，有“天下无穷人”的说法。

徐金星：西晋统一三国以后，在一段时间内国家比战乱时期富裕。尤其在晋武帝的时候，有一个短暂的繁荣期。这时的富豪非常多，竞相穷奢极欲，特别著名的就是王恺、石崇斗富。王恺是晋武帝的舅舅，晋武帝在背后支持他去和石崇斗富。比如有一次，王恺拿出一株珊瑚树来向石崇炫耀。石崇一见，就拿出铁如意把它打碎了。王恺很愤怒，说我这么一个宝贝你竟然打碎了。石崇说你这珊瑚树没啥了不起，于是给王恺拿出了三四棵，比他的还高大，让他随便挑。

王鲁湘：可见石崇金谷园里头藏的珍宝已经赛过了皇宫，因为晋武帝司马炎偷偷从宫里拿东西交给王恺，让王恺拿着去和石崇斗富。最后王恺还是败在石崇手里了。

徐金星：他实在是太富裕了。

石崇斗富的故事在今天可以被当成一场笑谈，但在当时，就连皇帝本人都参与到这种攀比斗富之中，可见西晋的王公贵族们，生活是何等的骄奢淫逸。可能是天不怜见，就在司马氏的皇位还没有坐热的时候，一段中原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岁月正悄悄来临。

司马炎统治后期，生活极度奢靡腐败，后宫嫔妃竟多达万人。公元290年，他在洛阳驾崩，白痴太子司马衷继承皇位，凶悍妒妇贾南风贾

皇后把持朝政，导致皇族为争王位骨肉相残，同室操戈。这一阶段被称为“八王之乱”[50]，司马氏的统治由此走向衰落。不久，西晋便告灭亡，古都洛阳再次毁于战火。此后，在长达12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成为了北方少数民族逐鹿的战场，直到鲜卑族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权，洛阳城一直是纷纷扰扰，没有宁日。

四、北魏洛阳城

北魏王朝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政权。公元439年，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国都最初定于平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崇信佛教的他们在这里开凿了大气磅礴的云冈石窟，却无法阻挡北方柔然人的经常南侵。当时，幼年登基的孝文帝拓跋宏看到国都不断受到威胁，危如累卵，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国都迁往黄河南岸的洛阳。

公元493年，他亲率大军和文武百官以进军南下，统一南北为名，迁都洛阳。这一举动，让这座饱受磨难的千年古都再次繁盛起来，并且其辉煌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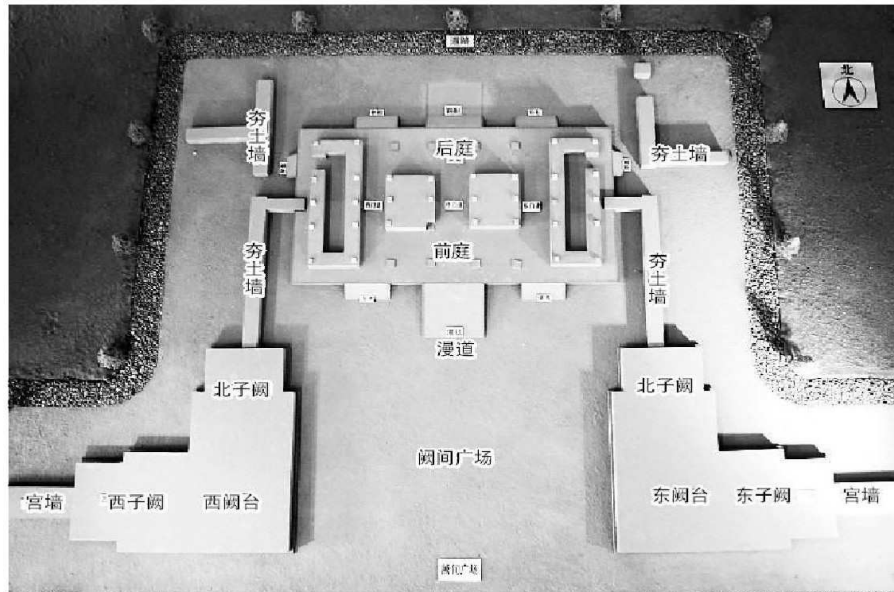
北魏是在汉魏洛阳故城建都的最后一个王朝，因而现存故城遗址的规模布局也基本为北魏所留。通过考古发掘，人们惊讶地发现，北魏洛阳城的形制较先前发生了重大改变，一座令人难以置信的城池显现了出来。

徐金星：北魏人把原来汉魏晋的洛阳城放在中间，在四周又筑了一个大城。这个大城了不得，综合书上记载和我们考古发掘的情况，这个城东西十公里，南北十公里，总面积将近100平方公里，可以说是近代之前世界范围内最大的都城。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始重建洛阳的城池宫殿。为了树立他正统王朝继承者的地位，取得中原汉族的支持，北魏的宫殿、宫城的规模与形制，基本沿用魏晋旧制。宫城正门称为阊阖门，宫中正殿称为太极殿，均是曹魏时期的旧称。

公元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汉魏故城宫城的南端发现了一座保存尚好的大型城门遗址。当地的村民曾把这里称为“午门台”，它的北面正对着宫中正殿太极殿遗址，而南面则是已探明的御道“铜驼街”。各种证据都表明，这里就是当时北魏王朝的宫城正门阊阖门。

阊阖门原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天门”，古人用这个名字来象征帝王的威仪。从文献记载中得知，北魏阊阖门城楼高大，门外巨阙双立，巍峨壮观，是帝王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



北魏洛阳城门复原图

王鲁湘：看这城门很雄伟啊。有东阙台、西阙台、阙间广场。

徐金星：阙边上有城墙连着门，门有三道。这上面有个很雄伟壮观的殿堂式城门楼子。

王鲁湘：这其实就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午门，午门也包括一个这样的广场，而且也是举行非常重要的国家大典的场所。皇帝登基，接见四方朝贡，都在那个地方。它主要不是用于防御，它的礼仪性要大于防御性。这个城阙给人一种很威严的感觉，进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假如没有这两个阙形成的阙间广场的这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帝王的威严就体现不出来。而人一进到这里，突然一夹一抱，三面全是高大的建筑，帝王的威严就体现出来了。

徐金星：高大的殿堂式建筑，巍峨的双阙，加上一个相对封闭的广场，那是非常威严的，所以它这个设计，就是为了显示帝王或者皇家的威严。

王鲁湘：这是礼仪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意义。

在阊阖门以北的宫殿遗址群内，考古发现的夯土台基多达二三十处。其中有一处台基，规模巨大，比附近地面高起约2米，而其位置就在阊阖门的正北。当地村民称这里为“朝王殿”，也就是传说中的“金銮

殿”。经确认，这里就是当年北魏宫城中最为雄壮华丽的太极殿。

王鲁湘：太极殿的遗址，就剩下这点土堆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泱泱帝国的中心啊。

徐金星：对。

王鲁湘：洛阳居天下之中，太极殿又居洛阳之中。

从太极殿向南望去，正是阊阖门遗址，而阊阖门再向南，则是当年城中的御道铜驼街。

这三处遗址由北向南串列在同一条直线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当年设计建造这座城市的人们，一定已经有了城市中轴线的概念。

王鲁湘：我一直在琢磨，这么大的一个都城在规划的时候，它一定有一条子午线。子午线要取南北两个坐标，然后把这条子午线联系起来，整个都城才能由此展开它的布局。所以我在想，这个子午线的北端应该是黄河的孟津渡口，南边应该对着一个山，是嵩山吗？

徐金星：应该是嵩山的余脉。嵩山在洛阳稍微偏东南的方向，它有座余脉叫万安山。这个山正好有个很大的缺口叫大谷关，是洛阳八关正南边的关，它正对着那个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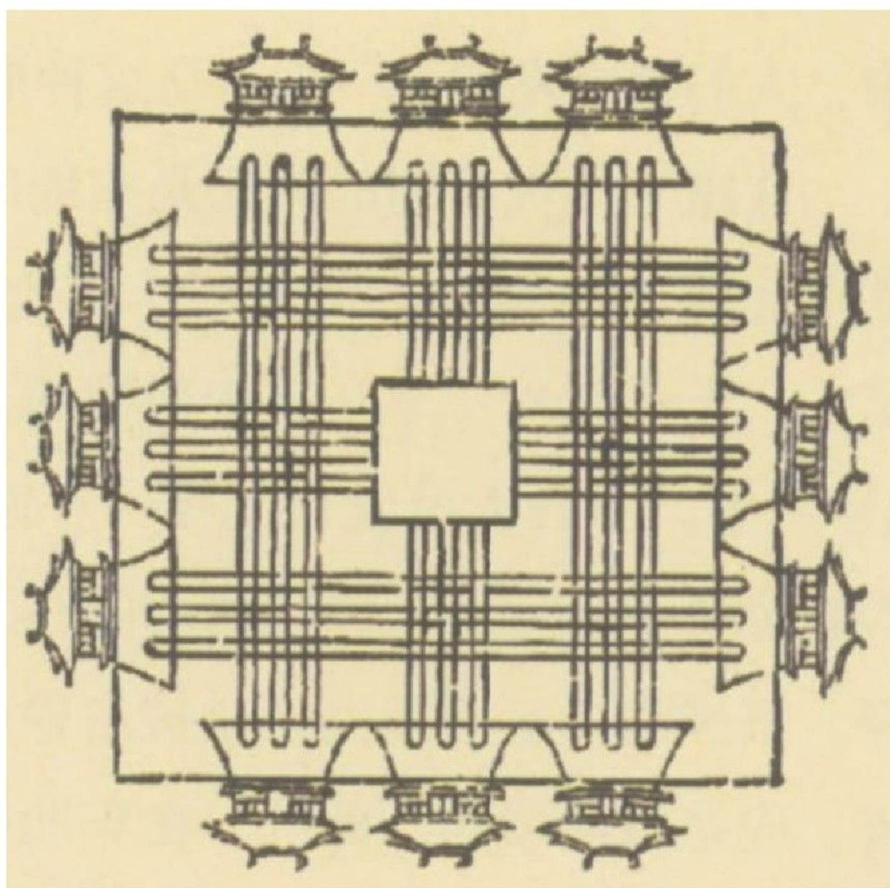
王鲁湘：它是以万安山大谷关的关口作为南边的坐标点，然后过邙山取一个黄河的坐标点，就成了这条子午线。

徐金星：一个城市形成中轴线，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是从汉魏故城开始的。你看西汉的长安城就没有中轴线。

王鲁湘：对，它的宫城偏西北角。

徐金星：从汉魏故城开始就逐渐地形成了中轴线：从宫城太极殿，向南穿过宫城的正门阊阖门，再向南走，穿过内城的正南门、宣阳门，这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中轴线。这应当是非常宏伟的，而且中轴线形成之后，隋唐的长安城、洛阳城，北宋的东京城，元明清的北京城就是这条中轴线的延伸。由此可见，北魏洛阳城在中国都城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

王鲁湘：中轴线布局使都城有了一个对称、平衡且符合等级秩序的平面结构。因为有了中轴线，我们才能有尊卑之序，才能安排左和右的区别，才能实现《周礼·考工记》里头所设想的营建都城的理念。



《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王城规划平面图

徐金星：有了中轴线之后，皇宫就要建在中轴线上，所谓建中立极，突出皇宫的权威。

王鲁湘：最主要的那些标志性建筑也都应该建在这条中轴线上。

徐金星：洛阳城的中轴线从皇宫向南走，它的两边就是衙署，然后是居民从两边慢慢地散布开来。它之所以规划成这样子，无疑是受了等级观念和礼仪观念的影响。

五、洛阳伽蓝

北魏建国初年，统治十分严酷，至孝文帝时，王朝的内部矛盾以及与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缓解矛盾，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际，大力推行其汉化政策，同时又大力提倡佛教，将其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让民众澄心净虑，礼佛修行。完成迁都之后，他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龙门开窟造像，使这里成为“敷导民俗”、“助王政之禁律”的佛教圣地，也使佛教在北魏的洛阳达到了空前的昌盛。

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雕凿开始于北魏，直至北宋，前后共经历了400多年。虽然最大最著名的奉先寺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但是要论开凿时间最早、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当属北魏时期的古阳洞。



古阳洞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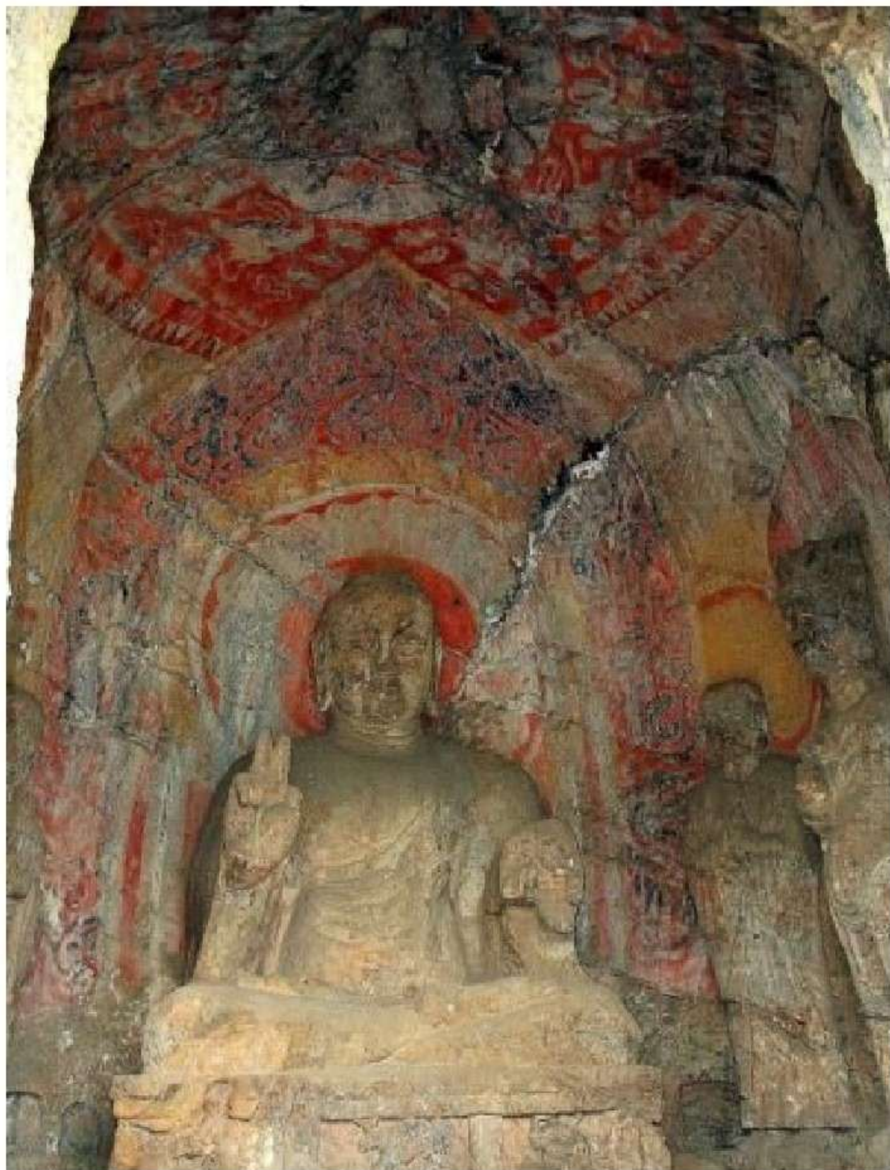
王振国[51]：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洞窟就是古阳洞，它是利用一座天然溶洞开凿的。

王鲁湘：过去是个天然溶洞？

王振国：这个山体主要是石灰岩。石灰岩溶于水，所以形成了天然溶洞，而石窟就是在此基础上扩大而成的。正中的主尊就是释迦牟尼，我们看释迦牟尼的面像非常瘦，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有道教徒在这活动，道教徒把这个洞占了以后，开始叫它古阳洞，并把释迦牟尼按照太上老君像的形态改塑了。古阳洞那几个字是清代的人刻的。

王鲁湘：这是北魏的精华洞窟啊，你看这些浮雕也很有意思。这种飞天浮雕，像剪纸一样，简直能飞起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龙门石窟遭到了严重的劫掠。特别是古阳洞，洞内几乎所有的龛像都被破坏，大量的佛头、佛身甚至是整块的佛龛都被盗卖到了国外，这给后世研究北魏石窟佛像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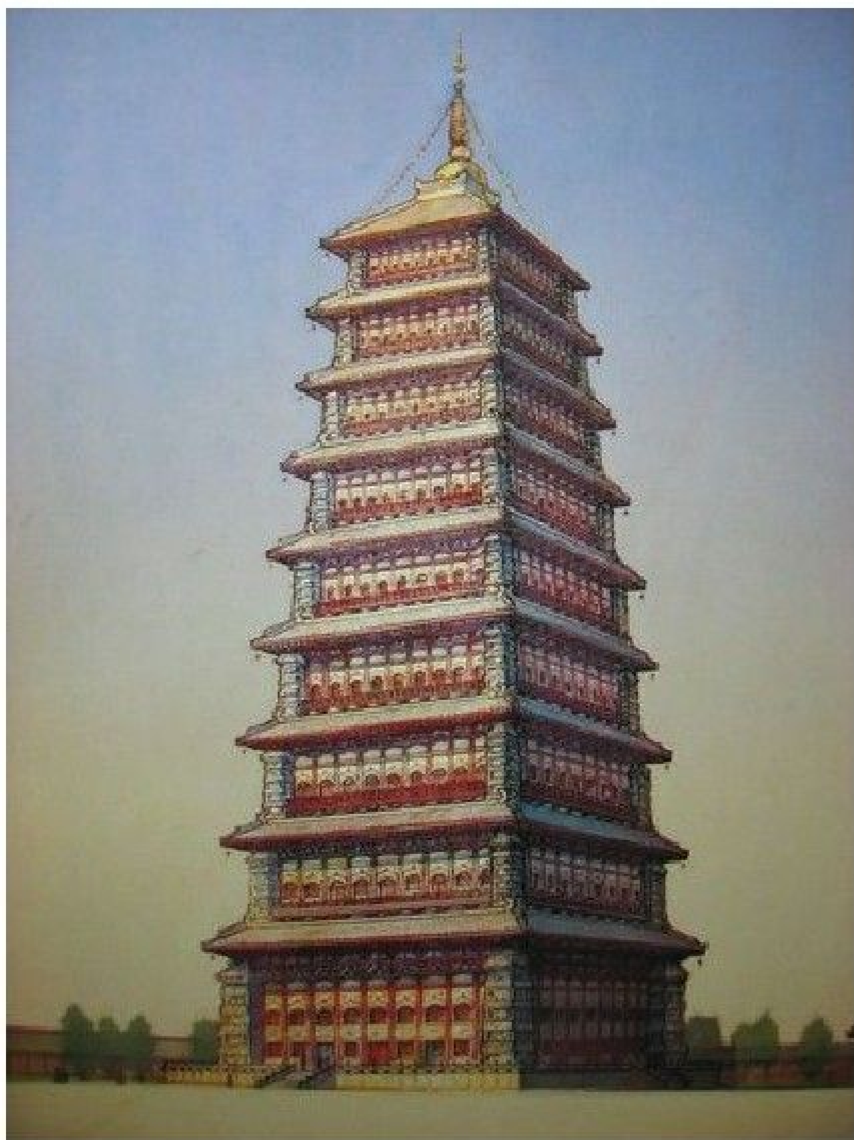
宾阳中洞内景

幸运的是，另一座北魏年间开凿的石窟——宾阳中洞却逃过了这次劫难。这里佛像的容貌、衣着，带有明显的中原特征，可见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实行了彻底的汉化政策，连神明的容貌都皈依了中原。

王鲁湘：宾阳洞包括南洞、中洞和北洞，它里面的佛像与大同云冈石窟的佛像相比，有很大的区别？

王振国：有很大的区别。像这个主像释迦牟尼佛，他的服饰就具有南朝特色，褒衣博带，脸形秀骨清像，和云冈石窟已经不一样了。

王鲁湘：这个菩萨，我们从侧面看，鼻子和眉毛这些地方还有点云冈石窟的感觉，鼻梁很高、很直，但是主佛的鼻子已经很像中原人了。



永宁寺塔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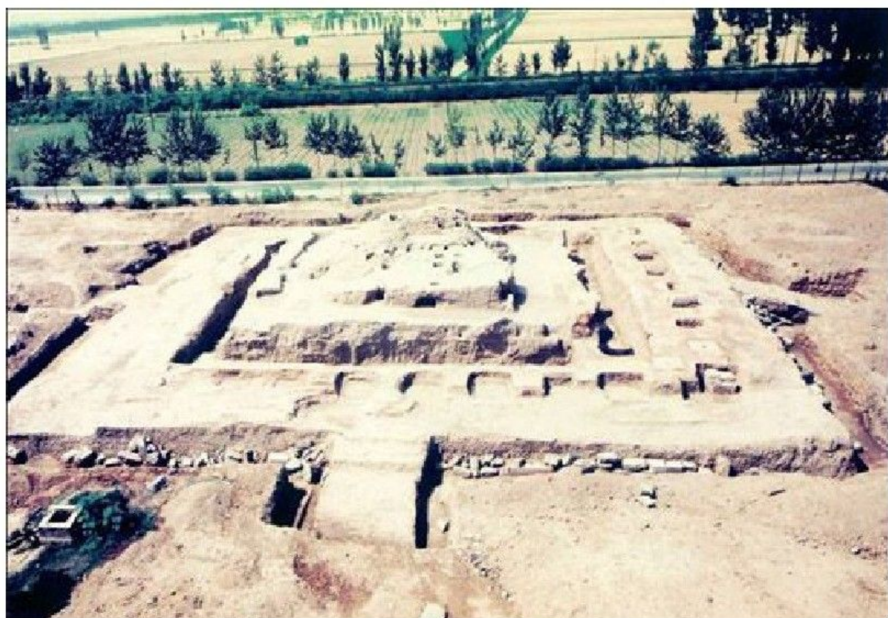
作为北魏皇族崇信的国教，佛教不仅在龙门创建了一片圣地，国都洛阳，更是成为了佛的天堂。当时洛阳城中的寺庙达到了惊人的1300多

座，城中宝塔林立，到处晨钟暮鼓，而在这些佛塔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高达130多米的永宁寺塔。

徐金星：北魏是少数民族，到洛阳之后，他们实行彻底的汉化改革。王公贵族都崇拜佛教，在这种气氛下，它就修了一个非常宏伟壮观的寺院——永宁寺。这个寺院中间是一个塔，四方形，九层，高136.71米，相当于45层楼房，真是空前绝后。

王鲁湘：加上它是木结构的，所以就更了不起了。

当年这座惊世骇俗的摩天宝塔，矗立在北魏巨大的洛阳城中，无疑成为了洛阳城甚至是北魏的象征。然而这个登峰造极的奇迹，命运却犹如天外流星，在闪过一道眩目的光芒之后，便永不再现，空留下一片废址残基，让后人去捡拾当年的传奇。



永宁寺塔遗址

王鲁湘：这个方土台应该就是永宁寺塔的塔基吧。它的高度离地表有多高？十米左右有吗？

徐金星：第一层是两米二，第三层应该有十米左右吧。

王鲁湘：当年是130多米高，应该能高入云表了。

徐金星：而且它四周还有铁锁链垂下来，四角都垂着铃铛。据记载，那个大的铃铛像一个石瓮子，非常大。

王鲁湘：风一吹，声音可以传到几十里之外。

徐金星：夜深人静的时候叮当叮当地响，确实有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

王鲁湘：从建造到完成，好像是花了三年时间，然后只存在了15年时间。

徐金星：十五六年吧。

王鲁湘：然后一场雷击，就毁灭了。中国古代很多的木结构建筑，其实都毁于雷击。

徐金星：是的。它是在某年的二月毁掉的。二月打雷本来是不多的，但是那一年二月偏偏打雷，还下着雨，下着雪。《洛阳伽蓝记》对这次大火烧塔记载得非常详细，而且非常震动人心。书上说当时从第八层燃起，很快形成漫天大火，皇帝派来一千名羽林军来解救，却无济于事。

王鲁湘：当时的消防条件不可能救得了这么高的楼的火。

徐金星：“合城百姓，咸来观火”，整个洛阳城的百姓都来围观。有三个老和尚当场投火而死，悲哭之声，震动洛阳。在当时来说，它就是洛阳城的标志，它被大火焚烧了，从皇家到百姓，都会感到是一种巨大事变的预兆。

王鲁湘：是一个心理暗示。

徐金星：当时的国人认为，这个塔被烧毁以后，北魏就要亡了。确实，过了不久，北魏就亡了。然后又过了好长时间，人们说在东海中间看到了这个塔。

徐金星：北魏这个民族在汉魏故城42年。它到洛阳之后就彻底汉化了。其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还保留自己的文化，还要跟汉族有些区隔，他是彻底汉化，说汉话，改成汉姓，穿汉族的衣服，和汉族妇女通婚。

王鲁湘：最有意思的是所有的贵族都改籍，改成洛阳籍。

徐金星：对，改成洛阳籍，死了必须埋在洛阳，埋在邙山上，不许迁回老家去。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追溯自家历史的时候，说是黄帝之后。黄帝的一个儿子分到北边去了，姓拓跋，拓跋就是土，土就是黄色，我们本来就是中原的，所以要彻底汉化。中华民族以汉民族为主，这与洛阳的中心地位和民族大融合是有密切关系的。

王鲁湘：我们今天从一个汉魏故城引申出这么多历史文化的话题，所以还是回到司马光的那两句诗："若问天下兴亡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骊宫长恨歌

“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位于骊山北麓的华清宫，由于有着天然的温泉，自古就是君王眷顾的福地，让无数帝王不惜工本在此修建离宫，颐养性情。然而，这里也一向被正直的史家贬为不安分的地方。为博褒姒一笑，周幽王不惜在此烽火戏诸侯，葬送了有着四百多年国祚的西周。而唐玄宗李隆基如果不是在这里爱上了自己的儿媳杨玉环，或许也不至于断送了盛世大唐。不同的潇洒帝王、不一样的如花美眷，却都躲不过相同命运的纠缠。于是，有了白居易那首荡回肠气的《长恨歌》，也有了洪升那部千回百转的《长生殿》。而故事里那位艳若桃花的女主人公，也终究逃不过红颜祸水的历史轮回。

一、发现华清宫

今天的华清宫，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佳人不在，但每年仍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来此“爱情朝圣”。人们品评着这个被无数帝王千百次宠幸的离宫别苑，缅怀着那位绝色的“祸国”女人，也慨叹着帝王家上演的那一段凄美而又无奈的千古传奇。

王鲁湘：当年您带队对华清池进行发掘是哪一年？

骆希哲[52]：1982年。当时有一个新建的旅游项目，要在华清池温泉水源的前面修一座贵妃亭。处理亭子地基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遗址，然后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认为这可能是唐代的华清池。



华清宫长生殿

王鲁湘：其实文献记载也好，白居易的诗也好，民间的传说也好，都认为这个地方是唐玄宗和杨贵妃“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所在地，但是，宫殿的具体遗址一直也没有发现。

骆希哲：是的，遗址都掩埋在地下。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曾经在

骊山做过一些考古调查，但有计划地发掘是从1982年开始的。



华清池温泉取水器复原图

1982年4月，以骆希哲为首的考古队在一次偶然的挖掘中意外挖出了一些类似古代建筑的残垣断壁和水垢斑驳的墨玉石板。从清理出来的结构看，像是古人洗澡专用的池子。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考古挖掘开始

了。当大量的方砖、排水管道和莲花瓦当陆续出土，庞大的建筑群全貌逐渐显山露水之后，专家肯定地指出，这里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的上演之地：唐代华清宫遗址。

骆希哲：这次发掘历时十多年，成果比较显著。我们在清理温泉水源时，发现了大量仰韶时代的陶片。有当时的取水器破了以后留下的残片；有小的像骨针一样的骨笄，是先民们束发髻用的佩饰；还有陶环，也是一种装饰物；还有一种陶锉，搓皮肤用的。

王鲁湘：搓澡用的。这种东西在别的地方也发现过，但年代没这么早，这是用陶做的。

骆希哲：还有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还发现了大型的陶管道，管道两头伸出来的部分是用来分水的。

王鲁湘：就像我们现在的三接头。

骆希哲：对，起三接头的功能，由主管道向两边分水。

王鲁湘：陶管道断代大概到什么时候？

骆希哲：断代到周。再往前，七十年代考古学界在距离华清宫以北一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姜寨遗址。

王鲁湘：姜寨遗址是仰韶文化时代的聚落遗址，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半坡遗址，这说明骊山一带在五六千年以前就是人类聚居的一个中心区。

骆希哲：对，而且六千多年前的姜寨先民就是在这里洗温泉沐浴的，所以中国的沐浴史也可以提前到六千多年前。

继仰韶文化层之后，考古人员又相继在此发现了商周文化层和秦汉文化层。出土的大量文物记述了历代帝王对骊山温泉的眷顾：周幽王于此设立离宫，建烽火台；秦始皇在此“砌石起宇”，修建汤池；西汉、北魏、北周、隋朝的帝王都曾在此留下各自的痕迹；而盛唐遗址的发现，是华清宫最繁盛时期的见证。

骆希哲：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断定，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发生在骊山顶上。秦始皇在这里砌石洗浴，名“骊山汤”。我们在这儿发现了秦汉时

期的木门，经过脱水处理，保存得很好，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好的木门。但后来考虑到要把唐华清宫的遗址展现出来，所以对以前的遗址进行了回填保护。

王鲁湘：等于秦在唐的下面，唐叠压着它。我们重点要展现唐的，所以把它们叠压在下面了。

骆希哲：对，因为唐代遗址保存的比较完整，可视性也比较强。秦汉到唐还有一千多年时间，这一千多年里也有建筑遗存，比如北魏时期，相当于现在陕西省省长的邕州刺史元苌就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温泉颂》，碑石就保存在华清池，是我们国家130块禁拓名碑之一，文学性和艺术性都非常高。隋代也在这里修过骊宫，但是最有名、规模最大的还是唐代的华清宫。

王鲁湘：实际上，骊山是一个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活动非常频繁的地区，而且几千年没有间断过。

骆希哲：骊山是一个浓缩了中华民族六千年文明史的地方。

二、唐太宗《温泉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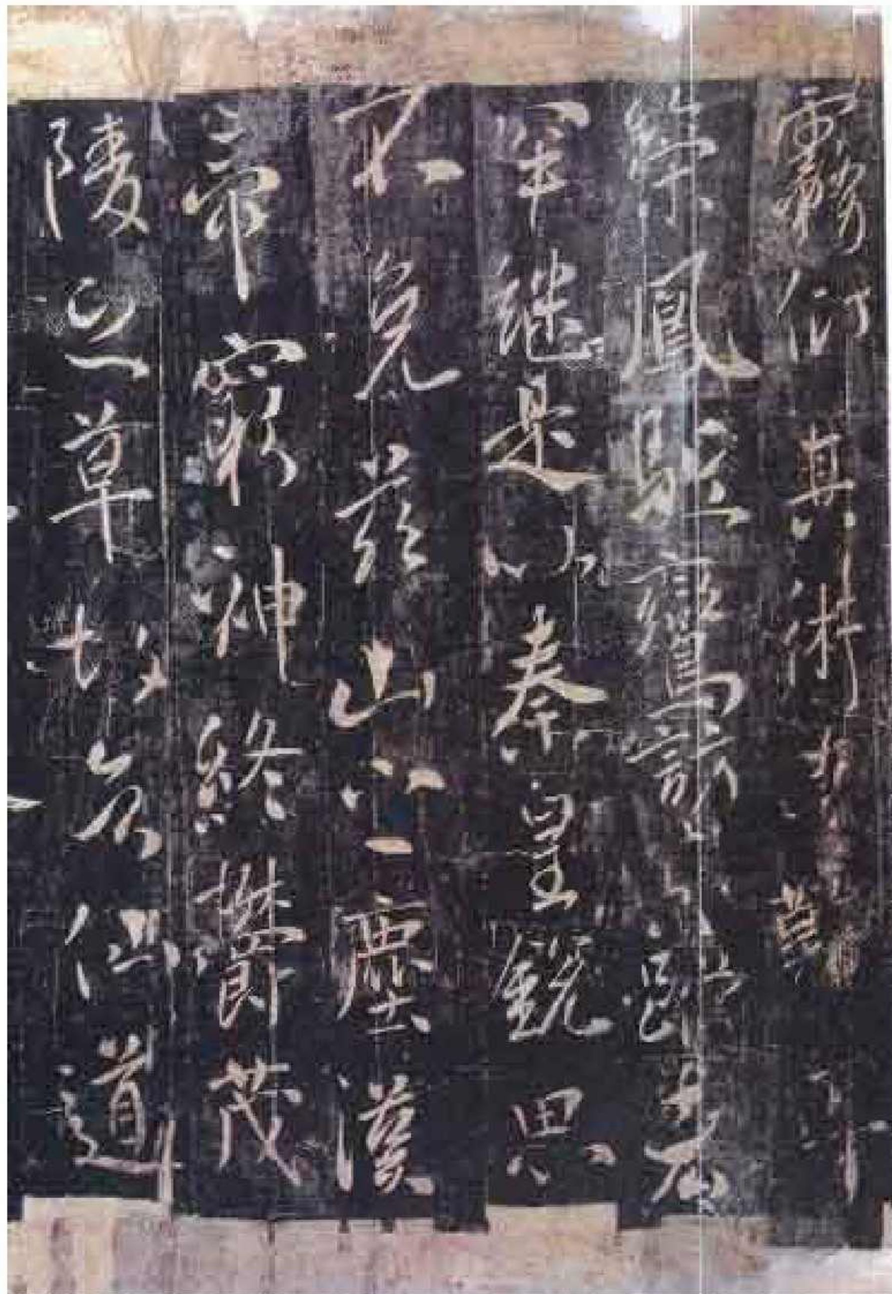
唐华清宫是骊山温泉史上最辉煌、最骄傲的杰作。其规模气势恢宏，内部结构独具匠心。从1982年到1995年，考古队员先后在这里发现了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等九个汤池。这些汤池共同拥有同一个水源，温泉从源头流出，首先流入唐太宗的星辰汤，继而向南流入玄宗的莲花汤，在莲花汤的紧西北毗邻而设的便是著名的贵妃池海棠汤。接着由东向西依次为太子汤，供六部官员沐浴的尚食汤，以及为梨园弟子沐浴而建的宜春汤。众多汤池各具特色，典雅脱俗。

王鲁湘：唐太宗星辰汤的平面形状有点像北斗七星，一边是圆形的，如勺状，然后再拐为直的，相当于斗柄。

骆希哲：他把这个汤池命名为星辰汤，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希望政通人和，上应天象。但这个池子到唐玄宗时就废弃了。它的面积很大，长有36米，蓄满水相当于一个小型水库。所以这里的水就通过排水道向北一直通到昭应县城，供城里的百官使用，取意皇恩浩荡。

王鲁湘：“皇恩雨露深”嘛，人人都可以均沾一点。

华清宫的温泉令太宗心旷神怡。开心之余，他模仿王羲之的笔法，在御碑亭挥笔写下了著名的《温泉铭》：“朕以忧劳积虑，风疾屡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原来李世民多年的风湿病，正是在骊山泡温泉治愈的，所以他以帝王之尊颂扬骊山温泉，而《温泉铭》也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以行书入碑的先河。



唐太宗《温泉铭》

骆希哲：唐太宗因为常年征战，可能染上了所谓的风湿病或关节炎一类的疾病。他为了治病，就利用温泉来沐浴，相当于现在的理疗。现在临潼温泉周围还有很多疗养院，就是仿效先民的行为。唐太宗在这里沐浴的时候，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铭文，叫《温泉铭》。

王鲁湘：据说现在的铭文是从法国引进回来的。

骆希哲：原碑不知什么原因找不到了。后来有人在法国博物馆里看到拓片，是伯希和[53]从敦煌带过去的。我们把这个拓片复印回来，刻了一个复制碑，保存在华清池，从这块碑上仍然可以看到王羲之草书的遗风。

王鲁湘：据说他还把《兰亭序》拿去陪葬，就在昭陵里头。《温泉铭》里有几个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首先，他身为皇帝，到这个地方来游冶，洗温泉的时候，也担心臣下和老百姓会对他有所议论，觉得这种生活好像有一点腐败的意思，所以他要为洗温泉做一个辩解或合理性的说明。他先是回顾了秦皇汉武为求长生而寻仙，浩浩荡荡东游至海，甚至到了蓬莱等地，结果劳民伤财，并没找到神仙，到头来还是离不开一个坟土堆。他认为这样很不好，还不如洗洗温泉，颐养一下性情。接着，他告诉臣下和老百姓，我之所以洗温泉是因为我身染风疾，这里的温泉治疗风疾的效果非常好。

骆希哲：他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我只要一洗，马上症状减轻。

王鲁湘：再者，他还认为温泉能启迪人们去思考宇宙、人生、历史等哲学问题。他特别惊讶于温泉的水居然无论寒暑都是恒温的，而人的品质也应当像温泉一样，无论世事多么炎凉都应坚贞不变。同时，温泉的流量不古不今，不增不减，这也让人想到很多问题。

骆希哲：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他不知道温泉是怎么形成的，不能从科学上来解释。他认为温泉是上苍的赐予，是为了让人来疗疾治病的。

温泉何以有如此疗效？自古以来，众说不一。有人说这是因为温泉是神水，有人说这是由于温泉的热力。不管是何原因，但无可争议的是，对温泉的钟爱，已经成了这里贵族和百姓千百年来不变的习俗。天长地久，就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沐浴文化。

骆希哲：中国的沐浴文化由来以久。从《周礼》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古时候的人非常重视沐浴，他们把沐浴制度化，三天一沐，五天一浴，“沐”是洗头，“浴”是洗身子。

王鲁湘：还有濯足，即洗足。

骆希哲：现在的足疗其实那时候已经有了。古人认为洗浴对人有强身健体的作用。

王鲁湘：还有一种宗教意义在里头。

骆希哲：对，古代的沐浴也是一种“礼”。比如敬神要沐浴，上朝要沐浴，拜祖要沐浴，结婚也要沐浴。凡是庄重、严肃的场合都必须沐浴，这就是中国的沐浴文化。

王鲁湘：而且温泉很早就被中国人赋予了神泉、灵泉的意义。温泉的水里含有硫的成分，这是不是和魏晋南北朝那些士大夫们服用的“五石散”差不多？我在黄山读过贾岛等人留下的温泉诗，当时的知识分子确实认为温泉具有“五石散”[54]的功用。

维泉肇何代，开凿同二仪。五行分水火，厥用谁一之。

在卦既得济，备象坎与离。下有风轮煽，上有雷车驰。

瞎掀祝融井，口灿扶桑池。气殊岩石历，脉有灵砂兹。

骊山岂不好，玉环流污脂。至今华清树，空遗后人悲。

暇哉哲人逝，次水真吾师。一濯三沐发，六凿还希夷。

伐毛返骨髓，发白令人黟。十年走尘土，负我汗漫期。

再来池上游，触热三伏时。古寺僧寂寞，但余壁上诗。

不见题诗人，令我长叹咨。

——贾岛《记黄山温泉》

骆希哲：南北朝崇尚炼丹，认为服了丹之后可以长生不老。从宗教仪式来讲，修道之人必须每日沐浴，才能有一个洁净的身体。所以沐浴不仅是日常生活的需要，和宗教也有密切联系。

王鲁湘：还有就是，他们会思考温泉水为什么是热的？有些地方的温泉比骊山热得多，像汤一样。于是他们觉得整个大自然就是一个大的

鼎炉，这个鼎炉在炼丹的过程中产生了温泉这种丹水，人泡在温泉里就有点服丹的感觉。不管古人如何看，洗温泉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是没有疑问的。

骆希哲：有一个故事说，秦始皇有一次在沐浴的时候，看见一个神女长得很漂亮，就加以轻侮。神女见他这样无理，朝他脸上吐了一下。秦始皇立刻脸上生疮，痛苦不已，跪地向神女求饶。神女念他是一国之君，跟他说你到温泉里洗一下就好了，以后不要再为非作歹了……当然这故事有点荒诞，可能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把知识分子得罪了，人们就编排故事挖苦他。但这个故事也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温泉对皮肤病是有治疗作用的。因此，古人有三月三日洗桃花水的习俗。一直到八十年代，每年三月三的时候，临潼周围一百多里的老百姓还在这里洗桃花水。

三、骊宫长恨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甫的诗所描写的，正是宫中的夫人们在三月三日这天到河边洗浴的情景。据说，三月三日的洗浴能够祛除邪秽，保持健康。而温泉的功效更使人们乐于在这一天沐浴。三月三日，还是情人幽会的季节。《诗经·桑中》就描写了阳春三月，小姑娘与小伙子们在桑间濮上幽会的情景。西南的很多少数民族也保留着相似的风俗，像傣族的泼水节，以及壮族三月三的对歌。

古代华清宫占地面积大约60万平方米，现在的华清池只有它的十分之一。在唐代，单是描写华清宫的诗就有400多首，且很多出自大家之手。比如杜牧有《过华清宫绝句》，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是路过这里的时候写的。这里是历代无数墨人骚客所仰慕的地方，其原因一则是华清宫当时非常鼎盛壮观，再则便是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所吸引。

骆希哲：唐代华清宫由三部分组成，北边是现在临潼县城的所在地，中区是皇帝来骊山游幸之时处理军国大事的地方。西区主要是皇帝宗庙所在地；东区是沐浴区，里面有许多著名的汤池，如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后面山上相当于皇帝的近院，是皇帝游玩的地方。山上有很多著名的建筑，如唐玄宗为了朝拜道教始祖老子而建的朝元阁、供奉太上老君的老君殿，还有非常著名的长生殿和祭灵台遗址。

王鲁湘：实际上就是把金銮殿搬到这儿来了，皇帝在此处理朝政。



唐玄宗莲花汤

骆希哲：对。唐玄宗沐浴的汤池叫御汤九龙殿，也叫莲花汤，位于华清宫东部。他把汤池做成莲花的形状，是为了得道成仙。现在大家一般认为莲花是佛教的标志，实际上莲花也是道教的标志，因为莲花有长生不老的寓意。这个池子在修建的时候有一段逸闻。据说唐玄宗修好池子以后，安禄山为了邀宠，用汉白玉雕了游龙和凫燕放在池子中间，沐浴的时候，因为水的波动，这些动物好像活了一样，所谓“奋鳞举翼，若动状”。这可把唐玄宗吓着了，于是赶快叫人把这些东西拿走，只把出水口的莲花留下来了。莲花汤的面积非常大，东西10.06米，南北6米，深1.5米。

王鲁湘：完全是一个小游泳池的规模了。

骆希哲：文献记载池壁上都有精美的线刻，但是由于历时既久，已经剥落了。这个池子一直延用到建国初年，八十年代的时候还在作为一个温泉的水源使用。当时我们考古的时候就奇怪，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水源？于是进到水里用手一摸，有花的形状，打开一看，结果是唐代非常漂亮的一个池子。

骊山的温泉是唐玄宗最爱去的地方，只是那时的他，还不知道杨玉

环何许人也。玄宗在宫中最宠爱的人叫武惠妃，自然也是个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女人。她是玄宗祖母武则天侄子的女儿。出于对祖母和姑姑太平公主的敬佩与景仰，玄宗对遗留着祖母和姑姑影子的武惠妃恩宠有加。开元二十二年，正是在武惠妃的主持下，杨玉环成为了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王妃，一夜间成了玄宗的儿媳。



杨玉环像

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病逝，玄宗因此郁郁寡欢。后宫佳丽三千，惠妃在他心中的位置依旧无人能替。内心深处的孤独终日灼烧着玄宗的神经，四年过后，在心腹宦官高力士的刻意安排下，李隆基到华清宫见到了此时还是他儿媳的杨玉环。兜兜转转之后，一段轰轰烈烈的黄昏之恋就此开始了。

骆希哲：唐玄宗娶杨玉环的时候，她已经是他儿子寿王的妃子了。

王鲁湘：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公公“扒灰”了。

骆希哲：为了掩盖乱伦的丑闻，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唐玄宗让杨玉环以为太后祈福为名出家，去当道姑。皇宫里有道教的场所，杨玉环便在这里从事法事活动，这样她和唐玄宗的约会就更加方便了。而且她一旦成为道姑，就完成了由人向神的初步转变，因为出家意味着脱俗。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老子对他说，在京城以西一百多里的地方有老子像。唐玄宗命李林甫去找，结果在周至楼观台这个地方找到一尊汉白玉的老子像。现在这个像就放在碑林博物馆，雕刻非常精美，是目前道教保存的最古老的老子像。当时这个像请回来以后，举行了盛大空前的迎接活动，皇帝开始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道教。其中一个隐含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搞得晕头转向，弄不清皇帝到底是人还是神，好为迎娶杨玉环开脱。到了天宝四年（745年），玄宗正式封杨玉环为贵妃，这时候人们已经处于狂热的宗教崇拜之中了。当然除此之外，他推崇道教还有政治因素。

王鲁湘：因为唐朝皇帝姓李，“李”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尊贵的姓。他们为了把自己这个姓的地位抬高，就把老子搬出来。

骆希哲：咱们这个攀附名人的习惯由来已久。

王鲁湘：对，连皇帝都不能免俗。

骆希哲：骊山过去叫神山、灵山。每当骊山山顶上出现云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要下雨，很灵验的。它的宗教地位是在唐代确立的。唐代帝王为了政治的需要和老子攀亲，因为老子也姓李，而且是道教的创始人，所以唐代尊崇道教。到了唐玄宗的时候，他就制造了很多老子显灵佑助唐朝的神话，这倒并不稀奇，因为每一个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都要编造很多各种各样的神话。

王鲁湘：而且武则天自称是弥勒佛下凡，她当时特别崇拜佛教，所以唐玄宗即位后要反过来用道教压一压。加上他要迎娶自己的儿媳，推崇道教等于是公私兼顾了。

李隆基和杨玉环就这样结缘于骊山华清宫，“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唐玄宗为杨贵妃建造的海棠汤紧靠莲花汤一侧，以其形若海棠花得名。两座建筑一大一小，呈依偎之势。



《贵妃出浴图》

骆希哲：海棠汤中间有一个莲花状的出水孔，相当于海棠花的花蕊。海棠汤和莲花汤毗邻，但大小相差悬殊。这说明杨贵妃尽管地位很高，但与皇帝相比，她仍是臣民。二池的排列一朝南，一朝北，也与天空中帝星与后星的排列一致。

王鲁湘：虽然他们两个人的恩爱非常深笃，恨不能融为一体，但是从这两个汤池的关系来看，封建礼制是不可逾越的。莲花汤肯定要大，而海棠汤要小；莲花汤要高，海棠汤要略低一点；莲花汤在左边尊位，海棠汤则在右边；海棠汤在前面半步，莲花汤则在后面半步；这种高低大小前后左右的关系是非常严格的。

骆希哲：一大一小的池子，一大一小的建筑，反映出了古代社会的皇权至上和等级森严。

王鲁湘：一般来说，大家会想当然地认为唐玄宗和杨贵妃是同池而浴的。

骆希哲：不是的。根据《周礼》记载，古代的皇帝和嫔妃是“同床不同浴”，即便是皇帝，也要遵循礼制。

王鲁湘：所以杨贵妃和唐玄宗肯定没有在一个池子里洗过。

骆希哲：是，而且安史之乱以后，这个池子就被掩埋了，因为当时杨贵妃被认为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祸根。

在温泉的滋养沐浴下，旷世名君爱上了绝色佳人。杨玉环的确很美，美得“天生丽质难自弃”，美得“回眸一笑百媚生”。对于这个漂亮的女人，史料中的记载也不乏赞美之词。她个性单纯、耿直、听话又不乏蕙质兰心，而在她面前，李隆基也不再是万乘之尊，而是她情意绵绵的爱人。他们的故事之所以独特、凄美，就在于他们的爱情超越了帝王对嫔妃的恩宠，具有了寻常百姓的情深意切。于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两个人讲的是寻常夫妻的誓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李隆基也的确由此沉溺了，他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骆希哲：华清宫孕育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发生了众所周知的长生殿盟誓。长生殿在骊山上头，虽然历史文献和唐人诗作中经常提到，但长生殿的具体位置到现在还未找到。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它

已经被掩埋或破坏无存了。不过，唐玄宗和杨贵妃盟誓的祭灵台遗址还在。历史上往往把祭灵台和长生殿合为一体，实际上它们是两个建筑。唐玄宗和杨贵妃在骊山祭灵台祭天之前，要进行沐浴、斋戒，长生殿是斋戒的地方。因为白居易的《长恨歌》流传四海，古今闻名，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长生殿当成了一个爱情圣地来对待，历代文人骚客游骊山时都想一睹长生殿的风采。

王鲁湘：而且因为他们是在七月七日晚上进行的海誓山盟，所以现在很多人想把“七月七”当做中国的情人节。

骆希哲：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每到七月七，唐玄宗和杨贵妃都要到骊山来，在宫中搭一个百尺高楼，进行“乞巧”活动。“乞巧”活动由来已久，大概产生于原始社会，夏代的文献记载中就出现了牛郎织女星的故事，后来衍生出一个美丽的传说：天上的织女下凡到人间，和放牛的小伙子牛郎结为夫妻，生了一男一女。王母娘娘知道这事，便来到凡间，趁牛郎不在的时候把织女带回天宫。牛郎回来以后得知织女被王母带走，悲恸欲绝。这时他忽然想起他养的老牛临死时告诉他，把牛皮剥下来，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披着老牛的皮上天。于是牛郎披上牛皮就追。王母娘娘看他就要追上来了，马上从头上拔下金簪一划，牛郎面前就出现了一条波涛汹涌的银河，牛郎织女被隔在了两边。但牛郎仍不懈抗争，王母娘娘拗不过二人的痴情，最后答应他们每年的七月七日可以相见，这天有无数的喜鹊搭成鹊桥。这个传说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在古代，“七夕节”是最浪漫的中国传统节日。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姑娘们摆上时令瓜果，仰望星空，朝天祭拜，向聪慧灵巧的织女乞求智慧和娴熟的女红技艺，更乞求真挚的爱情和幸福美满的姻缘。而每年的七夕，唐玄宗和杨玉环也会像平常的夫妻一样，在鹊桥下表达对彼此的誓言。

王鲁湘：到了汉代，朝野都信奉牛郎织女的故事，而且都把七夕这一天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骆希哲：对，到唐代尤盛，主要的原因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得非常好。而他们之所以热衷于七夕节，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是不是杨贵妃不孕？因为古人不光在七夕节祈求爱情，夫妇没有小孩的时候，也会向牛郎织女这一对爱情神进行祈求。杨贵妃

跟唐玄宗生活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小孩，唐玄宗可能会向牛郎织女祈求延年益寿，而杨贵妃也可能有想早生贵子的心愿。

王鲁湘：应该是有的，他们"夜半无人私语时"，不能老是说你爱我我爱你吧，恐怕还有一些实质性的活动。

骆希哲：而且古代母以子贵，杨贵妃虽然"三千宠爱集一身"，但终究没有孩子，地位是不稳固的，杨贵妃很有可能有这种难言之隐。

尽管杨贵妃有一些难言之隐，但是她与唐玄宗的爱情却丝毫未受影响。这对老夫少妻能够几十年恩爱不衰，这在常人看来，确实是至为难得，甚至让人感到好奇。细细思考，二人的感情之所以这么坚固，并不是皇权所能维持的，因为二人有共同的爱好和精神世界，才铸就了这段坚贞而凄美的爱情故事。

骆希哲：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一对老夫少妻居然十几年恩爱不衰。

王鲁湘：要不是安史之乱，可能还会一直延续下去。

骆希哲：是啊，三千宠爱在一身，我想不仅仅是由于皇权的威慑、权力的诱惑，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二人在很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比如两个人都信道，按现在的说法，是一个教团的，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二人都热爱音乐，唐玄宗不仅热爱音乐而且十分懂音乐，精通音律，善吹笛，能谱曲，还敲得一手好羯鼓。

王鲁湘：好鼓手！

骆希哲：有时人家给他弹琴，他就说，出去，拿羯鼓来，让我解秽！

王鲁湘：他觉得人弹得不好，污了他的耳朵。

骆希哲：杨贵妃呢，琵琶弹得好。

王鲁湘：舞也跳得好。

骆希哲：她的霓裳羽衣曲，可与赵飞燕的掌上舞相媲美。他们两个都是顶尖的音乐大师，还在宫廷里边组织了一个乐团，里面的弟子叫"琵

琶弟子”。

王鲁湘：也就是说，两人有共同的事业爱好。

骆希哲：每当唐玄宗政暇之余，就把这些琵琶弟子组织起来在宫中进行演奏。

精通音律的唐玄宗在这里修建了著名的梨园，在华清宫的日子，玄宗与贵妃大多出现在这里。有人说，繁盛的大唐正是在这里一天天消失殆尽。



梨园遗址博物馆

王鲁湘：这个建筑是在当年考古发掘的梨园遗址上盖起来的。

骆希哲：梨园遗址在地下七米深的地方，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在唐代考古中是不多见的。当时梨园遗址有房子，有回廊，中间还有一个大厅。大厅可能是演戏、演奏、排演的地方，回廊是乐班子伴奏的地方。唐玄宗还不忘为这些人提供专门沐浴的地方，所以梨园旁边有一个小汤。因为她们演奏歌舞的时候，很可能会大汗淋漓，唐代的歌舞像霓裳羽衣舞，节奏感是非常强的，很费力气。

王鲁湘：所以唐明皇后来也就成了梨园的祖师爷。

骆希哲：梨园还经常发生一些逸闻。比如杨贵妃过生日的时候，唐玄宗就把马先期、贺怀智[55]这些宫廷音乐大师组织成一个小乐队来演奏，然后叫张云容这些人跳舞。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也来观看演出，唐玄宗在演完后，装出一副寒酸相，说，哎呀，请虢国夫人给阿满一点赏钱吧。

王鲁湘：唐玄宗其实是一个性情中人。

骆希哲：他不但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艺术家。他和杨贵妃在骊山住的时间很长，所以这里的办公、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到了天宝年间，这个地方已经是中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地了，很多大事就发生在这里。关于如何应对安史之乱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也是在华清宫举行的……

天宝十四年，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华清宫的幸福和欢愉，伴随着杨玉环生命的结束戛然而止。繁盛的大唐虽未在玄宗手下丢弃，却也从此一蹶不振，没了生气。在此后的数百年里，华清宫的一切被蒙上了黯淡污秽的颜色，成了不祥之地，再没有帝王在那里修建离宫别苑。清末的老佛爷慈禧就连路过那里也要绕道而行，以免沾染颓败之气。然而，即便如此，华清宫造就的传奇，经历的兴衰，仍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文人墨客咀嚼玩味的蓝本。而那首让人肝肠寸断的《长恨歌》，也一直缭绕在无数痴情人的心中。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这是一座雄视天下的古老学府。

一座座石碑、一块块匾额、一幅幅对联，历经千年风雨洗礼而不灭，见证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旷代奇观：从朱熹到王夫之，从魏源到曾国藩，从梁启超到毛泽东。任你“风云变幻”，我自“弦歌不绝”。

这里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古代中国之所以被誉为“礼仪之邦”，教育受到极高尊崇是主要原因之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称千古帝王，大教育家孔老夫子却是“万世师表”。在社会上，知识阶层的地位也远非后来可比，排序位于士农工商之首。至于教育机构，战国时候就有了专管教育的学官，称为“祭酒”，是位列公卿的人物；汉朝出现了正式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也于西汉普及，私塾的创办就更早了。官学、私学交织发展，一派“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

中国古代，文化道德主流能够千年一同，文官制度得以领先世界，可以说完全依赖于高水准的教育。而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就是其不朽杰作。

朱汉民56：中国一直是以教育立国，在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政府把儒家定为意识形态之后，就把教育抬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地位。从夏商周，就是中国文明起源开始，我们国家的机构中就有学校。



孔子像

王鲁湘：这就是过去所说的“学在官府”。

朱汉民：对，除了“学在官府”之外，其实还有一套民间教育的学校。如果追溯源头的话，民间学校，也就是私学，应该开始于春秋。在当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还有道家，墨家，都是私学。官学和私

学，它们在中国文化史上或者中国教育史上，都起到了很大的人才培养、文化传递的作用。有人比较全世界这几大文明圈，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这些宗教基本上都是由一个创教人创造的，像穆罕默德、耶稣、释迦牟尼等，他们都是教主。而孔子的身份则很特殊，他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教书人，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万世师表，被供奉在文庙里面。

王鲁湘：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所谓的“私学”中间出现了高级形态的“书院”呢？

朱汉民：如果追溯的话，应该是从唐代中后期开始，当时在民间有一些比较小的书院。当然，那些书院可能只是秀才们自己读书的地方，最多只能说是书院的雏形，所以并不具备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和专门的教职，还算不上比较完备的书院。

王鲁湘：那正式的书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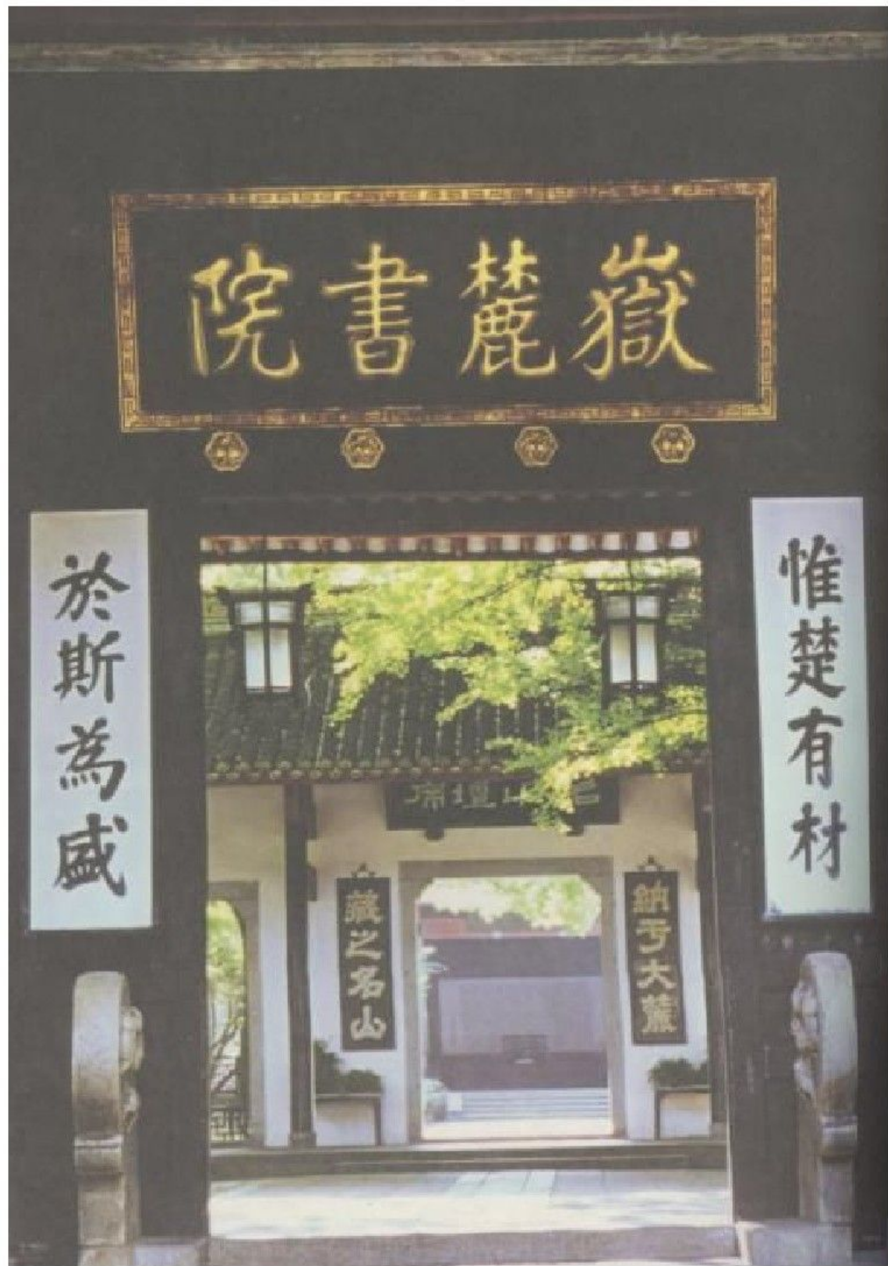
朱汉民：我认为应该是在宋初。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北宋在建国之初便比较重视科举考试，它拼命发展科举，像宋真宗就常鼓励读书人好好读书。

王鲁湘：他还写了一首在民间流传甚远的《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吧？

朱汉民：对，他就是用这个办法来鼓励读书人读书。但有一个问题：官学要国家拿财政支持，要花很多钱来办。

王鲁湘：所以财政不够用。

朱汉民：不够怎么办呢？只好依靠民间。民间读书人很想读书，那么各个地方就用书院这个名称，办起了一种学校。所以最早的书院都是一些民间的私学，像我们所说的宋初几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包括岳麓书院。这些书院在当时都是由一些读书人或者地方士绅来支持。



岳麓书院大门

王鲁湘：朱院长，书院的中轴线好像不是很正。大门前面的轴线应该是朝正东的，是吧。可是现在好像往北偏了一点点，这是怎么回事？

朱汉民：这是明代人在修书院的时候，出于风水上的考虑所做的变动。当时修书院的看了这里的地势，觉得风水不是很理想，他就有意根

据风水的走向稍微偏了一个角度。

王鲁湘：偏了一点点，不敏感的话还察觉不出来。我一看就觉得有点偏。

朱汉民：对，它实际上是把整个大门的朝向从整体上扭了一点点。

王鲁湘：往北扭了一点点，这样风水就好了？

朱汉民：对，后来听说整个书院很顺。

王鲁湘：如果不是扭这么一点点，那么这幅“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可能就在这里挂不住了，就不会出这么多人才了吧。这幅岳麓书院的对联，可以说是天下闻名，好像很自信，甚至很自负的样子。

朱汉民：岳麓书院这幅对联是在清代挂上的。当时有一个山长[57]叫袁名曜，他在考虑为岳麓书院写个什么对联的时候，想到了春秋《左传》里面那句话“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就把那个“虽”去掉，改成“惟”楚有材。

王鲁湘：气魄大多了。

朱汉民：他有个学生叫张中阶，想到《论语》里面有句话，叫“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孔子的意思是说现在人才很难得，但是在尧舜时代人才则很旺盛。张中阶就把那个“于斯为盛”作为下联，用到这里。“斯”在《论语》文本中本来是指代尧舜那个时代。

王鲁湘：结果在这对联中就用来指代楚这个地方了。

朱汉民：对，变成了一个空间概念。明清以后，湖南确实出了大量的人才，为全国所震惊。而且这批人才多数在岳麓书院学习过，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

二、三教融合



岳麓书院在北宋初年兴办书院的热潮中正式创建，根据书院的史志记载，书院的第一位山长是著名的教育家周式，他办学成绩卓著，风闻天下，以至于当朝皇帝宋真宗，都破例召见了他，并且御赐了至今依然高悬的“岳麓书院”匾额。然而，书院正式创立之前，这里已经有了一个萌芽形态的学校，这个学校的创办者，却是两位佛教僧人。（图3，岳麓书院全景）

朱汉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像岳麓书院这样一个以儒家文化为宗旨、为核心的书院，它真正的创始人竟不是儒生，而是两个佛教徒——唐末五代的和尚智璿等人。为什么呢？因为岳麓山过去佛教和道教盛行。

王鲁湘：对，是道教圣地。

朱汉民：大概在东汉末年，这里就有一些道士，现在山上还有个“抱黄洞”。当时有个叫张抱黄的道士就曾在山上炼丹，《岳麓书院志》上记载他在那修炼之后，飞升而去，就是变成仙人了。除此之外还有佛教。麓山寺是湖南最早的寺庙，建于西晋。也就是说，在岳麓书院创办之前，这里已经有儒、佛、道在这里活动，做文化交流。

王鲁湘：已经是一座文化名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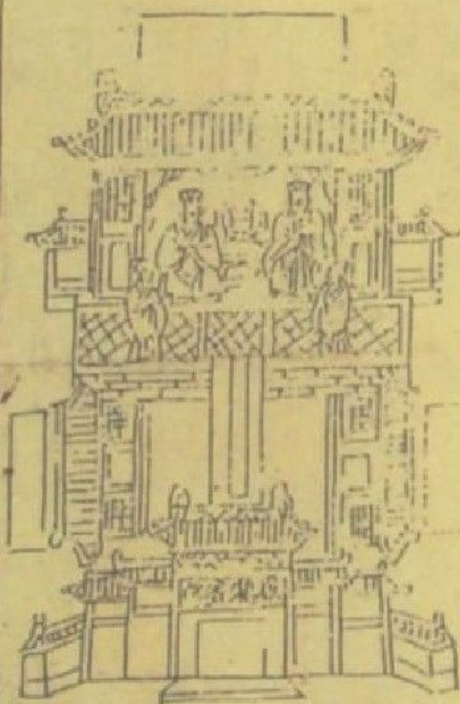
朱汉民：在唐末五代战乱的时候，文化遭到极大破坏。智璿和尚考虑到有很多儒生想读书，他居然真去买了很多儒家的经典拿到这里，又约请了很多的儒家读书人、士大夫们到这里来读书。这个时候这里就构成了一个最早的书院，虽然当时还不叫书院。到了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就在这个基础上建造了岳麓书院。

王鲁湘：这正好表明，岳麓书院的形成本身也是三教合一的产物。

岳麓书院是岳麓山儒、佛、道文化融合的产物，而后来使它名扬天下的，也正是一种以儒家正统为主体、综合佛道思想的理学思潮。被后人称作朱子的朱熹继承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开创的理学，综合儒佛道三教的思想精髓，完成了儒学的哲学化转型，为君主专制、封建伦理和等级秩序作了精巧的论证。朝廷大为赞赏朱熹的学说，其《四书集注》对孔孟学说所做的阐释，从此成为了科考的规范，儒学由此得以中兴。而朱子曾经讲学的岳麓书院，也因为皇帝的褒奖再次出现了办学的热潮。

三、朱张会讲

从夏商周三代到汉唐，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湖南地处“南蛮之地”。直到两宋时期，中国文化中心南移，湖南才出现了以“湖湘”为名的理学学派，岳麓书院自然成为了湖湘学派的中心。



《岳麓书院图志》上手绘的“朱张会讲”图

当然，岳麓书院的功成名就，还在于它自成一格的教学方式：自学为主，老师数日开讲一次，提纲挈领只讲重点。上课的时候，学生从少年到花甲济济一堂，自带蒲团，席地而坐，凝神听讲，主动答问。

岳麓书院更有一种独特的学术活动叫“会讲”，即请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面对面探讨和辩论，学生在场旁听，有时论争至三天三夜。虽然不一定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已推动了学术和教学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一场会讲，就发生在朱熹和另一位理学大家张栻之间。

王鲁湘：“忠孝廉节”堂里，正面的讲台就是当年朱熹和张栻会讲的讲台吧。他们两个人坐到椅子上，周围的学生来听他们两个人辩论。

朱汉民：是的。当时他们讨论《中庸》的“已发”和“未发”问题[58]。史书上记载，他们在这里争论了三天三夜，意见不太一致。因为两个学派的学术宗旨不一样，一个是“闽学”，一个是“湖湘学”[59]。他们学术的师承也不一样，对《中庸》“心”和“性”的理解也不一样。然后他们就讨论，进行激烈的争辩，学生在下面听。

王鲁湘：听课的也听了三天三夜？

朱汉民：对。



岳麓书院“道南正脉”匾额

王鲁湘：这应该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况啊。

朱汉民：确实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学术事件，而且他们最终也取得了学术成果。两个人经过讨论之后，在很多大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所以后来张栻的“湖湘学”和朱熹的“闽学”比较接近，都被列入《宋史·道学传》，这也是堂上“道南正脉”匾额的由来。

王鲁湘：这是乾隆皇帝写的。

朱汉民：对。匾额的意思就是，朱熹、张栻在这里讲学，他们传播的孔孟之道是正统的，所以是“道南正脉”[60]。

王鲁湘：岳麓书院千年以来“弦歌不绝”，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名的弘道圣殿。说到弘道，岳麓书院在中国学术史上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八百多年以前的这次“朱张会讲”。那么，朱熹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潭州这个地方的？

朱汉民：过去的读书人真是很不容易。他们在读书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不懂的地方，产生了疑惑，就要和当时的师友相互讨论。如果两人相距很远，讨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进行。当时岳麓书院的主持人是张栻，他是二程的世传弟子，而朱熹也是二程的世传弟子。

王鲁湘：朱熹是李侗的弟子吧，而李侗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所以这两个人往上走，都走到二程那里去了。

朱汉民：对，都是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在读《中庸》的时候，对里面心和性的问题总是不得其解。在这时，他就跟张栻通书信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书信来往非常多。张栻是胡宏的学生，他们对心、性有一套看法，认为“未发是性，已发是心”；至于心性如何修炼才能成圣贤，他们的主张是“先察识，再涵养”。而朱熹是李侗的弟子，李侗是主张静坐功夫的。

王鲁湘：对，闽学是主张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更类似于禅宗。

朱汉民：首先要静坐，体认大本。朱熹感到，通过书信与张栻交流还是不行，必须要见面讨论，所以他就从福建走了两千多里到湖南。古代交通不像我们今天坐飞机坐火车那么便利，一下就到了，可见他走了很久。

王鲁湘：非常难，走走路、坐坐船、再骑骑毛驴。

朱汉民：对，要花很长时间。当时他的很多弟子都反对他这么远跑过去，但是朱熹很坚决，于是就来到了长沙。他和张栻两个人一起在讲堂“会讲”。所谓会讲，是书院一种独特的讲学方式，即“会友讲学”——就是两个学友一起讨论，学生坐在边上听。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学术讨

论会，但又和讲学联合在一起。书院史上最早的有记载的会讲，应该就是岳麓书院这次。

王鲁湘：就是朱熹和张栻的会讲。

四、经世学风

张栻、朱熹、陆九渊和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四位理学家，他们主持的岳麓、白鹿洞、象山、丽泽四所书院，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因此被称为“南宋四大书院”。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教事期间，对书院的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变革。

在著名的《岳麓书院记》中，张栻提出了“成就人才，传道以济斯民”的办学方针，否定了那种仅能应付科举考试，只有言语文辞之工的无用之才，明确了书院的目标就是培养能够“传道济民”的人才。此外，在教学方法和学术研究上，岳麓书院也更加灵活多样。于是乎，湖湘士子纷纷来此研习，名士大儒更是往来频繁。岳麓书院从此成为湖湘学派的主要基地，步入了其发展的全盛时期。

朱汉民：我认为湖湘学派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心性的修炼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所以湖湘学派的成员不是那种纯粹搞心性修炼的儒者。纯粹搞心性，走到极端的话，就有点像佛教、道教，远离政治，远离社会。

王鲁湘：跟“逃禅”是一回事了。



王夫之像

朱汉民：对，天天坐到那儿修炼，不关心社会、政治，要他去治国平天下，什么也不懂。这样的话，实际上违背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精神。

王鲁湘：所以才有老百姓经常说的那句话，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对吧？

朱汉民：对。湖湘学派这批人，除了心性修炼之外，也很注重研究

各种经世致用的学问。张栻还研究《孙子兵法》，而且他认为《孙子兵法》是每个儒生必须要研究的，所以湖湘学派有些人后来去打仗，到战场上去指挥军队，去抗金啊等等。湖湘学派所奠定的这种思想、学术传统，影响到了后代。明清之际，湖南出了许许多多的学人，从学术传统上来说，都可以和湖湘学派扯上关系。

王鲁湘：在这方面，岳麓书院最杰出的一个学生，应该就是王船山[61]先生了。

朱汉民：对。

王鲁湘：所以咱们岳麓书院专门为他建了一个祠——船山祠。

王船山是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本为明末举人，清兵南下，他以一介书生之躯举兵抗清。兵败还乡，闭门著述，潜心研究学术，成为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大。



岳麓书院船山祠

王鲁湘：王船山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大概是什么时候在岳麓书院读书的呢？

朱汉民：明末的时候，他正好在岳麓书院求学。当时他还在这里办了一个社团叫“行社”，“行”就是行动的行，因为他比较注重实践。当时，他的老师也叫吴道行，所以这个社团的名称，说不定还和他的老师有关系。

王鲁湘：据说吴道行在清兵打来的时候自杀了，对吧？这个事情好像对王船山的刺激非常大，他把老师的尸体掩埋了以后，就到南明62那边直接参加了抗清运动。

朱汉民：对，他后来把抗清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

王鲁湘：王船山的学说，在他生前和死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不为人知。大概是什么时候，王船山的学说被人所发现，然后被重视的呢？

朱汉民：这当然和曾国藩有关系。他一直印行王船山的书，然后又到处宣扬王船山的学说。整个湘军的儒将都读王船山的书。曾国藩能够很巧妙地把理学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而这个传统，应该也是从湖湘学术传统一脉传承下来的。

朱汉民：湘军这些头目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们不是靠军功当上军队的指挥者，只是一些普通的儒生。而且，这批儒生中的大多数正好又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当时恰好是欧阳厚均这样一批儒生主持岳麓书院，他们在学院强调“有体有用”：一方面要有体，就是要明白儒家的道德、义理，对儒家价值观念要有一种信仰；另一方面又讲用，就是要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

王鲁湘：岳麓书院的学风和湖湘学派关于儒家的理念，变成了湘军的军魂，因此，湘军其实是一支儒军。

在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情操非常突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屈原和贾谊。以岳麓书院为大本营的湖湘学派人士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伊始便开始发扬光大。在此期间，岳麓山下更是人才辈出，如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兼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反袁护国运动领袖蔡锷、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教育家杨昌济等等。

随着向现代化转型的湖南新政的实施，这个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先进人才的古老学府开始改制，1903年先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

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则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一直沿用至今。书院改为学堂以后，更有大批爱国志士，如唐才常、黄兴、陈天华以及邓中夏、蔡和森等来此求学。

王鲁湘：这些人物都和岳麓书院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么？

朱汉民：他们都是在岳麓书院改制成湖南大学期间涌现出来的，而他们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批重要历史人物，像梁启超、谭嗣同、唐才长，他们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像熊希龄、蔡鄂、陈天华，他们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批革命志士。再往下，就是一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像何叔衡、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

王鲁湘：李达和何叔衡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蔡和森是最早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

朱汉民：对。此外，油画里还有一些现代教育家、科学家，像胡庶华、周小舟，他们是湖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

五、毛泽东与岳麓书院

从岳麓书院走出的这一大批有识之士，无可非议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千年学府还深深地影响了另一位对中国命运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也曾来岳麓山游学，以后又数次在此寓居。

王鲁湘：马继高先生撰过一幅对联，上联是“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下联是“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所谓“毛蔡风神”，毛显然是毛泽东，蔡就是蔡和森，对不对？

朱汉民：对。

王鲁湘：那么毛、蔡这两个人和岳麓书院有什么关系呢？

朱汉民：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是湖南高等师范的教授，青年毛泽东就到岳麓书院来住了三次，在这里读书、学习，和蔡和森交往，一起讨论学问等。

王鲁湘：毛泽东当时肯定在这里留住过。当时到蔡和森家的时候，肯定是经常找蔡和森在这里游玩或者共同讨论一些问题。他词里所写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回忆的大概就是这段生活。

朱汉民：对，“看万山红遍”，说的就是岳麓山。

王鲁湘：秋天的岳麓山。

朱汉民：他们住在爱晚亭，在那露宿，还在这里搞了个农村调查。

王鲁湘：可以说，毛泽东对岳麓书院的印象非常深。

朱汉民：对。

王鲁湘：他后来办抗日军政大学，办中共党校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那个蓝本，其实都是岳麓书院吧。比如在延安的时候，中共的一个思想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就是当年他和蔡和森讨论各种问题的时候，在岳麓书院里看到的。岳麓书院这块“实事求

是”的匾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呢？



实事求是匾

朱汉民：是1917年，这里改成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时候。当时的校长叫宾步程，他就把“实事求是”作为当时的校训。“实事求是”本来是中国古代的治学格言，东汉的时候就有了。在清代的时候，讲究“实事求是之学”、“实学”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岳麓书院本身就有“实学”的这种传统，源远流长，而且曾国藩还专门解释过“实事求是”，说“实事求是”就是“格物致知”——就是要研究实事，从实事中间来求得天理。

王鲁湘：后面那个“是”就是天理。后来毛泽东又把这作了新的解释，把“实事求是”的第一个“事”看成是我们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把后面的这个“是”解释成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后得到的那个真理。

朱汉民：对。

王鲁湘：他用这四个字，在延安开展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思想运动。

朱汉民：所以，岳麓书院的办学传统和思想，确实对他的思想影响

很深。

王鲁湘：后来他又把它变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现在去任何一个党校，进门的时候，一定能看到“实事求是”四个字。

朱汉民：对。

王鲁湘：“实事求是”两边的对联好像是“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两个嵌头正好是“工业”二字。

朱汉民：对，这是当时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校名。

六、千年书院，薪火不绝

教育为立国之本的认识，现在终于古今一同了，但在当初，对传统文化究竟如何取舍，人们是经过了一些摇摆和犹豫的。虽然，把“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等做法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看，有其时代的需要、局限和无奈，但是因分寸无法恰当把握，确曾伤及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例如，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典范岳麓书院所代表的爱国主义教育精神，经世致用的教育目的，不拘一格的教学方式等等，就在相当的程度上被社会和教育界所忽视了。学校办得像学店，知识待价而沽，学生疲于为做官、发财、谋生而读书，以至于忘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育人。

朱汉民：光绪28年、29年，整个书院都变成了学堂。大概才过了20多年，就有人开始批评这个现象，批评者包括胡适、青年毛泽东，当然也包括那些新儒学的大师熊十力、梁漱溟、钱穆等。他们都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新式学校有它的弊端：只管教书，不管育人，把学校变成一个贩卖知识的场所。学生到学校来是买知识，老师在学校是卖知识，师生关系变成了买卖关系。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怀念古代的书院。古代的书院有一个根本性的精神，就是它很注重品德培育。书院不仅是传递知识的场所，更是冶炼人格、培养人格的地方。这是符合儒家的传统理念的。儒家认为，培养人是最根本的教育目的，而不是传递知识。

岳麓书院作为历史遗产，其有形的遗产如房屋、建筑、碑刻、匾额等文物系统，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完全恢复了。但它更重要的内在文化遗产，如办学宗旨、人文精神、学术传统等，我们要怎样来继承、弘扬呢？如何把岳麓书院在历史上所形成的这样一套教育理念、教育模式纳入到现代大学的体制里，使之继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当前和以后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

钓鱼城传奇

公元1279年，在厓山海战中，南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投海自尽，南宋亡，忽必烈正式君临天下。此时，在中国西南边陲重庆山区里还有一个不过1.9平方公里的小城，城里的宋朝子民竟然还在坚持守抗蒙军的进攻。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弹丸小城抗击蒙军已有三十多年之久！姑且不说这场在世界军事史中最长的拉锯战是何等艰苦卓绝，只说当得知南宋大势已去后，守城的南宋军民的心情该是何等的纠结？是继续誓死守城，还是弃城投降？如果投降，这三十多年的防守岂不是成了一场徒劳？如果誓死不屈，那么整个山城中的十几万百姓势必将成为山城的陪葬品！

没错，这个纠结在历史拐点的小城就是——重庆合川钓鱼古城！而这里所发生的抗蒙战事，也是一场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不朽传奇！

一、铁城肇建

13世纪初，强大而充满野心的草原民族蒙古族迅速崛起，他们打败金国，成为南宋王朝的头号劲敌。1236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四川地区成为双方角逐的一个主战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位于重庆山城北边的合川钓鱼城，因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被赋予了抗击蒙军的重要使命。

合川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的汇合口，整个山城就屹立在离江面300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人们推测，钓鱼城分内城、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由石条垒成，一看便是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堡垒。依据文献记载，钓鱼城建成之后，当时合川地区的五个县城全部搬到山上躲避蒙军的侵袭。



钓鱼城石刻城名

王鲁湘：有没有文献详细记载当年建钓鱼城的时候有多少居民？

刘智[63]：17万。

王鲁湘：真正的军人有多少呢？

刘智：军人大概就4000多，整个四川四路战区的军队加起来还不足

五万。

王鲁湘：这么多的人住在山上，这个天池的水完全靠天降雨吧，它不是泉水吧？

刘智：不是泉水，是天降水，但它有好几十口自然的水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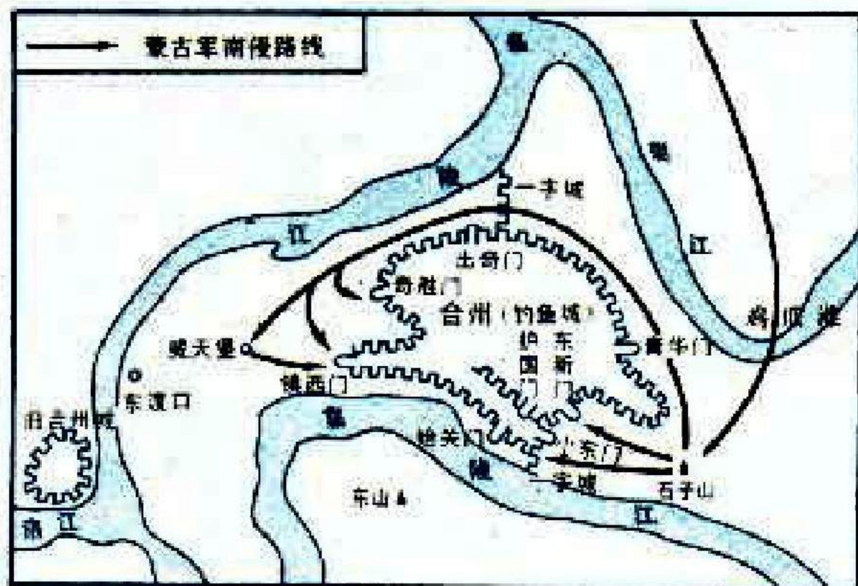
王鲁湘：水井里的水是泉水？

刘智：这几十口井都是宋井，用的是地下泉水。整个城的水源来自三个渠道，一个是天降水，就是天池；还有一个是掘出的水井；另外，它还控制了很大一段江面，所以可以在江边取水。护国寺里面有好多宋代的井，传说在井里放一只鸭子，可以到嘉陵江去捞，因为它们是通着的，井水一年四季都不干枯。

王鲁湘：这个山上到处都有井，井水很清澈啊！

袁东山[64]：水可以用于运输，还可以饮用，对人类太重要了。这个城的优势就是不缺水，而当山洪暴发或江水泛滥的时候，它又不怕水，因为它在山上。守城的这批人全部是南宋当地的居民，对环境有很好的适应性，所以在战争过程中蒙古人很吃亏。他们虽然有很强的骑兵和进攻力，但是没法用。

钓鱼城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抗击蒙古军队，其实绝不是简单地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事实上，钓鱼城只是重庆地区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它所依托的是四川地区的“网状军防体系”。



钓鱼城战图

1236年，阳平关之战全面爆发，四川地区几近沦陷。1242年，四川安抚制置史兼重庆知府余玠受到朝廷重用，他试图力挽狂澜，此时，一个大胆而充满谋略的设想应运而生。他谋划要依托四川、重庆地区有利的山势、江河条件，建立一套山城防御体系，让蒙古军队的铁骑在此顿足！

袁东山：当时，四川实际上是依托6条江，就是曲江、嘉陵江、涪江、沱江、绵江和长江，以及几十个小方山，把整个川陕战区的政府、军队全部集中到这些山上，以方山为点，以江为线，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形成了一个整体联动的巨大战区，这个战区的核心或指挥中心就是重庆。



帅府遗址

2010年，重庆市进行旧城改造，偶然地在市中心解放碑附近发现了一处古建筑遗址，它保留在地表上的部分还有10多米高，这个高台建筑就像天安门城楼的楼基一样，是夯土包砖。这上万块的包砖上都刻有“淳佑乙巳东窑城砖”、“西窑城砖”等字样。淳佑乙巳就是1245年，正是余玠指挥抗元战争最关键的时期。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发现，这儿就是余玠的帅府遗址。

王鲁湘：整个山城防御体系的指挥中心就在这个地方？

袁东山：对，就在渝中区濒临解放碑的旁边。

王鲁湘：解放碑附近就是重庆市的一个原点或历史建筑起点，它被你们在无意中找到了。

袁东山：这是老天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馈赠。

当年余玠从毫无屏障的成都迁到了有江山之险的重庆，并将这里作为军事机要中心。在紧要关头，他招贤纳才，迅速摸清了当地的地理情况，创建了合理的山城防御体系。

孙华[65]：这个防御体系的建立，第一步是定重庆为中心。定了重庆以后，余玠采纳了当时播州土司[66]的两个谋士冉璞、冉琎的意见。这两

个谋士长期在四川活动。

王鲁湘：对四川的情况很清楚。

孙华：钓鱼城上面有庙，这个庙唐代就有了，在宋代的时候，贵州的田氏土司修过，所以，作为播州土司的谋士，冉璞、冉琎他们对这个庙的情况很熟悉，对钓鱼城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也非常了解。余玠上任以后，他要找人拿出光复四川四路的策略，于是筑了招贤馆，让有本事的人自动来报名，拿出他们的办法。这个时候，冉璞、冉琎去见余玠，在地上画了整个四川的地形图，然后提出了建立山城防御体系的策略，而这个策略的核心就在钓鱼城，所以要把钓鱼城建设成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

这个以重庆为中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包括云顶平、白帝城等二十多个山城，其中钓鱼城是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它在未来的抗蒙战争中发挥了不可限量的作用。

二、固若金汤



钓鱼城磨盘遗址

余玠所建的山城防御体系曾一度挫败蒙军，局部扭转了南宋军队节节退败的战局。但是，蒙古人统一世界的野心和训练有素的军事实力，令宋军只有一时的招架之力。很快，蒙军铁骑逾越四川凭借天险而建的军事防御系统！二十多个山城几乎全部弃城，只有钓鱼城的城门紧紧关闭，让骁勇善战的蒙军难以接近！

王鲁湘：远远地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磨盘，这应该是个磨盘吧？上头应该还有一个大碾？

袁东山：对。有一个大的石滚作为碾，它是用牲口拉着来碾粮食的。

王鲁湘：用驴子？

袁东山：应该是牛，一种黄牛，那里没有驴子。

王鲁湘：这里无论作为衙署所在地，还是兵营所在地、老百姓所在地，总要吃粮食。所以从磨盘的规模来看，这里应该是个作坊，可能直

接隶属于军营的后勤系统。

袁东山：这不会是老百姓自己家里的，家里的不会有这么大。



钓鱼城城楼遗址

事实上，建造钓鱼城时，余玠不光只是考虑到了山城的军事功能，他还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坚不可摧的城墙围合成一个安全的军事、生活空间。城内设施齐全：有县衙门、兵工作坊、经济贸易中心，甚至还有佛教寺庙等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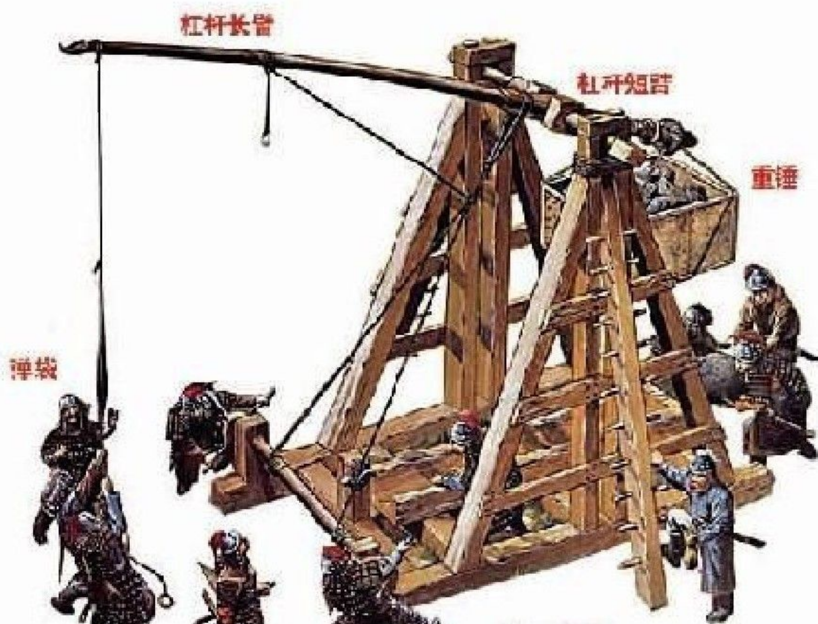
王鲁湘：我这次在钓鱼城参观以后，改变了一个观念。我原以为这种山城防御体系只是一个一个的堡垒，顶多也就是个山寨，像土匪或土司的堡垒一样。结果到钓鱼城一看，它真是个城，上头什么都是全的。

孙华：两宋之际的军事家陈规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将领在总结北宋和金朝的寿阳之战时说“城小而易守”，这个话是错的。城一小，尽管用比较少的军队就能进行防守，但城小了以后，调动军队也相对受到了束缚。另外，城小了以后，敌人更容易多面夹攻。

王鲁湘：围成一个铁桶一样。

孙华：对，很容易失去做机动反应的空间。所以综合看来，钓鱼城这个小城能抗击元军那么久，是非常不容易的。

汩汩嘉陵江环绕钓鱼城，为这个小小的山城平添了无尽的秀美。如今走在城中，似乎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经历了最惨烈的战争。但是，来此凭吊的游客，可在城内看到一些冷兵器时代的抛石机——这是宋兵抵抗蒙军的重要武器。



南宋抛石机

孙华：宋朝的军队进行防守是非常善于用炮的。陈规在《守城纪要》里面就谈到，守城最重要的一环就在用炮，而且他总结金兵攻陷汴梁城，当时宋朝有很多失策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守城将领把炮摆到了城墙外面，如此一来，军队一溃，炮就留给金人了。

王鲁湘：留给敌人了，敌人就拿着这个炮来打我们。

孙华：当时的炮有好几种：重炮可以把很大的石块，甚至石碑放出去，另外还有轻炮、泥蛋炮。按照陈规的说法，用泥巴做炮，把它凉干了也能把人打死，而且敌人还不可能捡回来打我，因为它一打就碎掉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讲的这个炮，实际上是冷兵器时代的炮，也叫抛石机，所以不是热兵器时代的炮。炮的动力不是火药，而是人的肌肉。要想使抛石机抛得越远，拉炮绳的人就要越多。像在前沿江防炮兵

阵地上的炮，应该是重炮，拉绳子的人数是最多的。

整个山城防御体系，还实施了使敌人既攻不上据点、又抢不到军资的“坚壁清野”策略。

袁东山：因为蒙古人生长在北方的草原高寒地带，不太适应南方潮湿炎热的气候，所以他们每次进攻几乎都是秋来春往。钓鱼城将整个山城防御体系作为一个巨大的依托，蒙古人来的时候，要一个城一个城地过，每个城都会打，每个城在打仗的同时，就会把信息传递到下一个或下几个城，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有两个核心的东西：一个是信息的传递，从考古上我们很难把这套信息系统破译出来；另外就是“坚壁清野”，以点控面。在蒙古人来以前，它利用山城把周边几十平方公里，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老百姓、粮草、牲畜全部集中到山里边，而蒙古人正好是游击性和流动性作战，它的辎重是很有限的。

王鲁湘：因为是长距离的奔袭，他们不可能有一个庞大的后勤部队，源源不断地从千里之外给他们输送辎重和粮草，所以他们只能就地取食。而这边一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以后，元军实际上就坚持不了多久了。

袁东山：所以，钓鱼城之战的胜负，往往取决于粮食，谁的粮草更多一点，谁就可能是胜利者。在这种情况下，“坚壁清野”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

钓鱼城是靠什么办法，能在蒙军到来的间隙，将周围上百平方公里的军资、粮草全部纳入城中呢？毫无疑问，城内必定有设计独特的军事通道与外界相连！根据零星的史料记载，当时余玠委派的冉氏两兄弟，调集了合川地区的五县民众，在钓鱼山上开山采石，凭险建垒。他们在钓鱼城内峭壁和江面相连的地方，设计了好几道一字型城墙和水军码头，这些军事设施是钓鱼城得以坚守三十多年的重要保障。



一字城墙复原图

那么，传说中的一字城墙、水军码头是否存在？它又是如何有效地抗击蒙军的屡次进犯的呢？2008年的一次意外发现，使得钓鱼城南的一字城墙和水军码头浮出了嘉陵江。

袁东山：2008年，重庆有一个叫草街航电枢纽的重点工程，这个工程会把嘉陵江的水位提升20米，相当于每年最大的洪水的高层。钓鱼城附近江面每年的枯洪差，大概是18米左右。20米的提升会高出正常的枯洪差1米到2米，这对钓鱼城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重庆市考古所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最后进行了一些“揭露”。常规的考古叫“发掘”，我们在这个地方使用了一个有点特色的词叫“揭露”，因为钓鱼城是个国宝，它的核心资源就是抗蒙的东西。它作为一个江城，不仅有山城，还应该有水城。我们当时就想找到它的水城，于是从传说中的南一字城开始勘查。

南一字城逐渐被揭开，这个深入江畔的城墙依靠峭壁，北高南低，长达400多米，残墙平均高5米。这个看起来不过是用一堆石头垒起的线型城墙，在过去的冷兵器时代，却能起到控制嘉陵江防线的重要作用。

袁东山：一字城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作为钓鱼城的外围防线，它跟嘉陵江和这个峭壁形成一个封闭体；第二个功能是，它的顶面是一个通道。

王鲁湘：是个马道。

袁东山：对，一旦有战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出兵的快速通道。其

实，这场战争之所以能打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粮草集中。也就是说，在战前，它能把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甚至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住，然后顺江而下，把辎重粮草全部顺着这个码头运进来。

一字城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钓鱼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因为伸入江边的城墙，其实还兼备了进攻功能。在一字城墙靠近峭壁的地方，还有一个飞檐洞。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南宋的一员猛将王坚负责守城，他训练自己手下的敢死队借助一字城和一字城下面的飞檐洞屡次偷袭蒙军。



钓鱼城飞檐洞

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进行，钓鱼城的防御系统逐渐清晰，从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它有一南一北两个一字城，南一字城墙旁边还设有水军码头。通过钓鱼城的这套军事系统，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所谓的“坚壁清野”战略，以及攻防相结合的战术。该城有两重防御，它外围的巨大防线就是南一字城、北一字城，这两座城形成了一个10平方公里的巨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般的小规模战争是没法突破的，因为有金城汤匙。如果敌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宋军就放弃外围，把所有的物资收到山城。钓鱼城还跟前援的其他城形成了整体攻防，跟后援的重庆城又形成了整体性的互相增援。所以在这场战争中，它不光是被动的防守，还利用战争的空闲机会积极主动地开展小规模的进攻和骚扰。

三、上帝折鞭

王鲁湘：在十三世纪的历史上，蒙古汗国的军队是一支震撼世界的可怕力量，它三次西征，横扫千军如卷席，使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四十多个国家，在其铁蹄下呻吟挣扎。罗马教皇曾惊呼这是“上帝的罚罪之鞭”，这条上帝之鞭不可一世，它指向哪里，哪里就“粉身碎骨，灰飞烟灭”。然而，这支常胜之师，却被阻挡在钓鱼城下，屡战屡败，损兵折将，不得寸进。

因为坚持守城36年之久，钓鱼城成为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这个传奇中最重要的一项，要从蒙哥大汗死在钓鱼城说起。蒙哥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率兵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以骁勇善战著称。公元1252年，43岁的蒙哥被推举为大汗。几年后，蒙哥因四川战事的不甚明朗而御驾亲征。1259年初，蒙哥大汗亲自带兵从四川主战场南下，试图与忽必烈率领的军队会合，直取东南夺取南宋政权。然而之后所发生的意外，却无意中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进程！

孙华：史书记载，蒙哥说话很少、很精炼，为人很稳重，经常沉思，下决定也很果断。



蒙哥像

但是他在攻打四川的时候，却没有听取有些大臣的意见。当他在钓鱼城下受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大将给他进言，说钓鱼城奇险，非常难攻，不如舍弃它直接东下，派支军队进行骚扰就是了。只要东下夺取了临安，南宋政权覆灭，钓鱼城自然不战而降。但这个大将的进言受到了其他大将的否定，他们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示：要夺取全国，却连一个钓鱼城都征服不了，怎么能显示大元的武力？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舍钓鱼

城而下，蒙哥觉得后一种意见是有胆略的意见，便听从了这种意见。

王鲁湘：因为他们在全世界所向披靡，已经太自信了。

在蒙哥的带领下，蒙古精锐之师势在必得，这一次他们攻克了钓鱼城的第一道防线，直击钓鱼城的护国门一带，但是钓鱼城的军民却誓死守卫第二道防线。

袁东山：蒙古人对第二道防线久攻不下，就采取了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地突法，就是从地下突击，挖地道。他们挖过了钓鱼城的第二道城墙，最后攻进来了。可钓鱼城的军民也很勇猛，你蒙军挖地道，我就挖个大坑等着你，你进来以后就让你摔到大坑里边，然后反攻，就把蒙古人打了出去。打出去以后，就对那个地道进行了回填。当时钓鱼城山上最多的物资就是垒石，直径大概30公分。我们考古所在清理过程中清理了35米全部是垒石塞填的地道。

1259年的夏天，重庆地区又到了潮湿多雨的季节，御驾亲征的蒙哥大汗已经被钓鱼城拖住几个月了，他未曾料想，这样一个弹丸小城，竟困住了自己精锐部队的铁骑。由于攻城心切，蒙哥亲临钓鱼城北一字城对面的脑顶坪督战，没想到却中了宋军猛将王坚部队的伏击！

王鲁湘：前面就是钓鱼城东南的脑顶山吧，当时蒙哥率元军占领了这个山头。从钓鱼城这边到脑顶坪大概有多远？

刘智：大概有200米。

王鲁湘：当时宋代的抛石机能打多远？

刘智：我请教过社科院考古所的杨洪先生，他是专门研究中国兵器史的。他做了个试验发现，抛石机最远能打400米。

王鲁湘：那这个蒙哥的胆子也太大了一点，作为蒙军的皇帝和最高统帅，他居然敢到这么近的距离来。

刘智：可能因为夏天潮热，又久攻不下，所以他心情急躁，想亲自督战。而王坚又经常去激他，老把鲜鱼、面饼抛下山去，这相当于告诉蒙哥军队：你再围困我多少年，我都顶得住，我上面有吃的，还有鲜鱼、饼。

王鲁湘：这是心理战。

袁东山：蒙古人从2月份开始攻城，到那时候大概已经4个月了吧。

一个在欧亚大陆攻城灭国所向无敌的人，却遇到了钓鱼城这个史上最牛的钉子户。蒙哥做梦也没想到：蒙古军身经百战，却在钓鱼城折兵损将。当然，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也会命丧钓鱼城！

传说脑顶坪一战，蒙哥中了宋军的飞弹，最后死在军营。因为蒙哥的死，历史在此拐了一个弯。当时奉命西征欧洲中亚的军队统帅、南征大理和交趾的将领以及正在长江中游与宋军鏖战的忽必烈大军，都匆忙停下战事，不远千里，赶回大漠参加蒙哥葬礼并争夺大汗之位。

孙华：正在西亚远征并已经打到意大利的这支军队，本来是可以一鼓作气拿下埃及的。听到了蒙哥的死讯后，主力马上就后撤了，想回去争夺大汗的位置。忽必烈听到这个消息后，先是犹豫了一下，他想如果我听到消息就立刻回退，有损于声望，所以他还是先下江南。

王鲁湘：先立一功再说。

孙华：忽必烈先打垮了宋朝在长江中游的最大的一支军队，然后就急着开走了。所以蒙哥之战对西征军来说，结束了西征军的使命，保卫了阿拉伯世界；对正在灭宋的南征军队来说，这一战也暂停了他们的任务。他们都回去争夺汗位了，这使得南宋得以苟延残喘。



“上帝折鞭”组合图

正是因为钓鱼城所取得的战绩，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

胁，也延缓了南宋王朝的灭亡，钓鱼城因此被赋予了“上帝折鞭处”的美名。

然而，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此时的钓鱼城已经成了一座抵抗蒙军的孤城，还在守城的将领王立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是弃还是守？在一个叫熊耳的女人的斡旋下，王立只得做了一个现实的选择。

孙华：南宋的首都临安被蒙军攻克以后，这个时候的坚守实际上已经到了尾声。在最后的坚守时期，四川的山城一个一个地陷落，甚至连后方重庆也都被包围了。这个时候怎么结束战事？有两种选择：一是投降，一是抵抗到底。在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可能会很排斥熊耳、王立，认为他们是汉奸。不过，后来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说这个时候钓鱼城已经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城里的粮食已经没有了，坚守下去徒留象征意义。为了保全全城10多万军民的生命而去投降，这是非常人性的做法，是可以被谅解的。

1279年，钓鱼城将领王立见南宋大势已去，为了保存10万军民的性命，忍辱递上了一纸投降书。钓鱼城36年抗蒙守城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

汩汩嘉陵江日夜奔流不息，“独钓中原”的钓鱼城青史留名。

故宫大修

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旧称紫禁城，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这里曾居住过24个皇帝，是明清两代（公元1368～1911年）的皇宫，现辟为“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建筑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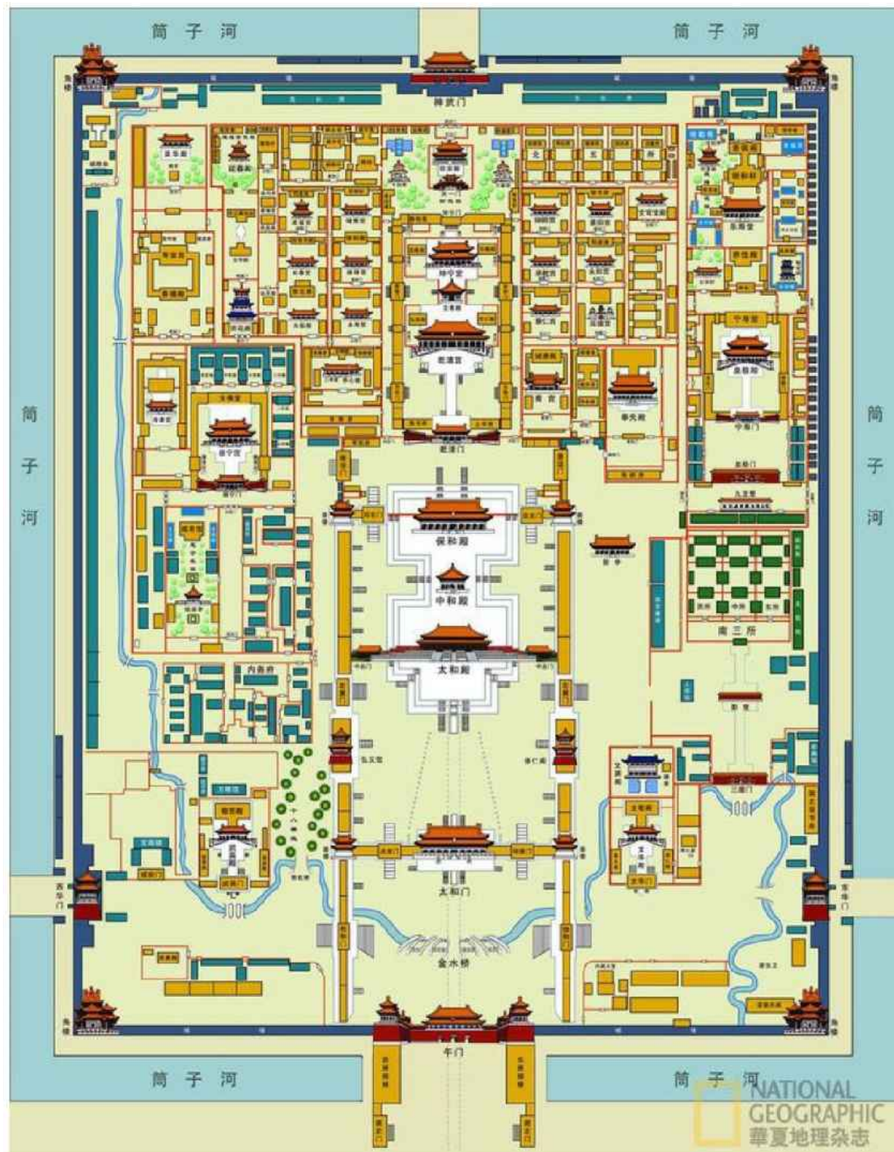
故宫全部建筑由“前朝”与“后寝”两部分组成，四面环有高10米的城墙，城墙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城外有一条宽52米、长3800米的护城河环绕，构成完整的防卫系统。其总体布局为中轴对称，布局严谨，秩序井然，寸砖片瓦皆遵循着封建等级礼制，映现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

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宏图霸业，都消失在历史的云烟深处，惟余这座曾经不可一世、富丽堂皇的皇城，孤独地横卧在夕阳下，凄凄诉说着注定要被遗忘的前尘往事。

一、故宫的格局

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前通天安门，后倚景山，东近王府井街市，西临中南海。总体分为南部的“前朝”和北部的“后寝”两部分。南部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中心，两侧辅以文华、武英两殿，是皇帝上朝接受朝贺、接见群臣和举行大型典礼的地方。

北半部则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及东、西六宫和御花园为中心，其外东侧有奉先殿、皇极殿等，西侧有养心殿、雨花阁、慈宁宫等，是皇帝与后妃、皇子和公主们居住、举行祭祀和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



故宫结构图

王鲁湘：故宫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古建筑群，这个建筑群有多大的规模？

晋宏逵[67]：从护城河的外围算起，它的占地面积应该是100万平方米。

王鲁湘：人们都说故宫的房子多，进到故宫里头最主要的事就是数房子，数着数着就数迷糊了。有人说，故宫有9999间房子，这个说法是

真的吗？还只是民间传说？

晋宏逵：这恐怕是民间的传闻。故宫从建成到现在一直处在不停地变化中，从明到清延续将近500年，它的房子有新建的，也有拆除的，怎么会有这么整齐的9999这样的数字呢？

王鲁湘：估计是民间认为故宫是皇上所在的地方，就给他个吉数，说一万好像不太好，就说9999。

晋宏逵：说一万太满了。

王鲁湘：刚才您说从护城河算起，这个长方形是100万平方米，那么从城墙算起是多少？

晋宏逵：应该是72万平方米。里面的建筑面积大概是14.06万或14.07万平方米的规模。护城河在最外围，宽度有52米宽，城墙东西750多米，南北960多米，是个长方形。城墙四周有四个门，南面正门是午门，东西是东西华门，北侧是神武门，明代叫宣武门，四个角有四个角楼，这样就和护城河一起构成了紫禁城的防御体系，这一块防御体系占总面积的将近三分之一。城墙内部可分为三大块，一是外朝，在中轴线的前半部分，也就是乾门的前面横街向南的部分。它两侧的两个轴线上，东侧轴线上是文华殿，西侧是武英殿，这就构成了外朝的全部。外朝的北侧，这个凹字形的部分，就是它的内庭。

王鲁湘：这是个“负阴抱阳”[68]的格局。

晋宏逵：这块看起来比较密集，怎么认识它？我觉得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分块。它既然是一个城，就有街道。四条长街把紫禁城从纵轴线分成五块。中轴的前半是常说的后三宫，就是乾清宫，坤宁宫和它中间的交泰殿；它的左右就是东西六宫，东西六宫的前端各有一个重要建筑，这边是诚肃殿和斋宫，那边是著名的养心殿。西六宫的外侧是太后们住的地方，最前面的是慈宁宫，慈宁宫的旁边是寿康宫。

王鲁湘：俗称寡妇殿。

晋宏逵：在世皇帝的女长辈和她的服务人员都在这个慈宁宫。寿康宫北边是寿安宫，最角上是英华殿，英华殿本是万历皇帝母亲的居所，她号称自己是九莲菩萨，里面有她手植的一棵树。英华殿东侧就是著名

的太上皇宫殿，它的样式像一个缩小的紫禁城，同样有外朝后寝、花园，以及东西两侧的建筑，也分成东西两个轴线。它前面是一个很大格局的宫殿，后面也分成三路，其中一路的西侧就是著名的乾隆花园。

王鲁湘：这是乾隆为自己太上皇的生活预备的。

晋宏逵：他在登基以后，觉得自己执政的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康熙在位不到62年吧，所以他说，到60岁我一定要归政，把这个位置传给儿子。他到哪住呢，不能住在皇宫，皇宫给他儿子住了，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宫殿，叫太上皇宫殿。里面所有地方的命名都围绕着长寿、退政的主题。

王鲁湘：皇帝办公的地方叫勤政殿，要勤劳；退了以后就倦勤，该休息了。

晋宏逵：另外在宫城的外侧，围着城墙的北、东、西三个角，有大量的灰顶房子，这就是从明代开始为皇宫服务的那些最核心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贴着西墙甚至还有酿酒的、做买卖的。另外还有一个事：这么多皇子都到哪住呢？

王鲁湘：就是那一大堆阿哥、公主。

晋宏逵：所以在乾清宫的后面、东西六宫的北侧，还有三块留下来了，叫前东西五所。前西五所从明代开始就是皇子们居住的地方。后来乾隆曾经住在里面，他当皇帝以后，他居住的地方就不能让一般的皇子再居住了，所以把这个所升格为宫，叫重华宫，这里的漱芳斋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

王鲁湘：我原先以为皇子们跟他们的妈妈住到一起，然后太子就住到东宫这边，原来不是这样的。

晋宏逵：东宫实际上就是文华殿，因为太后在东边住，皇帝为了每天去看他妈妈比较方便，于是就把文华殿当便殿了，所以他把文华殿旁边的偏殿当做教育的地方。

王鲁湘：武英殿就是修书的地方。

晋宏逵：武英殿修书是从康熙开始的，最初它是很重要的地方。武英殿后边还有一个殿俗称白虎殿，永乐皇帝停陵就在白虎殿，明代皇帝

后来基本上都到这里来停陵，还有一个就是景山。关于武英殿还有两个大事，一是李自成进北京后，建立大顺政权，就是在武英殿宣布登基；第二个就是多尔衮入关以后，执政的地方也是在武英殿。

王鲁湘：文华殿北边就是放四库全书的地方，叫文渊阁是吧。

晋宏逵：对，这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专门为了藏四库全书建的。样式是仿照天一阁的，六间嘛。

王鲁湘：上层是打通的，象征“天一”，下面六间，象征“地六”——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69]。

晋宏逵：这是它的一个文化建设。刚才说到武英殿作为修书处是康熙时候的事情，这是文化建设当中的一件盛事，从那开始，很多宫廷版的书都是从武英殿印出来的，所以我们故宫藏品中还有一批殿版。

王鲁湘：很奇怪，左文右武啊，白虎殿是主兵主刑杀的地方，修书的这种事情应该放到东边，为什么放到武英殿修书呢？

晋宏逵：这个我没有研究过。我觉得恐怕是明代后期那地方就已经有一些文化活动，白虎殿到清代的时候成了内务府、造办处。而且明代的时候，就有一些宫廷画家在里边作画，所以这个文化传统大概就这样延续下来了。

二、故宫的营建



明紫禁城复原图

1407年，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下诏，在元大都旧址上修建北京城以及它的心脏——紫禁城皇宫。整个工程持续到1420年，其建造的恢弘场面可能连我们的想象力也无法重现。

然而在1421年，宫殿建成仅仅几个月之后，作为紫禁城核心的三大殿就被一场雷火摧毁了。此后的几个世纪，这座皇家宫殿，由于自然灾害、人为过失或皇朝更替等原因，曾多次被毁坏，也多次被重建和改建。直到清代乾隆皇帝大规模改建之后，这座伴随了中国第一家族几个世纪的伟大宫殿，才形成了今天故宫的规模和格局。

王鲁湘：这个故宫是从永乐年间修的，元大都的宫殿已经没有了。

晋宏逵：元大都的宫殿在学术上也是个谜，洪武年间到底拆没拆毁，历史文献的记载并不是很清楚。

王鲁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为了镇压前朝的王气，新王朝就会把前朝主要的宫殿毁掉。当时明军占了北京以后，就把元大都毁了，特别是元大都主要的宫殿，都给毁了。景山的土堆子下面那个地方，就是元大殿的位置，是这样吗？

晋宏逵：有这个说法，而且从地理位置以及考古勘探上看，应该是那个位置。

王鲁湘：整个元大都比明清的北京城好像往北退出去有一环，现在北京城的城墙正好在二环，元大都最北边城墙的土城，是在二环到三环之间。

晋宏逵：那个土城的遗迹还在，土城的那个位置离明清的北城墙有五华里。这是当初刚刚打下元大都以后，徐达看到北城太空旷了，所以把城墙往南退了五华里。

王鲁湘：当时也是出于防御目的。往后退，跟城中心就更近一些。

晋宏逵：因此，明初的京城比元大都缩小了，城门的名称还延续元大都的名称，只有北边的，因为城墙改了，所以改“安贞”、“健德”二门为“得胜”和“安定”，南侧的都没有动。到明成祖重建北京城的时候，才把南墙向南推了将近一华里多吧，相当于现在从长安街到前门的距离。



永乐大帝像

王鲁湘：推过去整整一个广场的宽度，实际上等于整个紫禁城也往南移了。

晋宏逵：有的学术著作推断，现在太和殿正脊的下边，就应该是元朝大内的南沿。

王鲁湘：元代紫禁城午门的位置，就是现在我们故宫太和殿正脊的下端。现在的故宫是永乐皇帝1406年下召建的吧？

晋宏逵：对它的始建年代有两个算法，当时史录上对永乐建城的记载很不完善。实际上，永乐在1406只是下诏明年五月建城，但到了第二年，从记载上看，虽然已经开始准备，派人到四方采木，沿着运河送到北京，还有烧砖等，但是始终没有见到建紫禁城的记载。一直拖到了永乐14年前后，他才在北京建了一个西宫，他当时的理由是说，他每次从南京到北京来都只能“御旧宫”，也就是说，只能到他原来的燕王府里居住。由此来看，那时紫禁城还没建好。

王鲁湘：燕王府在哪个位置？

晋宏逵：这也是一个疑问，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现在的故宫，还有观点认为燕王府本身就在元大内的太子宫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北海、中南海一带。一东一西两个说法大家都在争论，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王鲁湘：明朝从洪武到永乐，经过那么多年的战争[70]以后，民生凋敝，各个地方都急需休养生息，可是明初的时候建了三个都城，一个是定都南京时在南京大兴土木，再一个是在凤阳按照都城的规模建城，然后就是永乐年间又在北京按照当年南京和凤阳的宫殿规模建了故宫，这么大的土木建设，耗费的民力肯定相当巨大。

晋宏逵：当时民工和军工他全用，你看明初的档案实录里面，经常有各卫所的负责人向皇帝反应，军人被占用的太苦了，不停地修这修那，成劳役了。在北边战事不断的情况下，还动员士卒参与修建。由大家不停地为军请命这个情况，可以看到当时劳动力的匮乏情况。

王鲁湘：这是因为几十年的战争死的人太多了。当时的工匠是哪个地方的？

晋宏逵：工匠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征发的。但是从南京、北京、山西、江苏这些地方征发的比较多，因为那里算是当时比较发达的地方吧。有些记载提到，甚至交趾地区有一技之长的人，也都被征到了南京。他们会不会到北京不敢确定，但我觉得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南京有工程就在南京干，北京有工程就到北京来了。

王鲁湘：而且是熟练工了。

晋宏逵：当时人家说需要的就是这些特殊工种，包括写字写的好的

都到北京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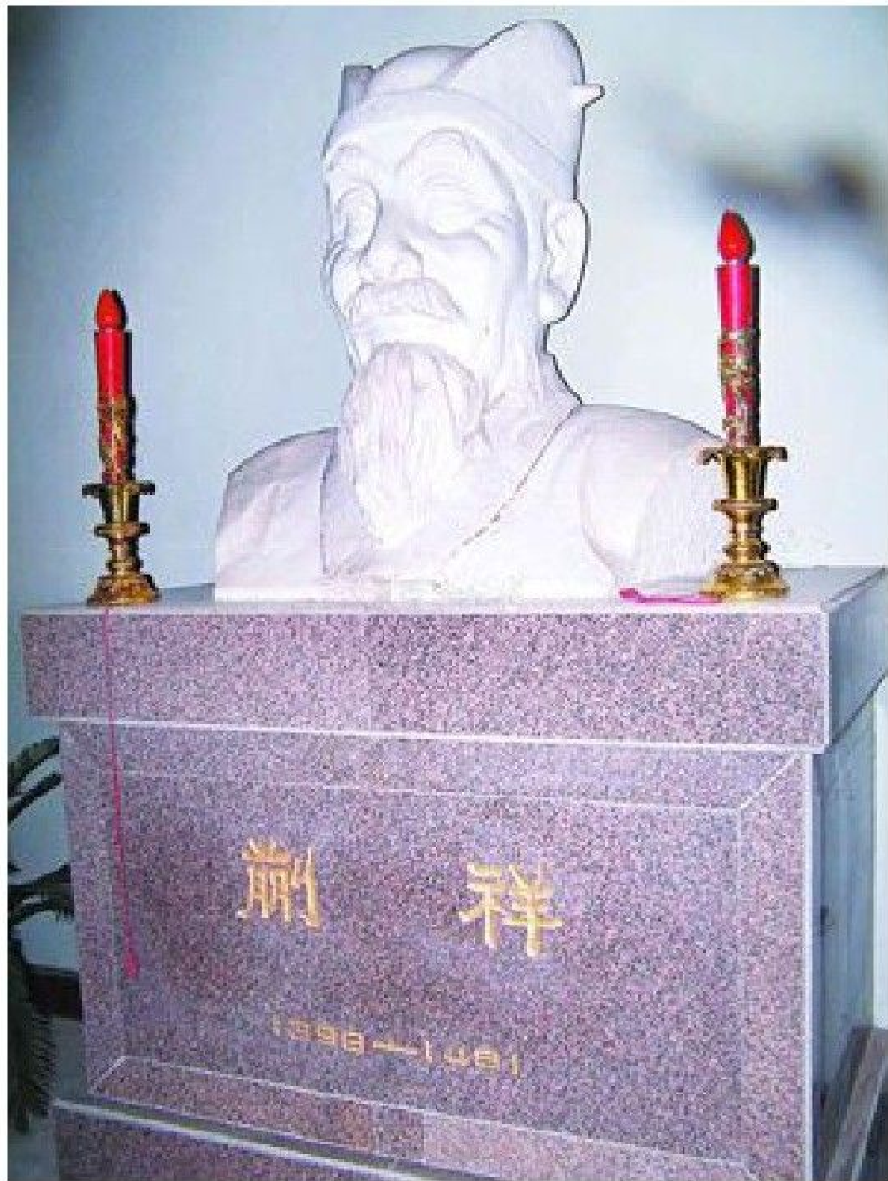
王鲁湘：我在中华门上看到很多砖上都刻了工匠的名字和家乡，北京城是不是这样的？

晋宏逵：北京没有那么多的砖文记载，文字记载也很缺乏，很难说清楚哪个工匠是从哪来的，但对那些指挥者还是有记载的。在明代，工匠干得特别好可以当官，就是“干而优则仕”。

王鲁湘：至少能当个负责工程方面的官。

晋宏逵：有的能当上工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工程部副部长了。

王鲁湘：有一种说法，说当时主要建筑的技工活是“香山帮”干的，香山代指苏州，因为它位于苏州太湖之滨。苏州人在这里干主要的技术活，是这样吗？



蒯祥塑像

晋宏逵：香山那边比较出名的工匠就是蒯祥，“香山帮”是不是以他为主的工匠队伍，这个不好说。但我觉得，从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北京城的建筑艺术、布局等等，肯定受了南京的影响。但是往更深处说，最初的原型应该是中都凤阳城。凤阳的石雕之类到现在为止都是最精美的。

王鲁湘：实际上还是以凤阳都城为蓝本，然后把它移到北京来。我

们在苏州还能看到蒯祥的墓，他最后也封了官吧。

晋宏逵：他做到工部侍郎。到正统[71]的时候，中央财政匮乏，有人提出意见说封的工部的官太滥了，副部长好几个，就把他们都拉下来了，变成了营缮所的所正，好像是正七品。等这阵风过去以后，他们又官复原职了。

王鲁湘：说到蒯祥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大规模的都城建设，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建设设计院，甚至有首都规划委，有几百上千号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做着规划和设计的工作，而且会有一个建筑的总规划师，当时有没有一个总建筑师、总设计师的职务？款祥是不是这样一个人？

晋宏逵：还不是，当时没有这个职务。当然从行政的序列来讲，工部官员负责这个事。当时有一个叫蔡信的人，对整个规划恐怕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没有什么明确记载，那时好像也没有总设计师这个概念。

王鲁湘：那蒯祥是做什么的呢？

晋宏逵：他是木工。

王鲁湘：过去老百姓建房子，不需要建筑师，也不需要先出图纸，木工就是一个设计师。建什么样的尺寸，用什么材料，都是他说了算，其他的泥瓦匠都是跟着他走的。蒯祥是不是下线的主要工头，有一点类似于现在的建筑师。

晋宏逵：蒯祥的作用肯定很大，但是从《营造法式》的记载来看，放线做地盘是第一道工序，也是现场最大的第一道工程，做这种工作的应该不是木工，而是另有其人，只是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有传的、载入史籍的或者为一些文人笔记所涉及的，都是那些后来当了官的人。

王鲁湘：还有一种说法，故宫的总设计师是个交趾人，姓阮。



紫禁城图谱

晋宏逵：他叫阮安，是一个太监。据说这个人有规划和策划能力，主要工作是在正统年间完善北京城的建设，修北京九门。当时永乐虽然把北京城的规模定下来了，但城门楼还没有完成，另外，城外、城壕上的桥还都是木头桥。于是，做了工部负责人的蔡信放话：要做这个事，

非十八万人不可。阮元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就利用过去积累的建筑材料来建城楼，而且不征调民夫，只用了在京师的万余名士卒。这在当时得到了很大的称赞。阮元写过一本有关他主持的工程的书，很可惜的是，由于他是个太监，司礼监的太监不赞成他出版，所以这本书就散失了。

王鲁湘：我看过一张图，上面画着整个紫禁城，旁边站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和紫禁城的建设有关？

晋宏逵：那张图好像有三种版本，其中比较完整的可能在南京博物院吧。画中的人应该是蒯祥，穿大红袍的，画上方好像有提文。

王鲁湘：这些东西应该有一个规划图或者示意性的图纸，要不然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协调呢？像北京故宫中轴线上的前朝后寝几大殿，那么大的规模，总得有一个图，大家拿着这个图才能分头做自己的工作呀。

晋宏逵：肯定有人协调，但是现在没有资料记载了，我们用已知的信息往回推，会对解决这个问题有点帮助。在清代，尤其清中晚期，故宫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设计家族，世代负责皇宫建筑的设计。当时皇宫的造办处有一个算房，有一个样房，算房专门做预算，样房则专门做设计，它的设计包括图纸和烫样两种设计成果。

王鲁湘：烫样类似于建筑的蓝纸？

晋宏逵：烫样不是蓝图，是模型。他有一个平面图，叫做丈尺，就是咱们说的放线的图，是木头的。作为最大的甲方，皇帝需要清楚地知道修建之后的效果，因此需要直观地按照一定的比例尺把要建设的宫殿做成建筑模型给皇帝看。这个模型是以纸板为主做出来的，但是要做出瓦楞的形象来，怎么办呢？据说要用烙铁烫出来，所以叫烫样。烫样的屋顶可以揭开，揭开以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装修，烫样的内部，也要做得很详细。

王鲁湘：这个样式家族是不是“样式雷”？

晋宏逵：传承时间最长的就是样式雷家族，这都比较有名了。但是我说从这往回推，在明代有没有这样的工作，文献记载上是找不到的。我们只能从那时官员的名单中推测谁做了这些工作，因为据《明史》中臣子们的传记里记载，有些人是营造过长陵的，有些人是营造过宫殿的。

王鲁湘：从永乐年间开始一直到明代灭亡，这200多年间，整个北京城是不是也在不断进行建设？

晋宏逵：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永乐年间，城市的建设一度停顿，然后三大殿又着火了。着火了以后，洪熙和宣德[72]两朝又一度把北京称为行在，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首都，以后有可能再回南京。到正统的时候，英宗才决心把这当首都，继续完善建设，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高潮。到嘉靖32年的时候，蒙古的势力不断地往这边侵扰，嘉靖帝只好建外城，继续保卫北京，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外城。本来嘉靖想做一个方的围墙，把北京从回字变成三重城墙。但是，当时只建了南墙就没有钱了，只好将南墙的东、西两端向北弯折，与内城的东南、西南两座角楼会合，这就形成了北京城的凸字形。外城建完以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告一段落，城市的范围之类就都确定下来了。

王鲁湘：嘉靖的时候可能钱和银子还多一点，万历以后突然又没钱了。

晋宏逵：整个明代已经走下坡路了。

三、故宫建筑理念

故宫宫殿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抑扬顿挫一气贯通了整个城市，气魄宏伟，规划严整，极为壮观。它的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突出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

王鲁湘：故宫是一座建筑。在西方，建筑被誉为第一艺术，在我们中国，建筑没有被摆到这么高的位置。但事实上，从周代开始，都城的营造一直是严格按照礼仪来做的，真正完整地体现《周礼》上关于都城建设的礼制和规矩的，应该就是紫禁城吧。

晋宏逵：应该是元大都。元大都是最完整地体现《周礼》关于都城建设描述的，《周礼·考工记》所说“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些规定，元大都都体现了。

王鲁湘：还有“前朝后室”，后来紫禁城的室是在南边，元大都的时候室是在鼓楼、什刹海这一带，所以更典型一点。明清紫禁城的建筑，从整个的平面布局看，应该是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经典代表作。

晋宏逵：紫禁城的建筑价值应该怎么评价，我自己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紫禁城的建设是和整个京城建设相统一的，二者使用同一条中轴线，这种成就应该是世界唯一吧。

王鲁湘：我看过一些资料，这条气势磅礴的中轴线，应该是全世界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唯一的一条。

晋宏逵：7.5公里长的一条中轴线，整个紫禁城又坐落在中轴线上的黄金段落，在这个黄金段落中突出的也是这条中轴线。在一个城市当中，有这么高度的统一，同时又把都城的建设和自己的统治核心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王鲁湘：圈中套圈，再套圈，循环往复。

晋宏逵：紫禁城外面有一圈皇城，皇城里边全都是为紫禁城服务的

衙属机构，以及太监们办公生活的区域，外人是进不来的。

王鲁湘：我们现在说的皇城根，就是当时皇城的城墙。

晋宏逵：南侧集中安排的是六部衙门，五军都督府，还有一些总管，相当于外交部门。皇城的左右两侧，左祖右社，这样皇帝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非常方便，而且联系非常紧密。里边的这些坛庙，都是统一的布局，南边是天，北边是地，东边是日，西边是月。所以我想故宫的第一个价值，应该是和北京布局的统一。

王鲁湘：北京市的整个平面布局，就是当时中国人宇宙观的平面化表现。



太和殿内景

晋宏逵：紫禁城的命名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天上的星空分为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是帝王的所居，而紫禁城就是紫微垣在地上的投影。紫禁城内部，采取中国传统的院落式布局，而且布局得十分巧妙，很有秩序。不管咱们说它有千间房也好，一万间房也好，八千房也好，这些房总要按一定的秩序排列起来，换句话说，你找门牌总

要有门牌号吧。它是怎么安排的呢？它的前朝部分特别疏朗，你看前三殿建筑，是整个北京市最雄伟的建筑，甚至于是中国古代建筑当中最大的建筑，明代的太和殿比现在的还要大，至少用材料用的很多。

王鲁湘：明代的叫皇极殿。

晋宏逵：明代皇极殿是九间啊，现在的太和殿是11间，因为找不到那么大的木头了，所以整个体积缩小了。

王鲁湘：在明清两朝的500多年里，紫禁城的屋脊是不是北京最高的屋脊？

晋宏逵：紫禁城不是。紫禁城的太和殿是最高大的，但它不是最高的。

王鲁湘：那些城门楼子会高过它吗？

晋宏逵：城门楼子没有高过它。景山五亭建成后是最高的，白塔寺的塔也可能比它高，但它应该是最高大的了。它的北边就是东西六宫，皇帝自己家庭的所在地。那些房子千门万户，却是按一定顺序排列的，有人用众星捧月来比喻后庭与前朝的关系。再具体地从建筑空间艺术角度来看，当时由前门进城，前门之后是大明门，大明门之后是天安门，大明门天安门之间有千步廊，是很低矮很平缓的，但是拉的距离很长。到天安门前头，这个千步廊变成了丁字形，道路突然横宽了，凸显出天安门的高大，然后再到端门，又过了一个关才看见午门，午门又恰恰是一个凸字形的布局，人走在里面肯定感觉渺小，更凸现天子宫殿的伟大。

王鲁湘：几年前我来故宫的时候，沿着这条中轴线走了一遍，体验当年外官进京见皇帝的那种心理感觉。我感觉故宫就是一个平面压缩的金字塔，从永定门进来以后就到了金字塔底下，然后一直往里头走，每过一道门等于上一个大的台阶。等到了太和殿的时候，实际上是到金字塔的顶端了，人走了这么远的路，腿也开始累了，膝盖也开始软了，到了太和殿门前的时候，感到不跪也得跪下了。

晋宏逵：但是在整个明清，能够有幸看到太和殿的没几个人。一般的官员是没有资格进到太和门的，只有相当级别的人才能进，进也只能进到太和殿的丹墀上，进屋不太可能。由此而看，故宫具有很高明的空

间布局艺术。另外，从规划布局上看，故宫的设计有条不紊，它要表现封建的社会秩序，等级制度和皇权至上，所以萧何那会儿就讲了很著名的一句话。

王鲁湘：刘邦很生气地问他，你怎么这么浪费啊，建这么大的宫殿干什么？

晋宏逵：人家萧何就说了："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最高最大，后代人都没法超过。这个思想一直延续下来了，成为宫殿建筑的一个主调。

王鲁湘：而且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这条中轴线一直到清朝都没有什么树木，特别是太和殿前面这么大一个广场，一棵树木也没有。这也是要表现一种皇权至上的概念，因为一旦有了树木，就有了一种很自由的感觉，那种很威严、很秩序的感觉就没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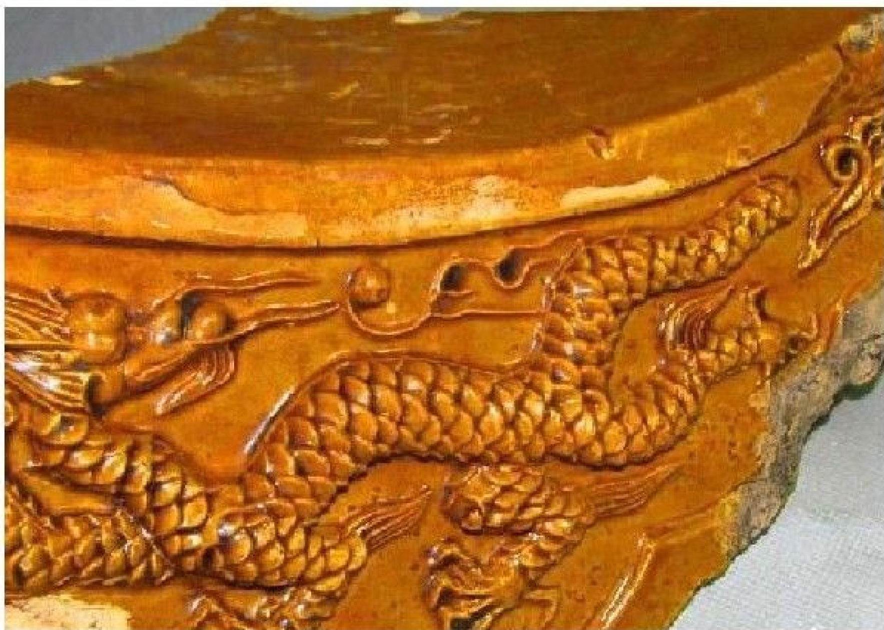
晋宏逵：前朝的部分都是很规整的线条，很直的。

王鲁湘：到了后寝，到他自己家里头的时候，花木复苏，御花园各种庭院里面各种各样的树木就有了，这体现的是一个亲切的人的尺度。

晋宏逵：另外，他调动很多建筑艺术的手法突出皇权的主题。比如说屋顶都是黄的，屋身全是红的，台阶全是灰的或者白的，高度统一。高度统一就意味着单调啊，所以他在屋顶和屋身之间加了彩花，而且是以青绿色为主。你再去看紫禁城的很多细部，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同样是琉璃瓦，有黄色有绿色，而琉璃瓦屋脊上的兽，它的数目要表现等级制度，表现级别，最高级的建筑数目最多，最低级的建筑数目最少，它那些影壁、琉璃门上面的花纹又都非常活泼。



故宫绿色琉璃瓦残片



故宫黄色琉璃瓦残片

王鲁湘：而且为了突出紫禁城这一片，北京城其他地方都不能用黄色琉璃瓦。所以当时要是从上空俯瞰的话，整个北京城就是一个灰调

子，在灰调子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金光灿烂的紫禁城。

晋宏逵：你这个描述非常准确。整个北京城是在封建制度下的高度统一。高度统一作为封建制度应该被否定，但在建筑艺术上应该被肯定。

王鲁湘：这是一种很高级的艺术。在古代，黄是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的最明亮的色彩。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故宫的墙面是朱红，屋面是金黄，两个都是暖色调。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个和五行有关，墙面的红色是火，屋面的黄色是土，火生土。

晋宏逵：这个我倒没考虑过，我只能说这个现象，大概从金代就形成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喜好，秦始皇喜好的是黑，唐代的墙大概是青白色的，到金代以后，就是红墙，白台阶，黄瓦，至于根据什么确定的，这我还真没有研究过。

王鲁湘：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在皇城的建筑上还是遵循着阴阳五行的法则。

晋宏逵：金朝中都的建设是学习了宋代汴梁城的设计，宋代也有他的来源。总之，我虽然没有研究过这个事，但我觉得，皇家建筑肯定有它的传承，也肯定有它的讲究。

王鲁湘：这里面都包含着几个核心的文化价值理念。首先就是中，中国从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有了中的概念，这也就等于有了关于核心的概念，紫禁城中轴线加上这样一个长方形的框就是一个中字，天下之中在这个地方。然后是三大殿从天上看像一个土字，土居天下之中[73]，这又是一个中的概念。今天我们看沙盘的时候又突然发现，前朝与后寝正好是“负阴抱阳”，阴阳交泰[74]了，所以乾清宫和坤宁宫中间过渡性的一个宫，就叫交泰殿。很多年以前，我仔细数过紫禁城城墙上的几个主要建筑的屋脊，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是360个。

晋宏逵：这个我还没数过。

王鲁湘：360是个天数，一周天[75]。四个角楼，每个角楼是28个，象征天上的28宿。我觉得，里头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平面的形状，都有中国文化的意蕴在中间。

晋宏逵：现在问题就是，文献当中对这些东西很少有记载，所以只能作为推测。如果我们的推测和事实相符的话，这种推测也能自成一说了。

王鲁湘：反正从中国文化中间能找到一个说法。

作为天子的居所，紫禁城除了表现森严神圣的皇权和等级，自然也是皇帝一家的宅院。所以，与前朝的威严刚毅相对，内庭的一切布置和设计，都是为这个大家族的衣食住行服务的。

晋宏逵：他调动这么多技术，有突出的主题，有突出的轴线，有严谨的规划，还有这么优美的室内和室外建筑设计，最后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圆满地实现这个建筑的各种功能。皇帝的礼仪活动场所是三大殿；他日常办公的地方有乾清宫，后面有养心殿；后妃住的地方有东西六宫；太后们住的地方有西边的慈宁宫；皇子们住的地方有南三所和东西五所；太子受教育的地方有文华殿。这么庞大的一个家族，这些人的心理，这些人的宗教活动、精神寄托怎么解决呢？所以宫内又有很多的道教宫观，也有一些佛教的寺院。

王鲁湘：包括喇嘛教的。



坤宁宫内景

晋宏逵：故宫博物院里头现在还有48处宗教活动场所。很珍贵的地方在于，它们从来没有被扰动过，一些佛像上还拴着当时地方进贡来的一些条幅，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进贡，给谁谁谁的，贡的是什么佛，这太珍贵了。

王鲁湘：清朝皇室又是满族，他们原始萨满教的东西也都有，比如在坤宁宫里头。

晋宏逵：萨满教都在坤宁宫，佛教和道教有延续明代的，也有他们自己新建的。

王鲁湘：明清两代中国第一家庭的世俗生活、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包括文艺生活，都可以在这个紫禁城里头解决了。

晋宏逵：统统得到满足。故宫里还有皇家出版社，也就是修书处。纪晓岚这些著名的文人都在里面上过班、编过书，这也是紫禁城一个很大的成就。

王鲁湘：所以从这一点上看的话，紫禁城绝不能单独理解成中国的最高行政中枢，它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庭各种各样生活的所在，还有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大的文化工程，也是在这个里头完成的。

晋宏逵：对。我们现在扯的这个话题，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紫禁城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去考虑它，怎么认识它的问题。

四、故宫的价值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第二年，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今天，人们来到这里，透过这些气势恢宏的建筑，看到的不仅是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心脏，也包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故宫代表中国进入了首批《世界遗产名录》，它的文化价值无可辩驳地得到了举世公认。

晋宏逵：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就在于它具有突出性、普遍性和世界性。也就是说，世界如果缺了它，文化就是不圆满的。紫禁城的文化价值是世界性的，那它到底包括哪些东西呢？一个是从实物角度看，它有宫殿建筑。它的宫殿建筑不单单是咱们说的600年历史，而是两千年，为什么？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历代王朝就在不断地进行皇宫建设，但留存到今天且唯一完整的皇宫建筑，就是故宫，所以它自身有600年历史，但延续了2000年的传统，它每一个地方都是传统的。

王鲁湘：您说的这个两千年，从秦始皇开始，可能还说短了。比如说景山，我过去一直不知道故宫后面这个山为什么叫景山，因为景山也可以理解为影山，影山可以作为屏风这种东西来理解。但看了偃师的商城遗址我才明白，商城遗址后面那个山就叫景山，可见其来源有多远。

晋宏逵：所以它的传统，有一些我们知道，有一些我们不知道；有一些文献有记载，有一些文献没有记载，可能是在地下流传的。但是作为一种传统，延续时间应该有几千年了。另一种实物，就是故宫所藏的150万件文物，这些文物从分类来讲是可移动文物，但这些可移动文物和其他可移动文物不一样，它不是到哪都可以摆的。因为它代表了中国皇家长期收藏的最后成果，它的东西看起来是清代的收藏，但是文献上说得很清楚，它照盘接受了明代的东西，明代这些东西是从元来的，元代是直接从南方拉过来的，所以它的东西是皇家收藏的直接延续，150万件文物的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

王鲁湘：说到这一点我就想，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博物馆，但是只有三个地方叫博物院，一个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一个是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个是南京的故宫博物院。这三个地方之所以称院，不称馆，

是因为院的级别好像比馆高一点，而它们之所以能够有资格称为院，恰恰是因为里头的收藏都是皇家收藏。



故宫博物院

晋宏逵：这得说说故宫文物的流失过程和辗转过程，它和抗日战争有直接关系。应该说，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和政府对于保护这笔中华民族的最珍贵遗产做了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当然，二战期间各国都在转移自己的文物，怕毁于战火，但故宫的转移延续了很长时间，辗转的路程大概是历史上最长的，这是欧洲各国没法比的。当时转移的故宫文物有13000多箱，还有当时的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这些地方的文物6000多箱，加一块将近两万箱文物，都运到四川，分三个地方保存。

王鲁湘：四川贵州。

晋宏逵：贵州的最后也回到了四川乐山一带保存。过了抗日战争之后，从四川又回到当时的政府所在地南京。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看到战局不利，就在正在北还的文物中选了一批运到了台湾，这批东西有档案，有图书，也有所谓的古物。当时的分布是这样的：古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都是以清宫旧藏为核心的。

王鲁湘：还有没运走的也回京了。

晋宏逵：北京故宫的文物还有建国以来收购的，还有一些考古发现的新东西，还有一批是大家不太重视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关于文物价值的概念局限在清宫旧藏和艺术品上，但我们现在是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认识这些东西的。

王鲁湘：那么凡是清宫使用的现在也是文物了。

晋宏逵：对啊。很多帝后不是书画家，他们画的东西艺术性很差，但是它反应了帝后的心路历程，那也是文物啊。这批东西，台湾应该是没有的，都留在北京了。把这些东西算在一起，再加上武英殿的那些书版，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共有150万件。南京博物院呢，它的藏品不是以故宫文物为核心的。

王鲁湘：它藏有一部分故宫南迁留下的东西。

晋宏逵：那不是它的主要藏品，另外，现在有十几家博物馆都叫博物院了。

王鲁湘：从收藏主体来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我们故宫这一边是切不断关系的。

晋宏逵：从藏品角度看，它们是一个整体；从哲学角度看，它们是一个系统；从文化内容看，它们同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

王鲁湘：我觉得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事情。刚才说到故宫的价值，说到它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延续，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没有故宫，整个东方文明，不管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一个重要的载体就没有了。

晋宏逵：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它在文化上到底有哪些价值？它代表了一种被中断的文明形式，它比较完整、生动地表达了这个制度。我们在里边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这是在书本上看不到的；可以体会很多东西，这也是在文献记载上找不到的。

王鲁湘：正因为如此，故宫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全体中国人的心。故宫发生的任何事情，马上会成为全世界所有华人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故宫的维修，自然也会引起全体中国人的高度关注。

五、故宫大修

2004年6月4日，紫禁城全面修缮工程正式拉开帷幕，这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近百年来，紫禁城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工程。总投资20亿元，历时19年的故宫大修，将被分为三个阶段：从2002年10月武英殿试点工程开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整个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将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并对公众开放。到2020年紫禁城建城600年之际，大修工程将全部结束，故宫也将重现历史上康乾盛世时的辉煌面貌。

毋庸置疑，2004年6月4日这一天，将作为故宫古建筑修缮史上的里程碑正式载入史册。

不得不修

王鲁湘：故宫的维修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晋宏逵：我们的理由主要是客观的，一个是有没有这种必要，一个是有没有这种可能。从它的必要性来看，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保护状态，有很多令人不满的地方。有两种力量使它不停地退化，一种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它受到风化、酸雨等一系列影响。故宫上的琉璃瓦，有破碎的，有脱釉的。釉一脱落，琉璃瓦就会和酸雨结合起来，从而变得很黑。乾清门那么亮的瓦上面全是黑色，这个看起来是很难受的。

王鲁湘：现在北京沙尘暴时的这种特别细微的灰土，已经不是明清时候的那个黄土了，它是一种里头含有很多腐蚀性化学物质的小黑土。

晋宏逵：反正瓦的损伤是非常明显的。当时我们的老院长形容过，如果站在景山上一看，脚下是一片金黄色的琉璃瓦的海洋，美极了。你现在再去看看，粗看还是海洋，如果稍微细一点来看，到处都是斑斑驳驳。这还只是从审美上说，从深处说，琉璃瓦本身的寿命也会受到影响。再一个就是故宫的石质材料受到很大损害，它雕刻的厚度本来就半个厘米，如果风化了，你想这个石刻还有吗。

王鲁湘：肯定会变模糊。

晋宏逵：这种模糊和不完整，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有些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再一种病害呢，是地面的砖。整个太和殿前广场的砖已经坑洼不平到很严重了，我们绝对不敢让游人在上头走了，人踩在上面要摔跟头，所以只能修几条让人走的砖路。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墙身的红色和彩画对于紫外线高度敏感，因为彩画是以桐油为主料的，它的黏着剂都是动物胶，树脂很少，所以很快便会老化。

王鲁湘：彩画起的功能其实有三个：第一就是保护这个木结构，第二是起美观的作用，第三也是某种礼制、等级的象征。

晋宏逵：它有人文内容在里边。如果这些东西受到破坏的话，你只能实施保护，所以我觉得这是故宫面临的几个大的问题。再者，故宫还面临人为因素的破坏。

王鲁湘：每年有多少游人？

晋宏逵：将近800万左右，数量确实应该控制。但我说的人为破坏还不是这个，我主要是指由于人们对故宫的文化价值认识不足，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使故宫的整体布局受到了威胁，比如在西华门的南北两侧有五栋大楼，盖的和西华门一般高，非常影响故宫的格局，我觉得适当的时候是要拆除的。还有就是对故宫的性质判断有一些误差，认为它不过是中国最高的艺术性博物馆，没有考虑到它作为文化遗产价值的一面更需要保护，于是在进行展室设置的时候，部分地改变了展室的面貌，改变了古建筑的风格。

王鲁湘：为了一个小的文物把一个大的文物改了。

晋宏逵：所以说，人为和自然两种力量使它在不断恶化。也许很多人会问，你早干吗去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自建国以来，国家一直在拨保护维修故宫的资金，从来没有停止过。在1959年和1972年，中央直接拨款，支持故宫进行了两次比较大规模的修缮，为时都很长，那在当时的文物保护界也是顶级的，但和故宫的客观需要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现在咱们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这也是进行这次故宫大修的一个客观原因吧。国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从我们自己来讲，一定要抓住这次机遇，把维修故宫的事情做好，给全国老百姓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王鲁湘：这次故宫的维修，可以说是生逢其时。还有一个好的条件

是，国民的文化主体意识自觉性，也比以前大大提高了，在这样一种民族意识之下，故宫的修缮应该能得到全体中国人的理解。

晋宏逵：的确，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领导，对文物保护的意识都比以前有极大的提高。

“整旧如旧”

王鲁湘：这次维修的规模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吧？

晋宏逵：大概是自1911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了，计划在2020年紫禁城建城600年的时候最终完成。

王鲁湘：那个时候的紫禁城就会以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说到新的形象，就会有质疑了。古建筑修复，有四个字被认为是戒律，就是“整旧如旧”，所有古建筑都应该修到旧有的那个样子，而不是做一个新的。这个原则在很多古建筑修复上是正确的，但是具体到故宫这一种类型的古建筑来说，是不是只遵循“整旧如旧”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晋宏逵：这涉及对文物保护原则的理解，以及在实践当中怎么贯彻。“整旧如旧”从来不是国家的政策。

王鲁湘：民间的说法。

晋宏逵：这个说法原来就有，后来梁思成先生又曾明确地加以提出。梁先生1962年到河北正定考察文物保护状况，当时他看了大悲殿，大佛寺，赵州桥一些工程，有些不太满意的地方，这些建筑更换的材料太多了，于是他就想，一个铜鼎，一个汉镜，如果擦得鲜亮，反而严重影响它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因此在修古建筑或文物的时候，应该修旧如旧。不过梁先生又说过，这是他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具体到实践当中还要做很多研究。修旧如旧应怎样去理解呢？我觉得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这个“旧”是指这个文物的本质，也就是文物原来的材料、形制、结构、工艺做法这四个“旧”，这四个“旧”是老一辈的文物保护专家总结出来的，是必须保护不能更改的；再一个旧，就是旧有外观，这个恐怕就要分析了。

王鲁湘：比如西安的小雁塔，塔顶裂开了，维修的时候是把这个塔顶缝补上，还是维持它裂开的样子？最后修复人员认为，这个裂开的样

子已经在西安的视野中存在很多年了，没有必要把它补齐，还是照样给它留下了一个缺口，这是修旧如旧的典型。

晋宏逵：小雁塔是砖石结构建筑，它能维持安全稳定就够了。对于故宫来讲，“旧”的标准是什么呢？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怎么评估故宫的价值，故宫应该是什么样的。故宫的“旧”必须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历史的真实也有很多时期。溥仪出宫之前一段时间，他自己的小朝廷有什么钱？他肯定不去修缮、保护它。所以，建国后故宫的第一任院长吴仲超老院长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最初在故宫里面清理了25万立方米的垃圾，如果铺成35公分厚、六米宽的道路，能从北京铺到天津。

王鲁湘：我看过1900年八国联军到紫禁城里面拍的照片，荒草戚戚啊，很多殿的顶都塌了，一片破落景象。

晋宏逵：这也是历史的真实啊。而乾隆中晚期，大规模的建设基本上结束了，这时的故宫真是金碧辉煌的状态，盛世紫禁城的状态，这也是历史真实啊。

王鲁湘：对，至少有三个真实的紫禁城，一个是盛世紫禁城，就是金碧辉煌；还有一个是维持状态时期的紫禁城，有点新有点旧，大部分的主体结构还是很好的；再一个就是衰世的紫禁城。

晋宏逵：既然紫禁城有这么重大的文化意义，那么紫禁城的真实状态就应该是盛期的。我们现在要修复的，不是凄凉破败，也不是金碧辉煌，用中性的词来表达就是：庄严、肃穆、辉煌。我觉得这也是历史真实，里面没有造任何假的古董。

王鲁湘：没有违背这个旧的制度去臆造一些东西。

晋宏逵：有一些地方变新了，是因为换了新的材料，它的外观新了一些。它的内部结构，绝对一点都没有改变。甚至于我们烧琉璃瓦的那个厂子，仍旧是京西的。

彰文化而求久远

王鲁湘：这次大修一旦完成，紫禁城的面纱重新揭开以后，面对这些金碧辉煌，我想会有很多人发表不同意见，您觉得有必要把维修的整个指导思想阐述得更清楚一点吗？

晋宏逵：刚才我们阐述的是维修的目标。另外，这次维修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是整体维修。这和哪坏了修哪是不同的。总体维修的标准，第一是要完整地保护它的格局，像西华门的那个大楼，就破坏了格局的完整，我们的保护措施就是把它拆掉，恢复原有的马道。虽然这个目标实现起来有很多困难，但我想，现在的老百姓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此举应该会得到他们的理解。第二是要合理地布置故宫内部的布局，因为故宫原来是皇宫，现在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博物院。

王鲁湘：原来是给第一家庭服务的，现在变成给大家参观的了。

晋宏逵：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要适应这个改变，就有许多工作要做。这在1925年那种条件下是做不到的，不过我们也不能苛求前人。当时有个目标叫“彰文化而求久远”，说得很准确，现在也是咱们的目标。我们就是要把前人没有完成的工作进行合理的安排，按照博物院和保护文化遗产的要求，来合理地规划院内各个建筑的功能。

王鲁湘：说到这一点，又碰到一个争缠不休的问题了，就是作为博物院，故宫应当以开放为主；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应当以保护为主。二者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

晋宏逵：如果处理不好肯定会产生矛盾，但处理好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故宫首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护它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收藏、教育、展示、宣传等等，都是一个博物馆应有的功能，这些功能和我们的保护功能矛盾吗？没有什么根本矛盾。

王鲁湘：有人提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就是地面上的所有建筑，我们只恢复到它原来作为宫廷的那种功能；皇室的收藏，以及博物院成立以后从社会上征集来的文物，我们另外建一个故宫文物陈列馆，可以把它转到地下，故宫这次大修，以及远景规划中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方案？

晋宏逵：曾经考虑过地下博物馆展厅的方案，但国家有关部门主持的多次专业论证都没批准，所以这个思路我们现在不准备再采纳了。

王鲁湘：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地底下不能动吗？

晋宏逵：国家对在紫禁城地下进行建设活动还是有一些疑虑，比较慎重。我觉得，提出这个方案的人，对故宫了解得还不够透彻。故宫这么多殿堂，并不是都有人住，有很多是当时的库房。其实根本没有必要

给皇家留那么多库房，恢复库房有什么意义？那它完全可以作为文物库房来存在了。还有，从1911年到现在也90多年了，作为博物馆的这90多年，有很多殿堂已经被改造了，恢复原貌是不可能的，这些地方是可以作为展室使用的。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刚才讲要合理布置它的功能。它的展示功能有三种类型，一个类型就是大家期望看到的宫廷原状，我们叫做原状陈列。这种陈列向大家展示的实际上是三类东西，一类是宫殿建筑本身，一类是150万件藏品，再一类是靠这两类文物组合而成的宫廷历史原貌。我觉得这是故宫最有特色的部分，也是最吸引人的部分。我们常说，故宫文物不能出宫展览，因为它离开这个环境就变成一个简单的物了，就看不到它的文化背景了。从有故宫博物院以来，老先生们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工作。但抗战时的文物南迁，肯定对文物原来所在的位置有所扰动，要完全按历史真实把它展示出来，要做很多工作。

王鲁湘：要做朱家晋这些老先生做的工作对吧。太和殿里头大家看到的龙椅都是朱先生复员的。

晋宏逵：原状陈列是故宫博物院很吸引人的一部分。第二个类型我们叫原状式陈列，多了一个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历史档案资料不充足，不知道这间房到底什么样子了，陈设档案不太清楚了，或者里边东西物资不够丰富了，你让大家看什么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保持房间原有的状态，在里面增添一些艺术品，像我们现在的珍宝馆、宁寿宫，就是用这种思路布置的，原状一点不要扰动，不进行展室改造，但在里面增加若干展柜，增加一些艺术品。第三个就是文物陈列，即一般文物的陈列。现在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要和大修工程同步进行展室的规划和建设。

王鲁湘：比如说，故宫经常和国外进行一些重要的互展交流，那就需要通用的展室吧。

晋宏逵：刚才我讲的第三类展室就是这种展室，这种展室也要突出故宫特色，让展品和它的环境同步，达到一种可以欣赏的程度，并非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展室就完了。像现在的午门展厅就是这类展厅。在午门展厅，我们离开原来的墙、柱，又专门重新搞了一个稳定的结构，在原来的结构和原来的地面之间都做了充分的隔离。而且我们做了玻璃顶子，在里面看展览的时候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原有的彩画。



午门展厅内景

王鲁湘：那些柱础也都在玻璃里面。

晋宏逵：这个展厅建成以后，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的办事处，给我们颁发了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

王鲁湘：这个方法倒是启发了我。现在很多人遗憾的是太和殿进不去，如果我们在太和殿里头做一个内玻璃套，人在玻璃套里走，里面的东西全看到，又完全触摸不到文物，多好啊。

晋宏逵：我们还没有那么大胆。太和殿毕竟太特殊了，那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我们不准备作为展室来开放，它只能是以保护为主。它那种2尺2的金砖，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烧得成，所以绝对不能再有任何践踏了。总之，展室建设和大修工程是同步进行的，这也是我们这次大修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再一个事儿，就是故宫的各种配套服务设施。冬天不能太冷，夏天不能太热，这些设施得有吧，厕所也得有吧。故宫从有博物馆以来，陆陆续续添设了11种管线，包括水、暖、电等。但这11种管线的安排非常影响故宫的形象，这些情况我们想把它改变。所以我们这次大修，是一次整体维修，为了完成整体大修的任务，我们首先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制定了文物保护的总体规划，已经经过了国务院授权和国家文物局的批准。

王鲁湘：说到这种大修，我就想，盖房子是百年大计，修宫殿要算得上千年大计了。中国木结构的房子，它的材料本身有一个自然寿命。

再好的木材，比如楠木，几百年以后也会糟朽，那时我们不可能在地球上再找到这么长这么粗大的楠木，到时怎么办？再一个，木结构的房子最怕的就是火灾，故宫在永乐年间落成以后的第二年就发生大火，烧了几大殿，而后是光绪年间那场大火烧了太和门。虽然最近这一百多年以来好像没有发生这种大的火警，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来一场火灾，到时怎么办？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

晋宏逵：火灾只能是以防为主，要着起来再救就很困难了。故宫防火是有几套方案的，一个是早期报警，所有的殿堂、库房当中统统安了火灾的早期报警装置，如果空气吸入异常就会有反应；再者，凡是进电的地方，都有专人看管；还有，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灭火装置，我们的消防管线基本上延伸到了所有的殿堂，万一有火会及时扑救。木材的问题则是个难以逾越的问题，楠木在清代就很难找了，太和殿这么重要的建筑基本上就没有楠木可用了。现在还没有遇到需要彻底更换那么多大楠木的事件，如果真遇到的话，恐怕只能使用替代材料了。

王鲁湘：好在我们现在可以全球采购了，以前只能在中国。

晋宏逵：我们现在已经换过一根大柱子了。在维修鸿毅阁时，原来的楠木不行了，更换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其他品种木材。我们请林业科学院帮我们进行了检测，这种木材的物理力学性能和楠木类似。换成别的木材，也是迫不得已，只能这么做了。这一点我们在档案上记录得比较完善。

太和殿维修一瞥

穿过右翼门进入太和殿广场，一大片摆放整齐的琉璃瓦映入眼帘。显然，这些瓦片是从太和殿屋脊上卸下来的。走近看，每一件瓦上都标有数字和方位，据说，苫背工程结束之后，它们将作为最后一道工序，被重新安放回太和殿的屋脊上。



太和殿脊兽

王鲁湘：我过去来故宫，看到这些脊兽高高在上，只能抬头仰视，看到模模糊糊的一个剪影，现在把它们卸下来以后，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它们谁是谁了。第一个，坐在最前面的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仙人引路”。

晋宏逵：太和殿一共八条戗脊76，上面有八组脊兽。每组里面的前几个脊兽没有什么奇怪的，但由于它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建筑，所以它上面的脊兽用到了十个。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最高建筑，脊兽只有九个。每组中的第十个脊兽，在全国只有故宫才有。

王鲁湘：在全世界也只有这八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普通的琉璃件，从唯一性来说也是价值连城的。

晋宏逵：而且它的形象很奇怪：形似猴，却背生双翼，手持金刚宝杵。

王鲁湘：它应该叫什么名字？

晋宏逵：文献上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在文字上是写成“行什”，似乎就是个排行，也有人说是雷公。

王鲁湘：应该是雷公。

古艺犹存

从明永乐到清乾隆，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与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百年大修，从古建筑本身的修护，到附着其上的古老技艺的传承，不仅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和保护，更是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抢救。只有把这些都做好，这份遗产才称得上完整、真实。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古老技艺和工程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今天在大修中运用的工艺和600年前明朝工匠的手法并无二致。

李永革[77]：故宫在古建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这套班底是从五十年代初建立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副院长，叫单士元，老先生对这方面非常重视，五十年代初就把这些行业中身怀绝技的十位著名老匠人请到故宫，号称“十老”。现在故宫里四五十岁的这些匠人，基本上属于“十老”的第三代了，但这些人都是受过真传的。现在我们这还有祖孙三代都在故宫工作的人。

故宫传统工艺中最奇妙的就是彩画。故宫里的彩画应该说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彩画。画彩画在过去有个行话，叫“高彩匠”，这个画法和在纸上画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建筑上画一个人物，和在纸上画比例就不一样。一般画一个人物，头部的比例大约占人体的七分之一，但在高处画一个人物的话，他的头部就占六分之一，因为人是仰视。



倦勤斋屋顶通景画局部



倦勤斋屋顶通景画细部

位于宁寿宫最北端的倦勤斋室内装饰修复，是此次大修工程的一个重点、难点。倦勤斋修建于乾隆年间，为了让自己归政后有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乾隆帝对倦勤斋的内饰设计可谓煞费苦心。其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屋顶上的一幅通景画，它融西洋透视技法和中国绘画装潢技术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

王鲁湘：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这个内饰设计走近的时候看，画的全是一朵一朵的紫藤花。一开始看是平面的，没怎么在意，然后我往乾隆看戏的宝座上一坐，再仰头一看，当时就腾地一下站起来了。天顶上那些紫藤好像全垂下来了，它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上的幻觉。

晋宏逵：它那藤萝花不是圆的，不是一团一团的，而是有透视的。它的各个方向都和人的视觉相适应，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

王鲁湘：但是我一坐下，就全都变成垂直的了。

晋宏逵：这因为这个画就是为这个位置设计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看就是垂直的。

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完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整个过程共花费了近百道工序。如此大面积的画面修缮对于故宫的专家们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此，美国世界文物保护基金会特意选派专家进行技术支援。历时一年多的努力之后，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此次大修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最成熟的古建及文物修复技术，并且通过多次试验，大胆地采用了一些以前从未使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以确保修缮过的建筑得以长久地保存。

李永革：以前的传统工艺缺乏一些数据方面的规定，完全是凭经验，像油的熬制、灰的配比、油漆的颜色，以前全是凭经验搭配和运用。这次我们通过现代的一些检测手段进行检测，然后科学地进行修复。另外，这次我们和外边的一些科研部门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像屋面、苫背，以前的修复就是凭经验一遍一遍地往上上灰背，这次我们通过和科研部门合作，对灰背的抗滑移也做了检测工作，保证修出来后万无一失。

曾经的故宫，庞大而神秘，甚至还有点儿老朽。几十年过去，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这些对故宫实在算不上什么。她依然安详地端坐在北京城的正中，沿着那条中轴线一路向南，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一眼望穿，笑看风云。如今的故宫，正在技师和工匠们的手中，正酝酿着新一轮的胎动……

[1]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2]疑古派，又名古史辨派，盛行于旧中国的二、三十年代，以顾颉刚、钱玄同为代表，胡适等学者也参与其中。其阵地刊物为《古史辨》。此派学者以大胆的怀疑精神和证据主义的态度处理古史，反对自三皇五帝下来的历史系统。特别是顾颉刚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而非原来的真正史实。

[3]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是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整、文化积淀极为丰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该遗址主要为裴李岗文化，绝对年代为公元前7000—前5800年，总面积55000平方米。在出土遗物中，以1987年发现的一批七孔骨笛和一批具有文字性质的甲骨契刻符号最为珍贵，把我国的文字史、音乐史推进到八、九千年。

[4]新砦遗址，位于郑州新密市城东23公里处的刘寨乡新砦村。遗址面积约70万平方米。北部为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中部和南部为二里头文化遗存。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有深腹罐、鼎、甑、盆、碗等；石器较少，仅有刀、锛和石镞等。

[5]《尚书·尧典》记载洪水“怀山襄陵”，意思是说洪水盛大，包围了高山，将要漫过丘陵。

[6]“扰”是扰乱的意思，扰坑就是扰乱遗存单位的盗洞。

[7]何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考古所山西队队长。

[8]玉钺，本为古代兵器，形状像板斧而较大。以后逐渐演变为礼器，象征王权的威严。作为兵器的钺多由青铜制成，而作为礼器的钺则既可以用青铜制成，有时也用玉。古代常以“斧钺”连言。

[9]鼓，陶寺遗址出土的这件物品（如图）形似长颈葫芦，圆鼓腹，腹底中央凸出一孔，周围又有三小孔，颈腹之间置双耳。这种器物上、下口连通，不可能为容器，在大型墓中每与鼍鼓、石磬同出，应为古文献中“以瓦为匡”的土鼓。“土鼓”是陶寺遗存独具特色的陶器，其主要用途是作为礼乐器在祭祀时演奏，或作为战鼓，鼓励杀伐。它是以陶土为框，两面蒙皮的一种原始打击乐器。《吕氏春秋·古乐篇》曾记载尧让质用麋鹿皮蒙在瓦缶的口上，用来敲击，大概就是这样的土鼓。

[10]琮，古代一种玉器，外边八角，中间圆形，是非常重要的礼器，常用来祭地。其中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最为有名。

[11]牟永抗先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12]董聿茂（1897-1990），奉化人，1928年留学日本，学习动物学，获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后，历任浙江博物馆馆长、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杭州大学生物系主任、浙江水产学院副院长、中国动物学会理事、中国水产学会理事等职。

[13]曾昭燏（1909-1964），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人，曾国藩之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曾留学英、德学习考古，归国后从事考古与文物工作。1950年任国立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兼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55年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兼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14]吴王寿梦，去齐之子，又名乘，字熟姑，又称攻卢王。生于周襄王三十二年（前620），卒于周灵王十一年（前561），在位25年，是吴王阖闾的祖父，吴王夫差的曾祖父。寿梦元年即吴王寿梦即位之年公元前585年；而春秋时代则已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开始。

[15]钱山漾遗址，位于湖州城南7公里钱山漾东岸南头的百廿亩村，由慎微之先生于1934年发

现，建国后又有多次发掘。该遗址出土了原始残绢片和丝线，还出土了麻布片、麻绳等纺织品，为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丝织品遗址。该遗址属于良渚文化。

[16]苏秉琦，1909年生，著名考古学家，1934～1949年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从1949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其间，1952～1982年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授兼考古教研室主任。他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学术论文，就一些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作了尝试性分析，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格局、系统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赋予其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考古学界有广泛影响。他最著名的创见，便是中华文化六大区系理论。

[17]刘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

[18]这是《诗经·小戎》里的诗句，原是“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意思是：所想念的那君子，其品德温润犹如玉石。《礼记·聘义》又记载孔子引用这句话，以玉来比喻君子的德性。

[19]《苕溪渔隐丛话》，宋代著名诗话集，南宋胡仔（1095？～1170）编。胡仔字元任，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因曾居于苕溪，以渔钓自适，自号“苕溪渔隐”。诗话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论诗文体，包括评论诗歌、诗人、诗派，记录诗人议论、事迹等。《苕溪渔隐丛话》所收诗话，评论对象上起国风，下至南宋初，以人为纲，按年代先后排列。此书评论词人名作，记述词坛轶事，历来被后人称引。

[20]朱章义，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

[21]王毅，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22]玉料在未加工前，作为一种天然矿物，往往在玉质外有一层石质包裹物，俗称玉皮。有些玉器在制作过程中，为了设计的需要而有选择地适当保留一些玉皮，形成巧作。

[23]李乔生，湖南省宁乡县文物研究所所长。

[24]熊传薪，原湖南省博物馆馆长。

[25]虎食人卣，共有两件，出土于湖南省安化、宁乡交界处，后来都流入国外，一件藏于法国巴黎市立东方美术馆，一件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虎食人卣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通高35.7厘米，造型取踞虎与人相抱的姿态，立意奇特。卣（音有），是古代用来盛酒的容器，也有人认为卣专门盛放祭祀时用的一种香酒。卣主要流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其基本形制为扁园、短颈、带盖、鼓腹、圈足，有提梁。还有少数为直筒形、方形和圆形以及动物形状。

[26]尊，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商周时期，春秋后期偶有所见。尊与彝一样，原是成组礼器的共称，宋朝之后开始专指一类器物。尊的基本造型是侈口，长颈，圆腹或方腹，高圈足。也有动物形状的尊，如象尊、羊尊。

[27]瓿（音布），盛酒器和盛水器，亦用于盛酱，流行于商代至战国。器型似尊，但较尊矮小。圆体，敛口，广肩，大腹，圈足，带盖，有带耳与不带耳两种，亦有方形瓿。器身常装饰饕餮、乳钉、云雷等纹饰，两耳多做成兽头状。

[28]铙，又称为钲和执钟。我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其最初的功能为军中传播号令之用。流行于商代晚期，周初沿用。

[29]簋（音鬼），流行于商至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用于放置煮熟的饭食。青铜簋器物造型形式多样，变化复杂，有圆体、方体，也有上圆下方者。早期的青铜簋跟陶簋一样无耳，后来才出

现双耳、三耳或四耳篮。

[30]“黑漆古”、“绿漆古”，“绿漆古”是铜器绿锈生成之后，由于水文地质条件变化或者墓葬、窖藏常年浸水，器物表面的浮锈自然脱落，却因年代久远，绿色牢牢地浸染在器物表层上形成的，好像罩了层薄薄的绿漆，故俗称“绿漆古”。“黑漆古”的道理与“绿漆古”相似，主要取决于当地水质和土壤的酸碱度等，有器物长期传世形成的自然“包浆”，也有青铜器本身合金成分差异造成的原因。

[31]坑口，本来指玉器的质地，此用来指青铜器的质地。

[32]关于尝羌，史学界一致采用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述：“……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此后有关于滇国之事，未再有提及尝羌之名，均以“滇王”代之。在云南的考古界中，对是否曾有庄蹻持怀疑态度，有史家称，太史公关于庄蹻入滇的记录，有可能是出自降汉的滇王尝羌之口。尝羌是一个会天真地问汉史者“汉孰与我大”的人，又转为太史公所记，与真实的历史有出入是难免的。当然，也不排除生活在众多部落中的滇王为了某种权力的需要，故意把自己的祖先夸耀为“楚将”，以达到震慑其他部落的目的。

[33]蒋志龙，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34]马文斗，云南省博物馆馆长。

[35]张新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36]所谓贮贝器，就是用来贮藏贝币的青铜器皿。

[37]钱公麟，苏州博物馆副馆长，江苏省吴文化学会副理事。

[38]王卫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39]徐刚毅，文化学者。

[40]徐良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41]张照根，苏州市考古所副所长。

[42]徐金星，原洛阳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所长。

[43]怀履光，生于英格兰德文郡。1909年，加拿大圣公会决定单独向中国传教，委任怀履光为河南教区首任主教。著作有《中国古墓砖图考》、《中国壁画》等。

[44]张玉芳，洛阳博物馆保管部主任。

[45]贾南风（256年～300年），西晋开国元勋贾充之女，西晋惠帝的皇后，又称惠贾皇后、贾后。贾南风在皇后位置十年，其间因惠帝懦弱无能而得以专权，直至在政变中被废杀。其专权与失势是引发“八王之乱”并最终导致战乱升级的导火索之一，对西晋和之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6]“建安七子”，是指东汉末年汉献帝年间的七位文学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同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首次将他们相提并论，七子与“三曹”往往被视作三国时期文学成就的代表。

[47]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同时以谈论玄远

的问题为乐。

[48]“金谷二十四友”，西晋太康时期，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一个高峰，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被称为“太康文学”。代表人物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等。他们这二十四人经常聚集在石崇的别墅洛阳金谷园中，谈论文学，吟诗作赋，时人称之为“金谷二十四友”。其中，潘岳、左思和陆机又是“金谷二十四友”中的核心人物。

[49]《三都赋》，由西晋左思所撰写，分别是《魏都赋》、《蜀都赋》、《吴都赋》，是魏晋赋中独有的长篇。这篇赋实际上不只是写魏、蜀、吴三国的国都，而是写魏、蜀、吴三个国家的概况。

[50]八王之乱，是西晋时统治阶层历时16年（291年～306年）之久的战乱。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晋武帝临终时命杨皇后的父亲杨骏掌管朝政，继立的晋惠帝痴呆低能，皇后贾南风（即贾后）为了掌握政权，于元康元年（291年）与楚王司马玮合谋杀死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司马玮杀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反诬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司马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于元康九年废太子司马遹，次年杀之。诸王为争夺中央政权，不断进行内战，史称“八王之乱”。

[51]王振国，龙门石窟研究院副研究员。

[52]骆希哲，陕西省文物局研究员。

[53]伯希和（1987-1945），法国人，世界著名汉学家，1908年到达敦煌，从敦煌莫高窟劫走六千余种文书，此外还有二百多幅唐代绘画、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并将所劫文物全部运往巴黎。

[54]所谓“五石散”，是一种中药散剂。它的主要成分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此外还有一些辅料。这种散剂据说是张仲景发明的，张仲景发明这个药方，是给伤寒病人吃的，因为这个散剂性子燥热。正常人吃散之后，一定要散步，大量吃冷东西，喝热酒，穿薄衣服，洗凉水澡。到了魏晋时期，这种散剂特别为名士所推崇。

[55]李龟年、马先期、贺怀智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音乐家、舞蹈家，唐玄宗把他们招入了梨园。

[56]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

[57]山长，是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五代蒋维东隐居衡山讲学时，受业者称之为山长。宋代将南唐在庐山白鹿洞所建国学，改成白鹿洞书院，作为藏书讲学之所。元代于各路、州、府都设书院，设山长。明清沿袭元制，乾隆时曾一度改称院长，清末仍叫山长。废除科举之后，书院改称学校，山长的称呼废止。

[58]《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忠；发而为喜怒哀乐之中节，谓之和”。

[59]朱子主要在福建活动，所以他的学派被称为“闽学”；而张栻在湖南，所以他的学派被称作“湖湘学”。

[60]北宋的时候，大理学家程颢的弟子杨时要到南方去，程颢送他时，说“吾道南矣”，意思是说他的学问将要被弟子带到南方去了。后来学者们便把杨时在南方传播的理学学派称作“道南学派”。道南学派中又有很多分支，而所谓“道南正脉”，则是肯定朱熹、张栻的学说是最纯正的。

[61]王夫之，明末清初人，因曾隐居石船山，故号船山先生。

[62]南明，是自公元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到后来清朝入主中原前，明朝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的抵抗政权的统称，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前后共历18年。王船山当时参加的是在南宁、肇庆的桂王政权，因其年号永历，又称永历政权。王船山曾在其中任行人司行人。因为反对王化澄，被陷害，后归家。南明政权灭亡后，船山一心从事著述，成就颇丰。

[63]刘智，钓鱼城风景文化管理局副局长。

[64]袁东山，重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65]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66]土司，在桂西少数民族地区，宋王朝平侬智高起义后，派狄青部下加封土酋为土官，成立许多土州、县、洞。这些土州、县、洞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文化制度以及民情风俗等都与流官的州县不同，故称为土司。

[67]晋宏逵，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故宫整体维修工程的负责人。

[68]“负阴抱阳”，老子语，这里指的是，前朝属阳，呈“凸”字形，后寝属阴，呈“凹”字形，二者紧密结合。

[69]“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一阁为中国四大藏书楼之一，坐落在浙江宁波，明代嘉靖间范钦创立，此后一直为范氏子孙守护。“天一”得名于易学上所谓“天一生水”之说，因为水能克火，图书收藏最怕的就是火灾。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由于水在五行的数上是一和六，而奇数是天数，偶数是地数。

[70]这些战争主要有明末反元的农民起义战争，以及朱元璋与各地割据势力的混战，还有后来朱棣为争夺王位发动的“靖难之役”。

[71]正统，中国明朝第六个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的年号，相当于公元1436年至1449年。

[72]洪熙、宣德，分别是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

[73]土居天下之中，土在五行的方位上属于中央。

[74]阴阳交泰，原指易经的泰卦上坤下乾，乾欲上升，坤欲下降，正好是相交之象。

[75]一周天，我国古代历法把一周天分为三百六十又四分之一度，太阳日行一度，三百六十是取其整数。

[76]戗脊，就是在有不同方向的承梁板的屋顶中，其两个斜屋面交接处所形成的外角，又称岔脊。

[77]李永革，故宫十老的第三代传人，对于传统的手艺活儿，每一项他都如数家珍。